

# 傳播文化與政治

ISSN 2411-4006

第14期 2021年12月

## 一般論文

- 尋找戒嚴時期言論獲罪者的身影：一個數位人文取徑的研究
- 台灣公民募資的消費實踐 (2012-2019 年)
- 信任媒體就信任政治？ 2003~2018 趨勢分析

## 研究誌要

- 檔案與再檔案之間

## 歷史與現場

- 新聞自由還是專業倫理？  
中天新聞的書面鑑定與親身體驗

## 書評

- 評析《俄羅斯戰略傳播：公共關係與廣告》

# 傳播文化與政治

2015年6月创刊

半年刊, 6、12月出刊

出版: 2021年12月 第十四期

## 主办机构

媒体改造学社

## 编辑顾问

卜卫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井迎瑞	台南艺术大学
王春泉	西北大学
王嵩音	中正大学
王毓莉	文化大学
史安斌	清华大学(北京)
吴予敏	深圳大学
吕新雨	华东师范大学
李金铨	政治大学
林元辉	政治大学
林东泰	台湾师范大学
林静伶	辅仁大学
邱林川	新加坡国立大学
胡光夏	世新大学
胡泳	北京大学
倪炎元	铭传大学
展江	北京外国语大学
翁秀琪	世新大学
张志安	中山大学(广州)
张裕亮	南华大学
张锦华	台湾大学
张国良	交通大学(上海)
郭良文	交通大学(上海)
陈卫星	中国传媒大学
单波	武汉大学
曹晋	复旦大学
刘海龙	人民大学
黄煜	香港浸会大学
赵月枝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萧苹	中山大学(高雄)

##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罗世宏	中正大学
编辑委员	林富美	世新大学(执行编辑)
	冯建三	政治大学
	陈光兴	交通大学
	洪贞玲	台湾大学
助理编辑	刘忠博	华南理工大学

## 出 版

发 行 人 媒体改造学社

地 址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102 号  
3 楼之 3

电 话 (02)25221499

传 真 (02)25224970

E-mail: editor.2015ccp@gmail.com

本刊网址: <http://ccp.twmedia.org/>

ISSN: 2411-4006

封面提字 黄匀祺

封面设计 冯议彻

## 订 阅

零售: 每期新台币 500 元

个人订阅: 国内一年两期 1000 元

海外一年两期 1500 元(或 50 美元)

机构订阅: 国内一年两期 2000 元

海外一年两期 3000 元(或 100 美元)

以上均含挂号邮资

邮政划拨户名 社团法人媒体改造学社

邮政划拨账号 50313103

本刊采用创意公有授权条款, 如下



# 目 次

编辑室报告： .....i

## 一般论文

寻找戒严时期言论获罪者的身影：

    一个数字人文取径的研究.....陈百龄/1

台湾公民募资的消费实践（2012-2019 年） .....张依萍/39

信任媒体就信任政治？ 2003~2018 趋势分析.....王教安、王嵩音/87

## 研究志要

档案与再档案之间.....井迎瑞/115

## 历史与现场

新闻自由还是专业伦理？

    中天新闻的书面鉴定与亲身体验.....陈顺孝/133

## 书评书介

评析《俄罗斯战略传播：公共关系与广告》.....胡逢瑛/151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四期  
2021 年 12 月

## 稿約

稿約詳情請見 <http://twmedia.org/archives/502>

## 编辑室报告：

1987年7月15日，台湾结束了长达38年的戒严。解严后的34年间，台湾历经三次政党轮替，言论自由与民主政治的发展，让台湾人自拥为台湾的价值与骄傲。

在民主社会中，「反抗」对结构中的行动者，是体现个体自由，团结不同个体，对抗共同命运，解构与重构的社会发展的动力。检视民主政治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拥有权力的一方，为保卫权力，无限上纲害怕「反抗」的虚假幻影，穷尽其对思想与言论自由的可能破坏后，历史难免会反扑。不同历史脉络下，解构与重构可能性与样貌，考验着不同时代中的人民的集体意识与行动。

本期一般论文中第一篇，是由陈百龄所撰写的〈寻找戒严时期言论获罪者的身影：政府档案初探研究〉，该文让我们穿越时空，再现史料的轮廓与意义。值得一提的是该文运用了文字探勘技术和人工检视等多重方法，来建构当事人列表，以征集目标档案。运用软件工具进行分类、清洗、结构化后，再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在方法与研究题材上，具创新性，十分难得。其研究成果，除描绘了戒严时期言论获罪者集体的轮廓与样貌外，对权力拥有者加害言论自由所造成的社会伤害与影响，也提供了一些反思。

有趣的由张依萍所撰述的〈台湾公民募资的消费实践（2012-2019年）〉乙文，我们却发现，在科技、资本与市场交互引动下，当代的民主参与，已变成可以透过「消费」实践完成。该文检视了2012-2019年间公民募资平台专案。发现当倡议行动包装成项目，进行募资时，捐献者以金钱在募资平台上资助，募资发起方，成为代理行动者来执行倡议，此时政治参与便透过这种商品化历程，达成实践。此外，也发现有关公民募资倡议，善于使用「吸纳」、「排斥」的策略，制造出冲突的共鸣。募资发起方会大量使用「我们」、「年轻人」、「草根」的字眼建构了发起方身份，象征这群人与捐献者共同拥有相对弱势的身份。透过该策略召唤并转换成属于他们的「台湾认同」。值得讨论的是当公民募资，成为日常，「爱台湾」的政治消费，成为当代政治

参与的一种形式时，其收编并合理化这种由新媒体所架构下的资本与市场的商业本质，已能瓦解原公民倡议应有的真正的集体行动，对民主政制的良性发展，或恐也是隐忧。

而在台湾，民众的媒体信任与政治信任是否有关系？民众的媒体信任是否会影响其政治信任？本期由王教安、王嵩音所发表的〈信任媒体就信任政治？2003~2018 趋势分析〉乙文中可以发现，无论报纸、电视、杂志、广播与网络媒体，民众对各媒体的可信度，皆逐年下滑，且都仅在及格边缘，而且民众对于政治信任的态度倾向不信任。各媒体中，电视媒体长期以来与政治信任的关联较其他媒体密切。是以，捍卫电视媒体的专业自主，使其能对政治体系，进行理性评价，是台湾民主政治健全与良性循环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本期的研究志要〈档案与再档案之间〉，作者井迎瑞以电影收藏家博物馆的电影器材、戏服、文献等三个档案（数据库）为例，说明档案的发现、转移、入藏等再档案的过程，不是价值的逃逸路线，而是再脉络化的过程，藉此历程，能建立新的话语系统，激活想象，扩大影响。

该文引介了传播学门较少研究的馆藏文物档案研究法。作者认为，档案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是一个自我完成的话语系统与表述。这种话语系统，能依靠着档案内部的对象与对象；藏品与藏品间某种生动的内在连结，来建构其意义。当整个话语系统被建立之后，档案的边界就可以被打破，能产生档案外意义的扩延力量，而这也就是档案研究的价值所在，十分具启发性。

本期的历史与现场－作者陈顺孝－以第一人称的亲身体会，重现中天新闻台换照听证会的场景。透过新闻台运用媒体资源对不同意见的鉴定人，进行形象与人格挞伐的种种样态。新闻台换照之听证会，本该是一场理性数据的检核与讨论。透过听证参与者亲身的遭遇，却惊见，过程中新闻台为捍卫其证照，不惜运用媒体资源，对鉴定人谩骂、恶意贴标与偏狭的意义论述等等，与其所主张之新闻自由，呈现了唐突、背离与矛盾的自我毁损，却无任何的反观与自觉。是以，咸盼该历史与现场的记实，对新闻自由与专业伦理的讨论，除了反思，也应有一套规范的法理机制。

当然本期最幸运的是能邀请胡逢瑛老师帮我们撰写 2021 年由 Katerina Tsetsura & Dean Kruckeberg 主编的《俄罗斯战略传播：公共关系与广告》(*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in Russia—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一书的书评。

胡老师是两岸少数取得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大学 (MGIMO) 国际新闻学硕士和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在两岸传播学者群中，其对俄罗斯传播的熟悉与学养，足为翘楚。

该书汇聚了二十一位作者的研究成果，对于了解认识当代俄罗斯战略传播的主流思维与在地特点，是一本很具代表性著作。而透过胡老师的理论文献的梳理与对话，对于习惯以欧美西方典范出发，理解俄罗斯战略传播的学术社群，该书对于如何立基于俄罗斯历史、文化与意识形态来理解俄罗斯战略传播，多所论述。文章内容，提供了跨文化传播研究，另一宽广而多元的研究情怀，十分精彩。值得读者寻幽探胜，享受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乐趣，与细思不同国别研究应有的宏观与多元包容的研究视角。

《传播文化与政治》编辑委员会

2021 年 12 月 17 日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四期  
2021 年 12 月



## 寻找戒严时期言论获罪者的身影： 政府档案初探研究

陈百龄\*

### 本文引用格式

陈百龄 (2021)。〈寻找戒严时期言论获罪者的身影：一个数字人文取径的研究〉，《传播、文化与政治》，14:1-37。

---

投稿日期：2020 年 11 月 24 日；通过日期：2021 年 6 月 25 日。

\* 作者陈百龄为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 e-mail: pailinch@nccu.edu.tw。本研究为国家人权博物馆 2019 年「戒严时期涉及言论自由政治案件之研究暨展示脚本计划案」(10823) 委托专题研究成果之一部份。本文初稿曾于 2020 年 6 月在中华传播学会年会研讨会中宣读，作者感谢评论人已故倪炎元教授针对本文所提供之卓见。

## 《摘要》

本研究是一个初探研究，指向戒严时期的「言论获罪」案件。在 1949 年至 1992 年的威权统治期间，许多人因为言论被执政当局逮捕，遭指控「为匪宣传」或「传播谣言」等罪名，而受到军事法庭定罪。

政治档案是探索上述议题的重要史料管道，尽管台湾已经解严多年，但政治档案开放步调却相当缓慢，政治案件征集和典藏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学界仍处于探索阶段。这个研究主题文献鲜少，因此有探索之必要。

本研究将聚焦讨论史料搜集方法。研究人员藉由多重资料搜集史料；先以文字探勘技术和人工检视的多重方法，建构初步当事人列表，然后征集目标档案，然后运用软件工具进行分类和清洗，并使之结构化，最后进行描述性统计。研究成果展现言论获罪者集体样貌的轮廓。

**关键词：**言论获罪、政治案件、档案研究、数字人文取径、传播史

## 壹、缘起

杨田郎，1939年出生于新竹。1954年他15岁，在《新生报》新竹分社当送报生。警方发现新竹市一家戏院厕所墙上被人写了「打倒蒋介石」、「消灭中华民国」、「消灭国民党」等语句。办案人员认为杨田郎涉嫌，指控他因为图报复泄愤、因此书写反动标语。侦讯后移送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事法庭认定杨田郎「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判处有期徒刑7年、褫夺公权4年。<sup>1</sup>

陈培逵，以替人理发维生。1972年间在永和理发店内向顾客说「大陆建设比台湾好，中国退出联合国是被赶出来的」，同年又在八里另一理发店向顾客说「毛泽东最伟大，是世界救星」。办案人员认定他「连续以演说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判处有期徒刑7年、褫夺公权4年。<sup>2</sup>

吉天才，江苏南京人，空军作战司令部汽车大队驾驶中士。1962年12月间，军方发现军营内遗有士官政治课本一册，封面上写有「王八蛋放狗屁」、「为何不以贪官为故事题材？」内页空白眉首处，则书写「解放台湾」、「同志们要想回大陆，就要起来革命解放你还等到何时」等文字，以叛乱罪嫌移送空军总部，军事法庭认定「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判处有期徒刑7年、褫夺公权4年。<sup>3</sup>

卢樟宏，早年投身军旅，1955年因病申请退伍，和朋友在桃园县大溪镇合开油漆广告行。同年10月下旬，适逢蒋介石总统生日，当地民众服务社委托绘制总统华诞庆祝广告牌八幅。其中一幅「北伐成功受全国民众欢迎」图，在民众欢迎行列图画下方书写「王八蛋队」、「便所人」等字样。军事法

---

<sup>1</sup> 楊田郎案，參見：(44)審特字第0058號判決書，國防部，〈許約民等叛亂案〉，國發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A30500000C/0043/1571/0864-2）。

<sup>2</sup> 陳培逵案，參見：(63)初特字第0056號判決書，國防部軍法局，〈陳培逵叛亂〉，國發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B3750347701/0063/1571/208）

<sup>3</sup> 吉天才案，參見：(54)宗效判字第0033號判決書，國防部軍法局，〈吉天才叛亂案〉，國發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B3750347701/0055/1571/029）。以及國防部，〈吉天才違法案〉，國發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A30500000C/0054/1571/4060）。

庭认定「以文字图画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判处有期徒刑 7 年、褫夺公权 4 年。<sup>4</sup>

上面列举的杨田郎、吉天才、陈培逢、卢樟宏等四人，虽然出身不同地域、从事各行各业，但却有共同遭遇；他们都因言论而获罪。更确切的说，他们都在台湾实施动员戡乱法制期间发表言论涉及叛乱罪名，因而遭受特别刑法判处重刑。若用解严后台湾的各种言论尺度衡量、这四人言论的内容，难以想象会使人获罪。但在戒严时期，这些言论确实足以让当事人丧失自由、甚至因此魂断刑场。

上述四个案件并非少数个案，在戒严时期，类似上述的言论获罪案件数量相当多，初步估计在戒严期间累计超过千件，仅次于左翼案件的数量，占政治案件总数第二位。然而先前文献鲜少触及这个主题。因此学术界有必要有系统地进行探索。

往昔在戒严期间，官方将政治案件档案长期闭锁于石室金匱，数十年未曾对外界公开。但即便在两度政权交替之后，档案解密的地步也仍然迟缓。政治案件档案开放时程和内容复杂程度，使得我们对于这一群「言论获罪者」所知仍然有限。本研究指向两个目的：（一）如何建构一套方法搜集言论获罪者档案史料？（二）根据这套方法，描绘言论获罪者的整体样貌为何？

本研究不仅将可应用于各种类型的政治档案数据搜集的参考，这些言论获罪者的史，展现戒严时期言论自由历史发展的曲折途径，或可增加我们对于台湾传播史的理解。

## 貳、言论获罪案件

人民发表言论的权利受到宪法保障。但往昔台湾在戒严的非常状态下，人们发表和执政者立场相左的言论、可能被冠以「叛乱行为」之名，这些发表言论却被当作叛乱者的人们，动辄遭到执政当局援引动员戡乱时期体制、课以严苛刑责。自 1949 年 5 月 20 日，时任台湾省主席陈诚宣告实施戒严令，

---

<sup>4</sup> 盧樟宏案，參見：(44)審特 0113 號判決書，國防部軍法局，〈盧樟宏叛亂案〉，國發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B3750347701/0044/3132433/433）。

到 1992 年 11 月 7 日解除金門馬祖地區的臨時戒嚴令為止<sup>5</sup>，在這段長達 43 年的期間里，執政當局以實施戒嚴為由，實施特別法制凍結人民憲法權利。在這段期間，執政者以臨時條款取代憲法若干規定，並制訂「動員戡亂時期」特別法，將原本憲法明文保障的言論自由權、集會結社權、人身自由權、法院提審權等憲法權利，加以凍結。原本憲法規定「非軍人不受軍事審判」，但在戒嚴時期，即使非現役軍人的一般平民，一旦涉及叛亂案件則被視為匪諜、而遭交付軍事審判。

在動員戡亂時期特別法制中，和言論自由最相關的法律規定，以《刑法》第一百條、《懲治叛亂條例》第六、七條，以及《檢肅匪諜條例》第八條為主。1939 年制訂的《刑法》第一百條內亂罪，在 1949 年隨國民政府遷台而適用於台灣，該法條主要規範內亂罪構成要件。通常現代法治國家對於內亂罪的規範，以「暴力脅迫行為」為對象，但在 1992 年立法院修正此一條款之前，思想和言論均可視為叛亂，因此戒嚴時期政治案件中，許多案件均因當事人發表言論遭被認定為叛亂案件。該法條僅列舉四項主觀要件（不法意圖），却未明訂客觀要件，違反罪刑法定主義所主張的刑法明確性。因此，在政治案件審判中，罪刑類型和輕重往往受偵查、起訴和審判人員心證之左右。

《動員戡亂時期懲治叛亂條例》源訓政時期以來處置叛亂行為的一項特別法。<sup>6</sup> 該法除規定平民身涉及叛亂由軍事機關審判外，也條列叛亂類型和刑度。《懲治叛亂條例》言論獲罪最相關的條文有二，都是以言論內容為核心形成構成要件。

第六條「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消息，足以妨害治安或搖動人心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假消息 / 不實訊息自古已然，但若在戒嚴

---

<sup>5</sup> 所謂「解除戒嚴令」，一般文獻所指解嚴，是指總統蔣經國 1987 年 7 月 15 日針對當時台灣本島及澎湖地區臨時戒嚴令而言，但是金門和馬祖等所謂「戰地政務區」的臨時戒嚴令，則要一直等到 1992 年 11 月 7 日才告解除。

<sup>6</sup> 《動員戡亂時期懲治叛亂條例》最早是 1929 年《暫行反革命治罪法》、1931 年《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法》頒佈後廢止前法，1948 年再修法頒佈《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1949 年 5 月 24 日立法院通過《動員戡亂時期懲治叛亂條例》，於 6 月 21 日實施。參見薛化元、蘇瑞鏘、楊秀菁（2015，頁 58-64）。

时空下传布不实讯息，则会被课以重罪。但问题是：讯息内容确实与否，以执政者版本为准。惩治叛乱条例对于不实讯息传布行为课以重责，基本上反映执政者对共产主义的想象和心态。<sup>7</sup> 因此，凡是传布与当局口径不一致的讯息，即有涉及叛乱罪嫌之风险。例如 1959 年间，陆军少尉郭振邦向同事说道「假若胡适能任总统，有青年党来领导，中华民国就健全了」，又说「关于台湾选举，根本不是老百姓的意思，真正百姓拥护的人，没有选出来，因为国民党用枪用生命来威胁」又以笔名投书《自由中国》杂志，提及「今天部队基层士气低落，排长级有三分之一公开宣布不干，工作消极者无法统计，班长消极者百分之五」等语，军事法庭认定为「不实消息，足以动摇台湾民心」，判处有期徒刑 7 年。<sup>8</sup>

第七条「以文字、图书、演说，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此一条文通称为「为匪宣传」。这则条文中的「叛徒」定义相当广泛，除当时主要敌人中国共产党外，也指当局所认定之敌对势力；因此定义范围相当广泛。「有利于宣传」则未有客观要件。例如，1968 年间，台南二中教员王伯涵，在课堂上对学发表「共匪兵力强大、反攻大陆无望」等言论，被指「为匪宣传」，遭判处有期徒刑 7 年。<sup>9</sup>

和言论获罪有关的另一特别法，则是《动员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这项法律将「匪谍」界定为「惩治叛乱条例所称之叛徒，或与叛徒通谋勾结之人」，扩张解释匪谍的定义范畴。此外，该法第八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被告「情节轻微而有感化必要者，交付感化」。许多言论获罪者因无法。例如，1966 年间桃园一家制衣公司出纳彭利宏，因为被发现在日记里蒋介石剪报肖像旁书写「混蛋们的狗嘴」等字样，被认定侮辱文字、思想偏颇，裁定交付

---

<sup>7</sup> 誠如學者 Foucault（轉引自劉北成譯，1992）指出，中世紀歐洲執政者對抗瘟疫時，經常採取防堵和隔離策略，藉以瘟疫阻絕在特定空間。近代執政者將犯罪行為視同瘟疫，而將犯罪者或嫌疑人視同染有瘟疫者，將犯罪者隔離在監獄和感化院等矯治機構中。

<sup>8</sup> 郭振邦案，參見：（47）岡字第 0259 號判決書，國防部軍務局，〈張景海等叛亂案〉，國發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B3750187701/0045/1571/11236038/157/012）。

<sup>9</sup> 王伯涵案，參見：（60）初特字第 0049 號判決書，國防部後備司令部，〈王伯涵叛亂減刑〉，國發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A305440000C/0064/1571.62/117）。

感化。<sup>10</sup> 又如，1969 年間空軍通航聯隊士官白光雲將部隊閱覽室《中國空軍》雜誌封面上蔣介石總統肖像，以藍色原子筆塗划圈叉（○×），並書寫稜語，軍事法庭認定為「以有利叛徒宣傳」而判處感化教育。<sup>11</sup> 感化為保安處分，屬不定期刑，因此當事人釋放日期具有不確定性。例如，傅正因不服生教所管教措施，遭延長管訓處分時間。

人們以語言、文字、圖像表達個人思想和情緒，屬於基本人權一環，受憲法保障。但戰後在台灣執政的國民政府當局，為對抗共產主義者所採取的策略正如中世紀防阻瘟疫。當局為阻止極其意識形態在台灣島內蔓延，除了大舉消滅共產黨組織和共產黨人，同時也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視為「病菌」，嚴密監控、逮捕、處置言行任何可能涉嫌和官方不同意識形態者，猶如為防止瘟疫而將「可能帶原者」隔離。這個時期的防堵採取「宁可錯殺一百，也不可放過一個」政策，原本表達個人思想意念的言論，被當成叛亂行為；只因和當局口徑不同，便被當局視為等同於叛亂罪責（藍博洲，2003）。如此不僅產生許多「思想犯」或「良心犯」，更在軍事審判制度扭曲之下，造成許多冤、假、錯案（蘇瑞鏘，2011；蘇慶軒、王奕婷、劉昊，2021）。以「言論獲罪」為對象的研究，指向台灣戒嚴時期以特別法管制下的言論案件，這些案件所衍生的政治檔案，是學者探索當代台灣傳播歷史和傳播法規的重要研究素材。

## 一、言論獲罪研究

過去關於戒嚴時期言論獲罪的研究，多側重在新聞媒體和新聞工作者範疇（如王天濱，2005；呂東熹，2000），這類研究，經常針對新聞從業人員個案為研究場域，號稱為言論自由之研究。似有值得商榷之處：首先，這類研究將「當局對於新聞媒體和新聞工作者的打壓」，等同於「當局對言論自

---

<sup>10</sup> 彭利宏案，參見：（44）審聲字第 0145 號裁定書，國防部，〈馬興生等感化犯結訓案〉，國發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A305000000C/0048/1537.3/7132）。

<sup>11</sup> 白光雲案，參見：國防部，〈空軍防諜案〉，國發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A305000000C/0059/1352/3010）。

由的压制]，实际上言论自由为基本人权，但新闻自由则为维护民主体制之机构权利，二者概念内涵实不相同（林子仪，1999）。

新闻工作者是社会菁英，教育程度高，社会资源具较丰富，一旦被捕则人人侧目。这群人占社会整体人口比例很小。其实，戒严时期一般民众的日常语话、文字书写、邮电通讯，都因为遭受到情治单位监控，因此每天都生活在不确定的风险当中。例如，老百姓在茶余饭后对国事现状发发牢骚、或者写信给朋友陈述困境的文字，都会成为惩治叛乱条例「有利于叛徒之宣传」或「传布不实讯息」等罪名追诉处罚的对象。古籍中所谓「文字狱」、「偶语弃市」，并非戒严时期升斗小民的历史想象，而是生活的日常。先前研究以新闻工作者获罪经验当成言论获罪做研究，不仅混淆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分野，同时把社会菁英经验放大成为社会整体经验，取样似有偏颇。

先前研究多以个案研究为主，因政府档案史料一直未公开，先前学者常取材自前人笔记或当事人口头陈述，在有限素材下从事研究，不啻以管窥天。即便近年来史料次第解密，各种档案公开速度仍然有限。综上所述，言论获罪案件属政治案件中的大宗，但先前学者着墨有限，并未能建立这类案件的整体形貌。

## 二、言论获罪研究的挑战

言论获罪研究是政治案件研究的一环。1990 年以后，许多学者投入政治案件的研究，这个领域汇集历史、法律、政治、社会等学门的学者，各自依照其研究兴趣而取所需要的议题。例如，在法律和政策研究领域，裘佩恩（1997）剖析政治案件的法律类型的演变，以及不同时期法律角色的演变。刘熙明（1999）则探讨两蒋父子不当介入政治审判的角色。蔡墩铭（2004）则聚焦探讨白色恐怖时期等「恶法」的立法和审判问题。江如蓉、翁大钧（2006）以死亡个案为例，探讨戒严时期国家的权力滥用行为。苏庆轩（2008）则探讨 1950 年代政治案件和国家建置的关系。苏瑞锵（2010）则利用大量案件分析政治案件处置各个重要环节。



此外，有些学者则聚焦于具体案件或特定族群进行研究，是以人物身份或组织属性为研究的核心关注。例如，林正慧（2009）、梁正杰（2007）、王汉威（2011）等人针对中共台省工委会案进行研究；曾培强（2009）探讨台湾民主自治联盟案等。也有学者从族群角度进行个案研究。另一方面，也有学者从族裔属性或职业角色进行探讨。例如，蓝博洲（2003）、邱荣裕（2006）、陈建杰（2011）针对客家族群的政治案件进行研究；汪明辉（2006）针对邹族事件讨论；杨翠（2006）针对女性叛乱犯在白色政治事件中的角色；以及陈君恺、苏瑞锵（2006）关于威权时代校园政治事件的探讨等，吕东熹（2000）针对新闻机构受压迫案件。

本研究拟聚焦于「言论获罪」案件。在各种政治案件研究中，「言论获罪」案件有其显著性。首先，言论获罪案件涉及基言论自由侵害，整个社会更因此付出代价，诚如英国阿克顿爵士指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在台湾政权转换过程中，执政者若因权力魔戒之感而重演前朝憾事，并非全民之福。学者经由研究解读并分析言论获罪案件，让史料建构为人权教育的反思素材，做为后事之师，避免台湾公民社会重蹈覆辙，建立史料是上述想法的起点（陈翠莲，2021）。

这个研究最大挑战之一是获取数据母体规模，也就是到底有多少政治案件是因言论而获罪？根据 2021 年行政院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研究报告（叶虹灵，2021，页 6），戒严期间受裁判人数为 13268 人。<sup>12</sup> 可惜的是，除左翼案件之外，先前研究鲜少针对特定类型进行探索。在数量上万的案件中，若以依照《惩治叛乱条例》罪责类型区分，则政治案件问罪类型可区分为非法颠覆、为匪宣传、参与共党组织、包庇叛徒等，「言论获罪」既是显著类型，则应可经由统计获知比例，但先前文献并未针对类型进行统计，因此目前尚无从得知「言论获罪」数量比例。然而，经由初步观察可知，「言论获罪」案件特色在于规模通常较小、但数量多。被告人数通常只有一至二人，案件年份分布相当平均。由于当局和社会大众歧视政治案件当事人，因此从

---

<sup>12</sup> 這項研究報告指出，截至 2021 年 2 月 26 日為止，受裁判人數計為 13268 人，但因有一人多案情況，若將受裁判人不同案件分開，則為 13683 筆（人/次）。參見葉虹靈（2021，頁 6-15）

公开数据中要获取当事人线索并不容易。因此本研究应采何种取径进行探索，值得商榷。

本研究将言论获罪者视为一个群体，进行史料研究。群像研究取径（Prosopography）是历史学门中的一个流派，英国学者 Stone 是最早倡议群像研究的学者。他定义为「对一个特定历史群体的共同特征之考察」（Stone, 1971）；史家搜集某一群历史人物生平事迹、统合这些个别人物故事、再转换成具有一般性意义的历史叙事。历史学者根据研究议题，搜集目标场域的人物史料，并根据研究提问，将传记内容进行排列、统整和呈现，从结构化数据中找出具有显著意义的变项，进行统计分析，藉以了解人物群体生活样态或彼此之间的关系连结，从而再现传主们的整体社会样貌（Mathisen, 2007）。由于史料处理旷日废时，史家在 1990 年代以后借用数据库、内容标记、文本探勘、网络分析等信息科学技术，让数据处理更有效率（翁稷安, 2016；刘昭麟, 2018）。

本研究拟运用上述数字人文研究取径，搜集言论获罪档案，以再现言论获罪者的整体形貌。这个研究将使用政治档案，并因此面对面临政治档案研究的若干挑战。

所谓「政治档案」，是指由政府机构、政党、附随组织及党营机构所保管，与动员戡乱体制、戒严体制相关之档案或各类纪录及文件（苏瑞锵, 2010, 页 28）。一般是指由政府机构所征集和典藏、因政治案件所产生的审判、罪刑宣告以及执行等过程的正式以及非正式纪录（陈进金、陈翠莲、苏庆轩、吴俊莹、林正慧, 2021）。「言论获罪」案件的线索，有极大部分存在政治档案之中。台湾两度政权交替，政治档案逐渐解禁（陈翠莲, 2021, 页 18-19）。自 2001 年迄今，政治档案陆续公开提供研究人员使用，但迄今仍未完全解密。<sup>13</sup>

---

<sup>13</sup> 檔管局徵集檔案迄今共七波，主要是從國防部、軍法局、軍務局、警備司令部，以及調查局等政府機構所管轄的訊問審判發監開釋等檔案史料。其中第一波主要為二二八事件相關，2002 年的第二波開始，主要為戒嚴時期政治檔案，目前處理中的是第六波和第七波徵集的檔案，則主要是由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向國家安全局徵集戒嚴時期監控人身的檔案。

目前政治档案主要来自四个管道，亦即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以下简称「档管局」）、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以下简称「补基会」）、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以下简称「促转会」），以及国家人权博物馆（以下简称「人权馆」）。这四个机构组织各自有其使命，处理有关戒严时期的政治案件。档管局职司国家档案典藏，因此后设数据以档案和产生机关为主。补基会旨在受理政治受难者补偿申请，经认定事实后决定赔偿对象和金额。促转会主要规划和推动还原历史真相、开放政治档案，在过去三年中陆续颁布有罪判决公告。最后，人权馆则因委托、出版和展示相关研究，典藏先前文献资料成果。除了上述三个官方机构来源，还有一个民间打造的数据源，即「台湾浩劫战后政治案件及受难者数字数据库」，补充上述官方数据源之不足。<sup>14</sup> 虽然上述公私机构都和政治档案有关，但由于各机构角色互异、档案运用目的不同，机构分类编码逻辑也不同，每一套数据各自有流水编号和后设数据，不仅建构数据库经费重复，也无法发挥多重机构综效（synergy），从而先前成果不容积累。

综上所述，政治档案采集面对重大挑战，因此必须建构一套系统化的操作模式，以下陈述本研究所采用的方法。

## 参、资料搜集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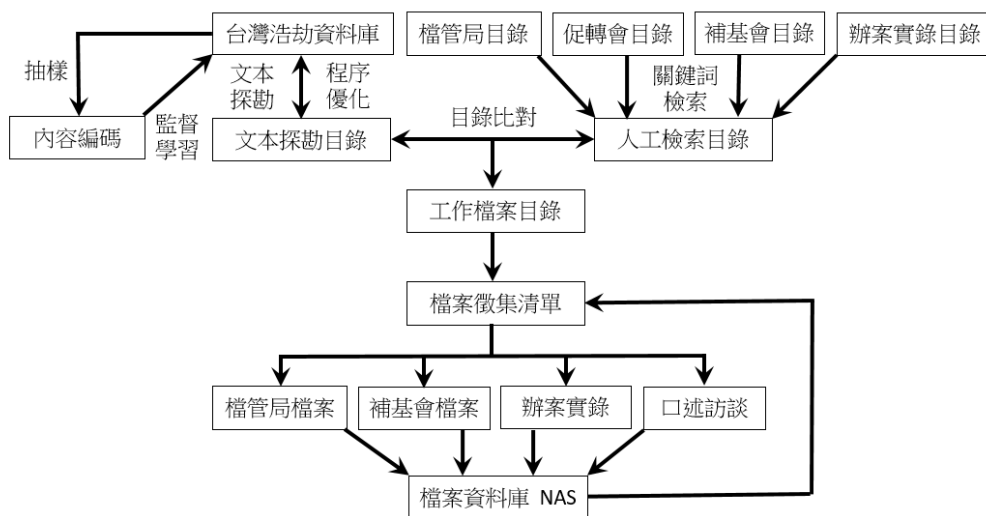
本研究进行期间为 2019 年 5 月至 2020 年 4 月。研究人员所建构一套史料处理模式，研究始于目录列表建构，根据列表搜集人物档案，进行数据清理和结构化，最后则建立数据库，进行统计分析。

本研究资料搜集分成三个主要阶段：目录搜集、目录比对，以及档案征集。步骤如下图所示：

---

<sup>14</sup> 該資料庫為政治受難者張茂雄所創，蒐集政治案件 3250 案，收錄受難者 12541 人（但由於有少數受難者係一人數案，因此實際檔案數量為 13020 筆）。由於該資料庫系個人獨力完成，部分內容仍有缺漏和錯誤。不同案件的案情略述內容品質也有落差。但該資料庫放置於網際網路供公眾查詢，未設取用限制。

图一：数据搜集流程示意图



## 一、建构目录列表

由于本研究以书写文字政治案件当事人为分析单位，「浩劫数据库」所提供之流水编号和后设数据，远比官方数据源丰富而完整，纵使其内容可能存在若干瑕疵，如上所述，本研究仍选择为目录搜集阶段从事文本探勘的对象。目录搜集的目的再建立一个清单，以掌握潜在的数据范围。由于言论获罪案件大多是一人一案，因此本研究目录是以个别受难者为分析单位（而非以案件为单位）。

研究人员一方面运用文本探勘技术，透过「浩劫数据库」案情略要字段记载，辨识出符合「言论获罪」特征的受难者记录。本研究系采用监督式机器学习，进行文本探勘。所以要先以随机抽样取出样本，经由编码员进行人工检视，区分出「符合特征」（正向样本）和「不符特征」（负向样本）的样本，仍后交由计算机进行机器学习。

(一) 人工编码：研究人员先自「浩劫数据库」随机取出 700 笔政治受难者记录，其中 100 则为训练用，600 则用于正式编码。编码员经训练后，先试做 100 则，核对编码结果后修正有出入个案，然后以三天时间针对 600 笔数据进行正式编码。正式编码结果，从分辨出 69 笔正向样本（符合「言论获罪」特征），以及 531 笔负向样本（不符「言论获罪」特征）。两位编码员编码的结果，根据信度公式进行核算，编码员之间相互同意度为 95%。

(二) 监督式机器学习：正式机器学习共计进行三回合。工程师针对 600 笔已标记完成的档案区分为六组，每次以 100 笔进行学习和测试。研究人员使用 Jieba 初始字典进行断词，使用 TF-IDF，将词汇转换为向量，再以线性 SVM 做为分类器。正向样本 68 笔，负向样本 531 笔，未知样本 1 笔。

第一回合机器学习的结果，总共跑出 419 笔正向判断。由于这个结果不如预期，因此研究人员重新检视样本之后，进行第二次学习。第二次回合机器学习的前置作业程序同于第一回合，但新增 3 笔正向样本，减少 2 笔负向样本。亦即 600 笔数据中，包含正向样本 71 笔，负向样本 529 笔，结果共跑出 461 笔正向判断。虽然符合特征样本数目稍微增加，但结果仍和研究人員对于数据规模的估计有出入，因此研究人员进行学习优化程序。

(三) 机器学习优化——断词工具的优化：研究人员首先挑出最高的 10-fold cross-validation F1 数值进行以下优化处理：(1) 置换断词工具，原先断词使用简体版的断词词典，在此换成支持繁体文本的词典版本。第三，根据本研究的需求，将词典客制化。(2) 修正断词方式：研究人员取出权重最高的 200 个词汇，进行人工检视，并逐一修正错误词汇，例如：有利、结识、日记、荒谬言论、演说、辩证法、三七五减租、经常、收听、不满、办公室、阅读、匪书等。(3) 设定文本转换向量门坎：研究人员移除单一字词汇（亦即必须含两个字或以上的词汇方得转换为向量），该词汇至少必须出现在三篇文章中，并且最多不能出现在 7 成以上文章中，始得转换。最后，限制权重分数最高的 5000 个词汇，方得转换为向量。(4) 学习模型也更换为神经网络。<sup>15</sup> 第三回合：正负向样本和第二次学习相同，经过优化之后，总共跑出 861 笔正向判断，数据笔数较先前大幅增加。在机器学习结束后，进行档案目录校正。之所以需要档案目录校正，是因为原先文本探勘的对象为「台

---

<sup>15</sup> 上述優化調整策略，以 (1) 和 (2) 影響較大，(3) 和 (4) 則是因應 (3) 和 (4) 進行調整後的數值。

湾浩劫数据库」中的案情略要字段，因该字段内容来自判决书，判决书本多罗织，加以前人转录质量参差不齐，因此必须交叉比对，以避免误判。

除了使用信息技术进行文本探勘，研究人员也使用同一套关键词，在其它官方数据源进行检索，以撷取言论获罪者的相关记录，以补文本探勘之不足。此处所谓「官方数据源」，主要指的是档管局网页、促转会撤销有罪处分公告，补基会档案目录，以及情治单位办案实录要案纪实等四个来源，研究人员以关键词组「有利\*叛徒\*宣传」、「散\*谣言」以及「传播不实\*消息」进行数据检索。研究人员以关键词「有利于叛徒之宣传」以及「散布谣言或传播不实之消息」键入查询字段，或以正规表达式进行检索。

## 二、目录列表查核和结构化

截至 2020 年 3 月底为止，本研究共获取档案目录 1078 笔，其中共有 823 笔目录来自于研究人员探勘「台湾浩劫数据库」，占档案目录总数 76 %。另一方面，研究人员透过关键词进行人工检索，也获得 255 笔档案目录，约占总量 24%。人工检索经扣除重复之后，检索自文件管局网页的目录有 110 笔（10%）、检索自促转会撤销公告的目录有 66 笔（6%）、检索自调查局出版之五册办案实录《要案纪实》的目录，共有 66 笔（6%）。此外，研究人员处理数字档案内容时，从这些档案中也发现 63 笔目录。获取结果如下：

表一：档案目录获取结果

取得方式	数据源	个别数量	个别比例	小计	合计	
文本探勘	第一次探勘	405	38%	823	1078	
	第二次探勘	418	39%			
人工检索	文件管局目录	110	10%	255		
	促转会撤销公告	65	6%			
	实体数字档案	63	6%			
	办案实录	17	2%			
总计		1078	100%	1078		100%

研究人员建立目录之后，首先针对言论获罪者进行确认，透过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数据库、台湾浩劫受难者数据库，进行盘点，确认当事人个人资料。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日、事件年份、出生地、学历、职业身份等，如下图所示：

图二：言论获罪者之年籍资料

編號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齡	地區	縣市	畢業學校	職業
00065	黃金煌/	男	1928/7/9	33	臺灣	澎湖縣		軍監受刑人
00103	黃鴻基	男	1910/9/10	39	福建	福州市	大學	無業
00130	劉建修	男	1928/11/29	49	臺灣	新竹縣	遞信講習所	商人
00214	陳木金	男	1930/5/10	42	臺灣	新竹縣		商/書攤商
00226	楊達	男	1906/10/18	45	臺灣	臺中市	大學	力行報副刊編輯/作家
00383	謝克倫	男	1922/10/14	35	江蘇	江陰縣		軍監受刑人
00519	葉貽恆/	男	1922/10/28	28	福建	安溪縣		台北女師附小學教員
00586	宋孟韶	男	1926/5/16	25	河北	北平市		受刑人
00592	黃祖權	男	1924/1/21	33	江蘇	上海市		受刑人
00839	張木生	男	1910/4/10	41	臺灣	臺北縣	大學	汐止鎮副鎮長
00912	王士彥	男	1927/9/10	26	浙江	奉化縣		獸醫血清製造所技術員
00947	柯傳松	男	1909/6/8	43	臺灣	南投縣		教員
01006	黃逢開	男	1926/10/29	27	臺灣	苗栗縣	小學	農
01038	洪養	男	1919	33	臺灣	嘉義縣		商
01042	陳森沂	男	1929/11/15	24	臺灣	嘉義縣		軍監受刑人
01088	劉雨雲	男	1925/9/24	30	臺灣	苗栗縣	中學肄業	中油苗栗探勘處事務生
01234	劉效桓	男	1920/6/29	35	山西	祁縣		海軍要港管理處下士
01245	王泛洋	男	1924/9/27	30	湖北	黃崗縣	臺灣大學法律系	台灣新生報南版校對
01295	曹思義	男	1919/3/10	36	安徽	青陽縣	西南聯大肄	台灣大學註冊組職員
01306	王東山	男	1925/11/21	31	江西	九江縣	臺灣大學	基隆港務局課員
01338	徐剛	男	1929/3/23	25	湖北	武昌縣	初中	陸軍19師少尉幹事
01411	張瑞風	男	1926/3/25	29	臺灣	臺北縣		土城鄉公所幹事
01472	雷農	男	1897/5/26	54	浙江	長興縣		自由中國發行人
01574	孫以蒼	男	1928/12/13	22	安徽	宿縣		不詳
01579	趙元林	男	1914/9/19	41	遼寧	旅順縣		台鐵局科員

本研究所征集的档案主要指向四种数据：（一）政治档案：系由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向各机关征集、处理、并典藏之政治案件档案；（二）补偿文件：系政治案件当事人或其家属在 2001 年前后，向财团法人补偿基金会申请补偿之文件，其中部分已经当事人同意公开，系由国家人权博物馆保管，并已转化为数字文件格式典藏；（三）办案实录：系戒严期间司法行政部（今法务部）调查局根据侦办案件所撰写之内部参考书籍，其中部分内容为言论相关之政治案件，共计八册，目前以已为数字档案形式保存；（四）口述访谈：解严以后迄今，由公私立机构委托学者专家向政治案件当事人或其家属做的口述历史访谈，其中部分当事人系言论获罪，部分口述访谈为结

案报告，另有若干则已正式出版，国家人权博物馆典藏之目录，西对较为完整，并典藏上述口述谈之纸本或电子档案。

研究团队人员经比对目录之后，为每一当事人建立资源清单。关于本研究团队所建立之列表，该列表系以言论获罪者为轴，在电子表格上建立窗体。如下图所示。所有进一步的数据细节，参见以下图示：

图三：档案目录中的数据源

編號	姓名	性別	蒐集管道	核對	政治檔案	補償文件	辦案實錄	口述訪談	資料來源
00065	黃金煌/	男	文本探勘/第二次	確認					0
00103	黃鴻基	男	人工檢索/檔管局	確認	1				1
00130	劉建修	男	文本探勘/第二次	確認		1		1	2
00214	陳木金	男	文本探勘/第一次	確認					0
00226	楊達	男	文本探勘/第一次	確認	1			1	2
00383	謝克倫	男	文本探勘/第二次	確認	1				1
00519	葉貽恆/	男	人工檢索/促轉會	確認	1		1		2
00586	朱孟韶	男	文本探勘/第一次	確認					0
00592	黃祖權	男	文本探勘/第二次	確認					0
00839	張木生	男	人工檢索/檔管局	錯誤					0
00912	王士彥	男	文本探勘/第一次	錯誤					0
00947	柯傳松	男	文本探勘/第二次	偽陰性	1				1
01006	黃逢開	男	人工檢索/檔管局	錯誤		1		1	2
01038	洪養	男	文本探勘/第二次	錯誤					0
01042	陳森沂	男	文本探勘/第二次	確認					0
01088	劉雨雲	男	人工檢索/檔管局	確認	1				1
01234	劉效桓	男	人工檢索/促轉會	確認	1				1
01245	王泛洋	男	文本探勘/第二次	確認					0
01295	曹思義	男	文本探勘/第二次	確認	1	1		1	3
01306	王東山	男	文本探勘/第二次	確認	1				1
01338	徐剛	男	人工檢索/檔管局	確認	1				1
01411	張瑞風	男	文本探勘/第一次	確認	1				1
01472	雷震	男	人工檢索/促轉會	確認	1				1
01574	孫以蒼	男	文本探勘/第二次	確認					0
01579	趙元林	男	文本探勘/第二次	確認					0

此外，从官方与民间数据库均提供了当事人当时所述处置，包括类型和判决书编号，可做为交叉比对的数据。



图四：档案目录中的判决书类

編號	姓名	初審字號	覆判字號
00065	黃金煌	47, 審聲, 0001 / 48, 警審更, 0007	47, 普抗映, 0062 / 47, 覆普抗晶, 0062
00103	黃鴻基	39, 安澄, 1260	
00130	劉建修	65, 諫判, 0078	65, 曉陽覆普, 0100 / 66, 曉陽, 0522
00214	陳木金	61, 初特, 0053 / 61, 秤理, 3980	
00226	楊達	39, 安潔, 0666	
00383	謝克倫	49, 警審聲, 0005	
00519	葉貽恆	39, 安潔, 2598	39, 勁助, 1057
00586	宋孟韶	43, 審三, 0052	44, 理琦, 1357
00592	黃祖權	39, 安潔, 3152	39, 勁助, 1231
00839	張木生	39, 安澄, 3426	61, 覆普教丙, 0043
00912	王士彥	42, 台高訴, 0007	
00947	柯傳松	41, 安潔, 3189 / 42, 安度, 0634	42, 廉靡, 0001
01006	黃達開	41, 安潔, 1730	
01038	洪養	41, 安潔, 3148 / 42, 安度, 0170	41, 防隆, 2440 / 42, 廉靡, 0159
01042	陳森沂	46, 安訴, 2778	43, 審復, 0061
01088	劉雨雲	43, 審三, 0115 / 43, 審復, 0041	43, 清澈, 1461 / 43, 清澈, 2645
01234	劉效桓	43, 觀瞻, 0441	
01245	王泛洋	42, 廉度, 0089	
01295	曹思義	43, 審聲, 0029	43, 清澈, 1122 / 43, 清澈, 1817
01306	王東山	45, 典兼, 0666	
01338	徐剛	42, 廉度, 0155	
01411	張瑞風	43, 審三, 0092	44, 理琦, 0034 / 44, 理琦, 1211
01472	雷震	49, 警審特, 0035	49, 覆高淦, 0068 / 49, 澈淦, 0563
01574	孫以蒼		
01579	趙元林		

### 三、档案史料调阅

本研究之档案征集系透过人权馆协助，其中政治档案系向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发文申请数字档案。其余三种档案，则皆向人权馆调阅。由于本研究共涉及上千名政治案件当事人，征集政治档案的数量非常庞大、程序也较为复杂，也是本研究最花时间的过程。政治档案可分为项目型卷宗和汇编型卷宗两大类型。

项目型卷宗是针对特定人物（被告）或案件所建立的档案。项目型的卷宗以当事人为单位所产生的数据。例如，作家柏杨（本名郭衣洞）档案称为〈郭衣洞叛乱案〉。当一个案件涉及多人时，则用第一位当事人姓名来命名，例如〈陈军叛乱案〉是以陈军命名的案卷，这个案卷中包含 15 位当事人的档案。项目型档案通常是侦查 / 起诉 / 审判阶段产生的文件。项目型档案政治档案中仅有少数案件为个人从侦讯至刑满开释的全宗档案，档案大多数内

容集中在侦讯和审判阶段，因此当事人发监执行以后的纪录，就要仰赖汇编型卷宗。

汇编型档案卷宗，则是将同时期内容相似的档案为单位，打包为一个大型档案。这类档案共同特色，是汇集多数案件而非单一案件，每个汇编型档案里都包含众多当事人档案，并以第一位当事人姓名替档案命名。例如，例如，〈蒋文正等叛乱案判决书〉一案涵盖 1969 年至 1971 年间 50 位「为匪宣传」案件当事人向国防部军法局申请覆判的判决书。汇编型档案的卷宗类型区分四类：程序、书类、机构，以及案件类型。程序类卷宗是以同一程序为主的汇整档案。例如「发监执行」或「结训开释」；书状类卷宗则是同一种法律书类集合，例如某段期间的判决书；机构类卷宗则是将某段期间同一机构(如陆海空军总部)卷宗加以汇集；最后，汇整档案卷宗，则是将同一类型的多数档案，汇整在同一批卷宗内，例如〈非法颠覆案〉、〈违法案〉、〈叛乱案〉、〈没收财产案〉等。

表二：政治档案典藏方式列表

类型	分类方式	卷宗内容	案件举例
专案	人物	单一案件，以当事人命名的所有卷宗	廉亚东案
	事件	单一案件，以事件命名的所有卷宗	鹿窟案
汇编	程序	多数案件，汇整同一程序的卷宗	王士珍等感化结训案
	书类	多数案件，汇整同一书类的卷宗	蒋文正等叛乱案判决书
	机构	多数案件，汇整同一机构的卷宗组合	56年度空军防谍案
	案件类型	多数案件，汇整同一类型的卷宗	39年非法颠覆案

根据政治档案典藏的分散特性，研究人员在征集档案时，必须考虑下列因素：

(一) 同一当事人档案须多次征集：由于文件管局数据系以卷或案为单位，这些卷或案分由不同单位提供，因此研究人员征集某一特定当事人档案时，可能需要发出二至四则征集需求，以涵盖案主不同阶段文件。例如，以陈永川为例，侦查到起诉阶段的档案，在国防部后备指挥部的〈陈永川叛乱嫌疑〉，初审至覆判的档案，则在国防部军法局〈陈永川叛乱案〉，此外减刑相关档案，国防部后备司令部〈陈永川叛乱减刑案〉。陈永川案例并非少数个案，类似例子所在多有。因此当研究人员向檔管局申请调阅，有时未必一步到位，而需要尝试错误、反复申请，至档案全部到齐。

(二) 调阅成功的档案史料需要过滤、归类和登录：研究团队人员所取得档案都是以页为单位的数字化低分辨率扫描图像文件，以光盘或云端存取方式传递。多以档号为档案命名，置放在多个档案夹中。研究人员通常重新为档案命名，并检视档案是否为征集对象。由于政治案件中有许多当事人为同名同姓、或一人多次遭问罪，因此必须由研究人员逐笔检视，确认征集对象无误，才能列为可用档案。

(三) 经过过滤、归类和登录之后的档案必须再经过研究人员判读，以确认是否言论获罪案件：文本探勘获取的目录列表，未必能保证档案性质确实属于「言论获罪」，必需再经过人工检视档案内容，才能判定。数据集可能出现种种错误，原因不一。有可能出于原始文本质量瑕疵、有可能是因为加权系数使用不当、也有可能来自于当年法官判决缺乏一定标准，影响文本探勘效果。以下图五，自左方起算第四栏的「核对」字段，即是研究人员经核对之后，标示核对结果正确或错误，用来计算文本探勘错误的比例。

图五：档案目录中的核对

編號	姓名	性別	核對	行為事實	法條	主刑	從刑1
00065	黃金煌/	男	確認		肅匪，8-1-2	交付感化，3年	
00103	黃鴻基	男	確認	先後借覽禁書	懲叛，7	有期徒刑，7年	褫奪公權，5年
00130	劉建修	男	確認	購買借覽禁書	肅匪，8-1-2	有期徒刑，7年	褫奪公權，4年
00214	陳木金	男	確認	書攤販賣照片	肅匪，8-1-3	交付感化，3年	
00226	楊達	男	確認	報紙刊登宣言	懲叛，7	有期徒刑，12年	褫奪公權，10年
00383	謝克倫	男	確認	課堂演唱歌曲	肅匪，8-1-2	交付感化，3年	
00519	葉貽恆/	男	確認		懲叛，7	有期徒刑，12年	褫奪公權，10年
00586	宋孟韶	男	確認	服刑監所書寫字條	肅匪，8-1-1	交付感化，3年	
00592	黃祖權	男	確認	服刑監所書寫字條	肅匪，8-1-2	交付感化，3年	
00839	張木生	男	錯誤		懲叛，2-1	死刑	褫奪公權，終身
00912	王士彥	男	錯誤		刑法，100-2	有期徒刑，1.5年	褫奪公權，2年
00947	柯傳松	男	偽造性	幫助印製書籍文件	懲叛，2-1	有期徒刑，12年	褫奪公權，6年
01006	黃達開	男	錯誤		懲叛，2-1	死刑	褫奪公權，終身
01038	洪養	男	錯誤		懲叛，2-1	死刑	褫奪公權，終身
01042	陳森沂	男	確認	抄錄匪酋語錄	肅匪，8-1-2	交付感化，3年	
01088	劉雨雲	男	確認	礦場發表演論	懲叛，7	有期徒刑，7年	褫奪公權，3年
01234	劉效桓	男	確認	軍營散佈謠言	懲叛，6	有期徒刑，12年	褫奪公權，3年
01245	王泛洋	男	確認	閒暇發表演論	肅匪，8-1-2	交付感化，3年	
01295	曹思義	男	確認	詩文評政	肅匪，8-1-2	交付感化，3年	
01306	王東山	男	確認	反動言論	肅匪，8-1-1	交付感化，不定期	
01338	徐剛	男	確認	撰寫煽惑文字	肅匪，8-1-2	交付感化，不定期	
01411	張瑞風	男	確認	幫助印製書籍文件	懲叛，7 / 肅匪，9	有期徒刑，7年	褫奪公權，3年
01472	雷農	男	確認	出版自由中國	懲叛，7 / 懲叛，9	有期徒刑，10年	褫奪公權，7年
01574	孫以蒼	男	確認	發表荒謬言論	肅匪，8-1-2	交付感化，1年	
01579	趙元林	男	確認	閱讀反動書刊	肅匪，8-1-2	交付感化，0.5年	

#### 四、数据结构化和典藏

此处所谓「结构化」，是指研究人员使用软件工具将每一个别档案中相同的数据加以归整，形成一个数据表单，以便能够进行对比或运算。本研究使用电子表格软件（如 MicroSoft Excel 或 Google Spreadsheet）进行结构化。研究人员先根据研究目的设定字段（如姓名 / 生年 / 卒年 / 处置类型等），再根据字段顺序，将每一笔当事人数据填入窗体。如此一来，经由电子表格软件机制、将所有当事人数据变成具有固定字段、固定格式与顺序的数据集。这种已经结构化的数据，方便检视、清理、除错、运算以及连结，因而可以用于未来的「知识再生产」用途。

数据结构化之后，需要有机机制可以加以管理和典藏。数字典藏机制包括使用云端和行动储存载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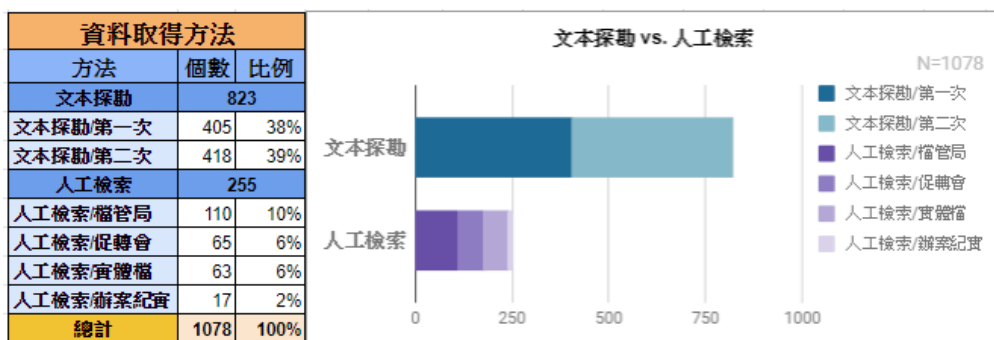
（一）原始资料的仓储：本研究获取的大量数字化档案，均储藏在云端硬盘。所有档案经过命名之后储存于云端档案夹。所有档案夹命名需依循共

同规则，命名的一致性可确保研究人员能够实时辨识档案层级和位置。档案夹名称包括个人编号、当事人姓名、数据源，以及案名，例如，檔名〈06405\_宗坤福\_檔管局\_宗坤福叛乱〉指向 PRID 编号 06405 的当事人宗坤福，自档案局调阅之文件名为「宗坤福叛乱」。

原始数据的仓储区分为两种类型：(1)「主要档」是以当事人姓名编号命名、用于检索查询的档案；(2)「分类档」则是以来源管道类型分类、用于储存/备份的档案，类型包括：政治档案、补偿文件、口述访谈、办案实录等。此外，(3) 上述档案经复制为备份，置于另外档案夹和行动硬盘。

(二) 后设资料：本研究人员将所有当事人数据纳入一张目录窗体，建置在网络电子表格 Google Spreadsheet 环境。这个环境具有多重机制：(1) 盘点：每一笔数据目录的档案完成收录时，均在电子表格上确认，以确保档案不会重复或缺漏；(2) 防漏：本研究每一笔数据均有多项数据，但原始数据未必完整，为防止数据缺漏，必须有辨识缺漏机制，电子表格由栏和列构成数据矩阵，一旦数据有缺漏，用户很容易辨识；(3) 补白：由于有些数据不完整（例如出生年份），为尽可能让数据能够齐全，因此部分数据系经电子表格的函数公式进行推估（例如，以事件年份减去出生年份，可推估出生年份）；(4) 侦错：由于部分数据系人工查核后手动输入，为防止产生错误（防呆），可设定数据范围以侦测错误，例如事件年应该大于 1949 年，小于 1990 年，倘若输入数字大于或小于上述范围，则窗体自动以红字标示可能发生问题的字段；(5) 实时统计 / 可视化：电子表格上每一字段数据均经过规格化处理，每输入一笔数据，函数公式即改变图表数值。如图六所示：

图六：实时统计与可视化



(三) 实时查询：研究人员将电子表格产出的数据转换为可视化的实时报表，这个报表显示研究人员在查询当下所拥有的数据数量和类型，并链接 NAS 数据库中的档案。研究人员可以经由报表产出的统计结果，获知当事人整体样貌。以下说明初步的资料分析结果。

## 肆、资料分析

诚如前述，本研究主要目的在言论获罪者的群像研究，亦即以档案史料为对象，透过软件工具进行结构化，建构一个言论获罪者的数据库，透过史料累积和统计，试图描绘言论获罪者样貌的轮廓。研究人员在 2019 年至 2021 年间，经过将近一年努力产出若干初步成果。以下资料分析将分为两个面向，先陈述言论获罪者的整体形貌，再陈述本研究所获得的洞见。

### 一、言论获罪者的整体形貌

首先，在目前已获取的 1078 笔档案目录当中，以当事人出生年数据最完整，透过事件年分推估后全部字段均已填满。其次是当事人出生地，共获取有 1076 笔；位居第三的是职业身份，共获取 1075 笔目录。其中出生年份、出生地点、事件年份、职业角色等资料大都已经将近完备。但则是教育程度数据输入比例最低，仅获取 202 笔，占整体数据 18.7%。如下表所示：

表二：当事人年籍数据采集数量

基本数据	已登录数据	缺漏资料
出生年份	1078	0
出生地	1076	2
事件年份	1073	5
职业角色	1075	3
教育程度	202	876

根据目前所获取的 1078 笔资料，言论获罪者当中，出生地点在台湾者 365 人（34%），出生于中国大陆者 711 人（66%）。根据叶虹灵（2021）使用促转会数据库所做的分析，发现整体数据库出生地在台湾者占 55%，出生于中国大陆者 45%。从这项比对可知，出生于中国大陆者，言论获罪比例大于整体受裁判者比例。这或许和当时中国大陆来台者的职业有关，后面交叉分析再做讨论。

其次，出生年度分析，拟探究言论获罪者的世代，以及获罪年度。<sup>16</sup> 关于第一个问题，当事人出生年度的分析，在 1078 笔资料当中，当事人出生年份从 1895 年到 1960 年，其中 1920 年代出生的当事人比例最高，共 477 人（44%）；其次是出生于 1930 年代者共 269 人（25%）；第三为 1940 年代出生者，计 113 人（11%）。如下表所示：

表三：当事人出生年份分布

年代	人数	百分比
<1900s	8	1%
1900s	27	3%
1910s	106	10%
1920s	477	44%
1930s	269	25%
1940s	113	11%
1950s	73	7%
1960s	1	0%
合计	1074	100%

<sup>16</sup> 研究人員紀錄當事人出生年度，若無出生年度，則以發監執行書類內「發監執行年度」減去「當事人當年年齡」，推算出當事人出生年度。有些當事人被判刑兩次以上，倘若罪名不同時，則以言論獲罪案件發生時的年齡為準。倘若多次都是言論獲罪案件，則以第一次獲罪年度為準。

另一个重要的人口特征，是当事人获罪年纪。研究人员将每十岁归为一群组，统计年龄分布状态。结果发现，21 至 30 岁这个群组人数最多，总共有 401 人，占总数 37%；31 至 40 岁群组次之，共 304 人（28%）；41 至 50 岁的群组居第三共 204 人（约 19%）。小于 20 岁的群组共有 84 人（8%），大于 60 岁的当事人有 7 人。若把 21 岁至 40 岁这两个群组人数相加，则占 65%。叶虹灵（2021）的年龄分布统计结果则为 19-29 岁占 42.53%，30-39 岁占 29.54%。二者互相对照，大致符合，也就是说，言论获罪者以年轻人为主。资料如下所示：

表四：当事人年龄

年龄	人数	比例
< 21	84	8%
21~30	401	37%
31~40	304	28%
41~50	204	19%
51~60	73	7%
61~70	5	0%
> 70	2	0%
合计	1073	100%

由于言论获罪的特别法适用长达四十年，研究人员分析言论获罪的时间配置。也就是说，到底「言论获罪」案件时间分布是否集中少数年份？抑或分散在各年份？研究人员以当事人宣判年为对象，以每十年为一群组加总后进行统计。结果发现，案件发生在 1950 年代为最多，共 295 笔（42%），1960 年代共 225 笔（29%），1970 年代为 237 笔（22%），甚至一直到 1980 年代，还有 59 笔（6%）。根据叶虹灵（2021）使用促转会数据库所做的分析，发现 1950 年代案件为最高峰，案件比例占整体 50.7%，言论获罪案件虽也是以 1950 年代为最多，但数量落差相对较为缓和。如下表所示：



表五：言論獲罪事件發生的年代

年代	人數	比例
1940s	13	1%
1950s	454	42%
1960s	307	29%
1970s	237	22%
1980s	59	6%
合計	1070	100%

本研究共獲取職業類型資料 1075 筆，其中軍人、警察和榮民身份當事的人數最多，計 354 人 (33%)，約占 1/3。其次是公教人員，計 188 人 (17%)；接下來則是工人和商人，二者合計 227 人 (21%)。往昔人們可能存在刻板印象，認為媒體從業人員以筆耕為業，因此因言論獲罪的風險，應該很高，事實卻不然。在當事人當職業分布的統計中，從事媒體行業者僅 28 人 (3%)，數量低於研究人員的預期，不但少於軍警、公教人員、工商人士，甚至更低於學生、受刑人、交通運輸或農林漁牧等行業人士。

表六：言論獲罪者的職業身份

職業身份	人數	比例
軍警榮民	354	33%
公教人員	188	17%
工	127	12%
商	100	9%
學生	62	6%
不詳	50	5%
受刑人	44	4%
農林漁牧	41	4%
交通	32	3%
媒體	28	3%
無業游民	25	2%
服務業	10	1%
其他	14	1%
合計	1075	100%

除了一般基本资料统计，本研究也做了数据源的分析，这个分析主要为协助研究者了解并调整档案搜集策略。言论获罪档案总共来自四种管道：文件管局典藏数字档案、口述历史访谈纪录、情治单位办案实录，以及补偿基金会申请文件。其中来自文件管局的数字档案数量最多，已获取 304 件（71%），其次口述访谈纪录共 48 笔（11%），情治办案实录有 41 件（10%），最后是补基会申请文件，共 38 笔（9%）。如下表所示：

表七：资料管道分布

资料管道	档案数	比例
政治档案	439	73%
口述访谈	76	13%
办案实录	53	9%
补偿文件	37	6%
合计	605	100%

由于政治档案是官方立场，因此研究人员解读档案料时，希望能有不同来源进行交叉比对，这也就是「孤证不立」原则。目前言论获罪者的四种主要管道当中，政治档案和办案实录主要呈现官方立场，而补偿文件和口述访谈则反应当事人意见，但是若要交叉比对，研究人员至少必须有两种以上的不同数据源，因此研究团队也有必要针对数据管道进行盘点。

在 1078 笔目录中，共有 569 笔（53%）尚未取得档案，亦即本研究已经取得的档案占 47%。其中共有 430 笔目录有单一来源的档案（40%），62 位当事人目录拥有两种数据源（6%），17 位当事人目录有三种数据源（2%）；当事人拥有四种资料管道的数量是 0。其中拥有第二类和第三类资料的笔数共 79 件。从这个数字可知，目前言论获罪者档案仍以政治档案为主，缺乏当事人或其家属的自我陈述，因此如下表所示：

表八：言论获罪案件的数据源

来源数量	案件数	比例
一种	430	40%
两种	62	6%
三种	17	2%
四种	0	0%
无	569	53%
合计	1048	100%

许多言论获罪者曾在 1999 年间曾向不当审判补偿基金会申请补偿，文件内容有部分为当事人事后自我陈述，应该可以补强此一空白，但目前尚未完全开放研究使用。

在本研究刚开始之时，研究人员预设因言论而获罪者，应该都是以〈惩治叛乱条例〉第 7 条「有利于叛徒之宣传」（惩叛 7）和第六条「散布谣言或传播不实之消息，足以妨害治安或摇动人心」（惩叛 6）。但经过统计以后，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根据目前已经搜集到的 616 个案之中，以惩叛 7（为匪宣传）论罪者有 397 人（64%）；以惩叛 6（传布谣言）论罪者有 24 人（7%）。另一方面，以检肃匪谍条例第八条一项二款「情节轻微有感化之必要」论罪者有 166 人（27%），以〈惩治叛乱条例〉第 2 条（包括 2 条 1 和 2 条 3）论罪者有 44 人（7%），适用其它法条者有 15 人（2%）。这些统计数字说明「言论获罪」处置的复杂性，当情节严重时，案件被认定为「非法颠覆」，当事人遭判死刑等重刑；而当情节轻微时，当事人则交付感化。言论获罪者适用法条的初步统计，如下表所示：

**表九：适用法条类型**

适用法条	案件数	比例
惩叛 7	397	64%
惩叛 6	24	4%
惩叛 2	44	7%
肃匪 8-1-2	166	27%
其它	15	2%
合计	616	100%

进一步分析，在 446 件被认定为言论获罪且判刑的案件中，一般案件占 215 件（48%）。被认定为连续犯的案件，则有 183 件（44%），也就是说，书写两则「反动文字」或先后向人发表两次「反动言论」，就可能会被认定为「连续犯罪」而加重罪刑。在言论获罪案件中，连续犯的认定，显然相当宽松，遂使连续案件数量，几已接近一般案件的数量。另一种常见的类型是竞合案件，计 36 件（27%），所谓竞合，是指数种罪名同时成立，例如，同时宣告当事人「知匪不告」和「为匪宣传」罪责，而可能使得刑罚加重。最后，还有一些其它类型，例如，共同、帮助、教唆等，计有 12 件（7%）。

表十：当事人遭受处置之类型

适用法条	数量	比例
一般	215	48%
连续	183	4%
竞合	36	27%
其它（共同/帮助/教唆）	12	7%
合计	446	100%

本研究也登录当事人遭受处置的类型，在 571 件已登录的处置中，判处有期徒刑的案件为 280 件（49%）；交付感化案件，计 261 件（46%）；死刑 17 件（3%）；无期徒刑 5 件（1%）；其它 8 件（1%）。这些数字包括认定为错误和伪阴性的案件。

表十一：当事人遭受处置之类型

适用法条	数量	比例
有期徒刑	280	49%
交付感化	261	46%
死刑	17	3%
无期徒刑	5	1%
其它	8	1%
合计	571	100%

研究人员也针对「有利于叛徒之宣传」所示用之媒材进行分析。在已登录的 571 个案件中，文字获罪者居冠，数量为 307 件（54%）；语言获罪者次之，204 件（42%）；同时涉及两种媒材者，17 件（3%）；图书 4 件（1%），图像 3 件（1%）。

表十二：当事人言论获罪使用之媒材

适用法条	数量	比例
文字	307	54%
语言	240	42%
复合媒材	17	3%
图书	4	1%
图像	3	1%
合计	571	100%

在检视言论获罪的情境时，研究人员发现，许多案件发生空间和获罪媒材形态似乎有一定关连，因此研究人员进一步分析言论获罪的处所。因此我们试图从案情的文字叙述中，萃取出空间相关的词汇，然后再和媒材作交叉分析。

根据初步统计，总共找出 157 则案件在案情陈述中使用空间相关的词汇。其中以因文字获罪者发生频率最高的在军营，共 34 件。校园次之，14 件；监所第三，8 件。再针对语言获罪分析，发生频率最高的空间是校园（40 件），军营次之（11 件），监所第三（10 件）。军营、学校和监所都是高度集体生活的情境；高度集体生活也正是有利于实施高度监控的环境，从而也容易因为言论获罪。

表十三：言论获罪的空间情境

媒材类型	校园	军营	监所	工作处	街头	住宅
文字	14	34	8	2	7	0
语言	40	11	10	13	2	9
图书	0	1	0	0	0	0
图像	1	0	1	0	0	0
多重媒材	1	1	2	0	0	0
总计	56	47	21	15	9	9

然而，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即便在高度监控下，人们还是会透过言论表达不满。在以人工检视文字获罪案件时，我们发现许多文字获罪案例和「厕所」有关（例如，在厕所里书写「反动标语」）。因此研究人员统计文字获罪案例中厕所书写数量，其中军营最多（18件），校园次之（6件），其它厕所则位于戏院、厂区和眷村。

表十四：厕所里的言论获罪案件

案发地点	数量	比例
军营	18	62%
校园	6	21%
戏院	2	7%
厂区	2	7%
眷村	1	3%
合计	29	100%

由于档案征集步调缓慢，本研究目前尚未完成所有资料的征集，因此上述各项统计均属「不完整统计」。尽管如此，上述统计展现一个可能性，就是研究者透过数字工具，建置模块化的统计机制，因此研究人员可以随着数据征集进程，看到当下资料分布态样。

## 二、目前研究的启示

虽然本研究是一个初探研究，但从为期一年的工作过程中，体会档案史料搜集不易一些心得。以下从三个面向进行叙述。

（一）「言论获罪」档案 / 案件界定的不确定性：本研究数据处理流程的重点之一，是档案的结构化，这项涉及分类和编码。但在文本探勘阶段，即已发现机器学习结果不如预期，经过人工调整后产出资料稍佳。<sup>17</sup> 其后研

<sup>17</sup> 事後推測，造成機器學習效果不佳，可能有兩個原因：（1）用於探勘的文本，品質良窳不齊：本研究擷取台灣浩劫資料庫「案情略要」欄位。這個欄位當初是由志

究人員閱讀多筆數據以後，發現文字探勘效能未如理想，可能和源自判決本身標準不一致。也就是說，同樣屬「發表演論」判決結果却未必相同。茲舉一例，1955年台北工專學生宋錫璋為台針公司工務員，被指控先前任職高雄廠時曾與同事和合唱農民分田歌，又向該廠工人職員等宣稱「將共產主義像宗教家傳播福音一樣傳播出去」，以及在宿舍中歌唱中共同歌。軍事法庭最初以他「發表不滿現實言論、但情節輕微」，裁定交付感化，但核覆時總統府秘書長張羣認為應再飭詳加偵查，以昭慎重。法庭援引「連續以演說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改判有期徒刑12年、褫奪公權10年。再次核覆時，蔣介石總統認應從重量刑，二度退回原判決之後，法庭改以「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着手實行」判處死刑定案。經過數次核覆之後，刑度從「交付感化」演變為「連續為叛徒有利之宣傳」，再演變為「非法顛覆」。這種判決標準的不穩定（也就是冤、假、錯案）使得無論是探勘或分類增加困難。

進一步看，言論獲罪案件存在「偽陰性」和「偽陽性」的錯誤。「偽陰性」和「偽陽性」本是生化檢測語彙，原用於檢測錯誤的不同態樣。此處則用來指涉政治案件是否為言論獲罪案件、推斷未合致的兩種類型。

所謂「偽陰性」錯誤，是指法律事實符合言論獲罪構成要件者，但判決結果却以其他罪名相繩。偽陰性錯誤可能是重判，例如以上述案例中宋錫璋原為言論獲罪，却遭以「非法顛覆」罪名判處死刑。偽陰性錯誤也可能是輕判，例如宜蘭礁溪國校教員張佛樹，因在當地青年節慶祝大會發表「國父推翻滿清」演講，事後被指控演講內容有問題，因此被捕。但最後以他辦公室發表「反共義士携械投誠，系怕死，沒有國家民族觀念」等言論交付感化。辦案人員改變法條和處置刑度，恐和言論內容涉及國父個人事物難以公開討論，故改以輕罪相繩。

---

工輸入資料，但由於輸入資料字數出入甚大，摘要品質也有落差，因此影響機器判讀結果。（2）加權：事後研究人員在處理機器學習過程中，雖以獲取數和精確度（recall/precision）所建構的F1係數為準，在過程中採用了若干詞彙當做加權，雖然探勘結果增加獲取件數，但加權後的增加的件數，人工判定錯誤比例也較大。

「伪阳性」错误，则是指办案人员无法问罪，但却又不愿承认错误无罪释放，因此硬加上罪名。例如陈李碧霞之父李乔松，因涉及左翼事件遭政府缉捕。办案人员始终无法加诸罪名，于是找来另案被告李汉堂指证李碧霞长住友人家时经常宣讲中共军队和大陆进展情形，将李碧霞以「连续以演说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判处有期徒刑 7 年，褫夺公权 5 年。<sup>18</sup> 通常「伪阴性」错误较容易直接由判决书中察觉，但「伪阳性」错误则必须有当事人或家属陈述，若无当事人方数据进行交叉比对，则无法察觉。

「伪阴性」和「伪阳性」错误，凸显戒严时期政治案件普遍「因人而治」的问题，也造成资料搜集判断上的雾区。

(二) 档案史料的完整程度。史料完整性是所有研究者都企求而又难以达到的状态，政治档案尤其是如此。档案史料的完整程度可以从两个面向观察，一是言论获罪者之间数据完整程度的比较，另一则是任一言论获罪者数据类型完整与否的比较。

就言论获罪者之间数据完整程度而言，不同的言论获罪者，其档案完整程度有落差。档案史料本搜集不容易完整。一方面，是指当整体档案的完整性，也就是「所有当事人皆可找到档案」。本研究标定的 1078 名当事人中，目前有 509 人（47%）已经取得一种以上的资料，但仍有 569 人（53%）仅有目录而尚未取得档案数据。为尚未取得所有档案数据的原因，不仅因为本研究针对上千笔目录、档案数量庞大，也因为有些档案目前未见于各种目录，因此根本无法调阅。其次，政治档案结构复杂，导致调阅档案时程旷日废时，再加上研究工作需要具备相当先前知识，因此即便本研究已经藉助数字科技协力，仍然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

另一方面，任一言论获罪者数据类型完整，则是指当事人数据的「内部完整性」。亦即「每一位当事人所有阶段的档案皆可找到」。如前所述，每一个当事人的资料，依照时序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逮捕、留置和侦讯；（2）起诉、初审、上诉、覆判；（3）发监执行、移监；以及（4）刑满开释。

---

<sup>18</sup> 陳李碧霞案，參見：（43）審 3 字第 26 號判決書，國防部軍務局，李君處有期徒刑七年褫奪公權五年，〈廖史豪等案〉，國發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00225000/125/061）。



每一个阶段都产生档案，但由于当时档案分由不同机构典藏保管，因此当档案被征集至档案管理局，系根据档案产生机构命名和分类，而使同一人档案分散于不同卷宗。由于先前保存机构典藏状况不同，因此常有缺漏。本研究所获数据中，鲜少有言论获罪者所有档案全部到位，完整性因此打折扣。

## 肆、结论

本研究是一个初探性质的研究，研究人员经由数为人文取径人文取径撷取政治档案，试图再现戒严时期言论获罪者的整体样貌。

在法治国家，发表言论是一种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但战后在台湾执政的国民政府当局，为把防堵共产主义滋长，采取严密惩罚和规训策略。不仅将异议者均视为叛徒，更将思想言论直接指为叛乱，致使四十年间造成许多冤、假、错案。以「言论获罪」为对象的研究，指向台湾戒严时期以特别法管制下的言论案件，这些案件所衍生的政治档案，正是学者探索当代台湾传播和人权历史的重要素材。

本研究旨在建立一套政治档案的史料搜集和结构化方法。这个由研究者和信息技术共同协力的模式，在处理数据时分为三个阶段：（一）建构言论获罪者清单；（二）档案资料征集和整理；（三）数据结构化和统计。

在建构言论获罪者清单阶段，研究人员先以少量数据进行人工编码。再以编码结果，进行文本探勘。经由二回合的监督式学习取得初步清单，接着再根据此一列表进行滚雪球式的目录比对、逐次累积目录数量。第二个阶段是档案征集和整理，研究人员根据目录向文件管局申请调阅档案，并萃取档案后设数据。在最后一个阶段，经过查核和排序的档案，依序储存至云端数据库，纳入云端电子表格，实时产出统计结果。

本研究有以下两项成果。首先，本研究整合新闻、历史和信息科学技术，发展出一套档案史料搜集模式。这套模式结合研究者和数据库，可处理大量数字化档案史料，让研究者者能随时监控档案史料搜集进度，并能够随时取用这些资料。

其次，本模式提供「所见即所键」(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input)。由于言论获罪档案史料数量庞大，研究者在研究过程「见树不见林」是一大缺憾，若要等待所有档案资料搜集到位才进行统计分析，则又旷日废时。因此本研究初始阶段便根据人物史料特性建立后设数据字段，并在把档案史料汇入数据库时，同步将数据后设数据收录至电子表格。然后再根据研究提问在电子表格软件内建立统计机制。如此一来，当研究人员键入资料，也同时得知统计结果。因此研究人员可随着统计展现的态样，调整分析方向或焦点。

## 参考书目

- 王天滨 (2005)。《新闻自由：被打压的台湾媒体第四权》。台北：亚太图书。
- 王汉威 (2011)。〈战后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组织与运作，1946-1950〉，彰化：彰化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硕士论文。
- 江如蓉、翁大钧 (2006)。〈探论戒严时期国家权力滥用行为〉，台湾人权与政治事件学术研讨会，页 241-67，台北：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
- 汪明辉 (2006)。〈政治案档案解密对重建战后台湾历史真相的意义：以汤守仁案为例〉，国史馆政治档案解密座谈会，台北：国史馆。
- 司法行政部调查局 (1974)《要案纪实》第 1-8 辑，台北：司法行政部调查局。
- 吕东熹 (2010)。《政媒角力下的台湾报业》。台北：玉山社。
- 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 (2021)。〈解碼压迫体制：台湾转型正义数据库研究成果发表会〉，台北：台湾大学科会科学院 (2021 年 2 月 26 日)
- 邱荣裕 (2006)。〈战后台湾客家典型白色恐怖政治事件之研究：以 1950 年代客家中坵事件为个案分析〉，陈志龙、邱荣举、倪子修 (编)《台湾人权与政治事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 322-331。台北：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
- 林子仪 (1999)。《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台北：元照出版。
- 林正慧 (2009)：〈1950 年代左翼政治案件探讨——以省工委会及台盟相关案件为中心〉，《台湾文献》，第 60 卷第 1 期，页 395-477。
- 梁正杰 (2007)。《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相关政治案件之研究，1946-1961》。台北：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硕士论文。
- 陈君恺、苏瑞锵 (2006)，〈威权统治时期校园政治案件中的人权侵害初探〉，陈志龙、邱荣举、倪子修 (编)《台湾人权与政治事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集》，页 303-321，台北：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
- 陈建杰（2011）〈战后台湾客家政治案件之研究：胡海基案之个案分析〉，台中：东海大学政治研究所硕士论文。
- 陈进金、陈翠莲、苏庆轩、吴俊莹、林正慧（2021）：《档案会说话：自由时代公民指南》，台北：春山出版公司。
- 陈翠莲（2021）：〈第一章 政治档案的开放之路〉，收录于陈进金、陈翠莲、苏庆轩、吴俊莹、林正慧，《档案会说话：自由时代公民指南》，页 15-26，台北：春山出版公司。
- 蔡墩铭（2004）：〈戒严时期之恶法与审判：以不当叛乱匪谍审判案为主〉，台北：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
- 曾培强（2009）：〈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案件研究〉，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硕士论文。
- 翁稷安（2016）：〈导论：数字人文—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数字人文：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数字人文研究丛书 6。台北：台大出版中心，11-20。
- 杨翠（2006）：〈女性与白色恐怖政治事件〉，陈志龙、邱荣举、倪子修（编）《台湾人权与政治事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 411-452。台北：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
- 裘佩恩（1997）：《战后台湾政治犯之处置》。台北：台湾大学法律系硕士论文。
- 叶虹灵（2021）：〈转型正义数据库中呈现的政治案件态样〉，发表于「解碼压迫体制：台湾转型正义数据库」研究成果发表会，行政院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页 6-15，台北：台湾大学科会科学院（2021年2月26日）。
- 薛化元、杨秀菁、苏瑞锵（2015）：《战后台湾人权发展史（1945-2000）》。台北：稻乡。
- 刘北成、杨远纓译（1992）：《规训与惩罚》。台北：桂冠图书公司。（原书 Foucault, Michel [1975].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 刘昭麟（2018）：从数字人文研究展望数据开放、工具协同与议题网络，《数字典藏与数字人文》，1，11-50。
- 刘熙明（1999）：〈蒋中正与蒋经国在戒严时期「不当审判」中的角色〉，《台湾史研究》，6(2): 139-187。
- 蓝博洲（1993）：《白色恐怖》。台北：扬智文化。
- 蓝博洲（2003）：《红色客家人》。台北：晨星。
- 苏瑞锵（2010）：〈台湾政治案件之处置：1949-1992〉。台北：政大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

苏瑞锵 (2011)。〈战后台湾政治案件审判过程中的不法与不当〉,《台湾风物》, 61(3): 33-73。

苏庆轩、王奕婷、刘昊 (2021)。〈司法镇压：台湾威权时期审判过程〉, 发表于「解碼压迫体制：台湾转型正义数据库」研究成果发表会, 行政院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 页 20-36。台北：台湾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2021 年 2 月 26 日)。

Mathisen, R.W. (2007). Where are all the PDBs? The Creation of Prosopographical databases for the ancient and medieval worlds, In Keats-Roahn, K. (ed.). *Prosopography approaches and applications: A handbook*. Oxford: Unit for Prosopographical Research, Linacre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 pp.95-126.

Stone, L. (1971). Prosopography, *Historical studies today*, 100, 1, 46-79.

**Exploring the Cases of “Speech Crime” under Authoritarian  
Rule in Taiwan, 1949-1992:  
A study of government archives**

Pai-lin Chen

**ABSTRACT**

This preliminary research aiming to the case of “speech crime”. During the authoritarian rule from 1949 to 1992, many were accused of "advocating Communists' thought " or "spreading rumors" and convicted by military courts.

Government archives are one of the main channels for academics to explore this issue. Although Taiwan has been lifting its martial law for many years, the opening pace of government archives has been relatively slow. Therefore, prior research of this domain is limited.

This particular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collection methods of historical data. Researchers employ multiple data collection methods: first construct a preliminary list with text exploration, then collect historical data files, then use software tools to process the data to structure it, and finally perform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will present the outline of the collective appearance of the victims of “speech crime”.

**Keywords:** digital humanities, government archives, journalism history of Taiwan, prosopography, speech crime

---

Pai-lin Che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pailinch@nccu.edu.tw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四期  
2021 年 12 月

## 台湾公民募资的消费实践 (2012-2019 年) \*

张依萍\*\*

### 本文引用格式

张依萍 (2021)。〈台湾公民募资的消费实践 (2012-2019 年)〉,《传播、文化与政治》, 14:39-86。

---

投稿日期: 2021 年 2 月 17 日; 通过日期: 2021 年 10 月 10 日。

\*本文为《公民募资在台湾, 2012-2019 年: 从文本分析看动员策略》政治大学硕士毕业论文改写, 铭谢指导老师冯建三教授、评委魏玟教授及王亚维教授。

\*\*作者张依萍为国立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e-mail: 110463502@nccu.edu.tw

## 《摘要》

本文将公民募资视为政治参与的一种型式，募资平台则为象征性消费的场域，社会议题在募资平台被「商品化」，倡议行动包装为项目形式进行募资，捐献者于募资平台上以金钱资助，募资发起方成为代理行动者以执行倡议。为理解台湾公民募资的消费实践特色，本篇取径「政治消费观点」，关注消费背后的意识形态，并借镜新传播科技发展下「连结式行动」的动员特色，以此聚焦讨论项目发起方的角色与行动策略，以历时性研究 2012 年至 2019 年台湾在线公民募资的发展与政治参与特色。研究发现：「党政趋向」类的项目表现在募资人次及金额最突出，此类要求文宣，多与两岸政治、罢免投票、环保有关，然而公民募资做为政治参与或有进步内涵的「政治消费」，其论述情境却多与蓝绿之争、地缘政治有关。而募资发起方的行动召唤策略直指「台湾认同」，且刻意淡化组织角色，突显个别公民的倡议身份，并以「否定」语境如反国民党、反大陆政权为号召。公民募资看似是由下而上的改革力量，但研究表明，推进募资动能策略，主要发挥在身份认同的议题，募资发起时程更与台湾政党选举活动有关，政治消费行为背后脱离不了政党化意识形态渗透。

**关键词：**公民募资、政治消费、政治参与、连结式行动、群众募资



## 壹、前言

台灣的募資平台起於 2011 年，至 2014 年台灣太陽花運動表現活躍，當年：「從白色力量、反核遊行，到太陽花學運、反兩岸服貿的紐約時報廣告，人民透過行動來證明對這片土地的關心、用小額贊助來表達對這片土地的認同。」（台灣群眾募資報告，2015）。公民募資最重要的精神是，民眾透過因特網發起創新項目，跨越地理障礙鏈接用戶，基於領土的歸屬感集結，使公民有可能在网上和線下交流想法和意見（Oliva, 2018）。而 2019 年公民募資主題亦涉及聲援香港反送中、反中國威權滲透台灣、罷免市長、居住正義等項目主題也透過募資平台集結表態，顯示公民募資（civic crowdfunding）似乎已成為表達意志的一種社會行動。

綜觀台灣的公民募資史，從 2012 年 flyingV、嘖嘖募資平台正式開站，到 2014 年太陽花運動掀起公民募資遍地開花的高潮，至 2019 年共 8 年歷程，尚未有太多學者深入探究台灣在綫群眾募資的政治動員實踐。對應台灣公民募資行動的實踐經驗，募資項目曾被質疑「隱而不諱」的夾藏政治意識形態在募資項目中：回顧沃草罷韓項目為釋例，發生於 2019 年，wecare 高雄、台灣基進、公民割草行動團隊共同發起「wecare 罷韓 30，高雄 Reset 大遊行」<sup>1</sup>項目，此項目被外界質疑該募資項目可能有政治勢力隱身其後（郭琮俐，2020 年 4 月 21 日）。亦有報導指出，項目發起方可能涉及優勢政權或黨外政治勢力滲透，如黑色島國青年、島國前進、民主斗陣、基進側翼、福爾摩沙、公民 1985、公民覺醒、沃草、全民割闌尾等團體，被指認為政治第三勢力或是民進黨側翼（〈大紀元〉，2014 年 4 月 15 日；陶本和，2015 年 12 月 23 日）。

透過上述募資事件背景的討論，本研究欲探究看似集結群眾意志且透明的公民募資情境中其能動性為何，故以公民募資發起方的行動策略作為討論，以此聚焦，觀察募資項目中發起文本語境所浮現的角色與意識形態。本文將公民募資視為政治參與的一種型式，募資平台則為象徵性消費的場域，

---

<sup>1</sup> 「wecare 罷韓 30，高雄 Reset 大遊行」募資專案網址：  
<https://www.zeczec.com/projects/recall2019wecare>

社会议题在募资平台被「商品化」，倡议行动被包装成项目形式进行募资，捐献者在募资平台上以金钱资助，募资发起方成为代理行动者以执行倡议行动。在这个框架下，公民募资项目就是一种商品，以供赞助者「反身性消费」，透过金钱赞助实现自我价值。据此，本研究纳入「政治消费主义」(political consumerism, 通常兼指「公平交易」与「具有道德意识的购买」)进行讨论，将公民募资视为一种带有政治与伦理意图的消费，其中「消费性支持(buycotts)」视野，说明赞助者化身为公民消费者，藉由金钱捐献支持募资发起方的行动意志。在此亦不可忽略在新传播科技的媒介使用情境下，在线募资扩大了公共领域的政治参与，公民募资行动具有「个人色彩」的政治消费，也是自我的参与形式表现，更是身份、生活方式与个性化政治的反映(Baek, 2010)，藉由传播科技手段，社会倡议不需要透过组织性资源，召唤集体身份/认同的个人加入，个人化行动成为当代政治动员的主要特色(Bennett, Segerberg, & Walker, 2014)。故在公民发起方的行动策略讨论，试图以历时性研究，理解2012年至2019年台湾在线公民募资的发展与政治参与特色，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 (一) 公民募资发起方在募资平台上的动员策略。
- (二) 随着台湾政治变迁，公民募资发起项目背后的意识形态取向。

## 贰、文献探讨

### 一、公民募资的操作型定义

公民募资(civic crowdfunding)英文一词的出现，最早可追溯至2012年，首先由公民募资平台Spacehive与Neighbor.ly等平台使用(Davies, 2014)，Wenzlaff(2020)定义公民募资，他认为公民募资具有小区参与性的项目、支持者可透过线下动员达到共同的群体利益、公民募资可藉由公民或民间组织发起，自发地审议公共政策。承上述讨论，参与公民募资的人，往往有利他、亲社会的倾向(Berger, 2019; Hsieh, HC, Hsieh, YC, & Vu, 2019)。相较于为了私人经济收益而有的群众募资，响应公民募资的参与者更容易发

展出社群连带关系，原因在于参与者对于公众利益的想象（也可称为消费者公民的想象），其次则是网络年代对他们的线下与在线连结的进行，提供了便利之门。公民募资社群的连结关系所聚集的人群流动于线下（地理性小区）、在线（社群平台、募资网站等）。而公民募资项目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更取决于当地利益关系者的线下协同（Charbit & Desmoulin, 2017）。而线下社群（泛指生活在相同地理区域的人）时而面对面交流，时而通过在线连结，在拓展集体实践中，基于共同想法与信念聚集，形成共同想象中的小区（Brint, 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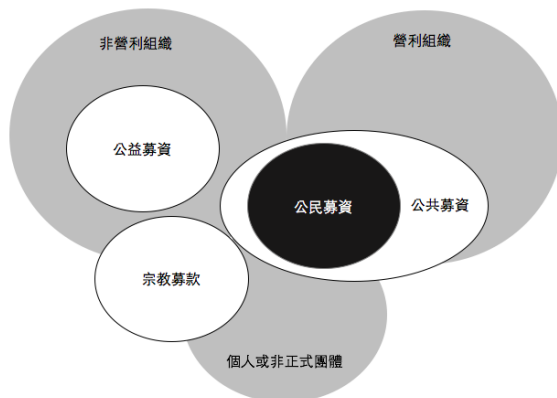
当然公民募资类型可能涉及独立架站募资、政府 / 非营利组织发起类、小区公共类、政治倡议类<sup>2</sup>或是综合类平台募资，相较于其他背后有明确募资发起组织或已关站，本文将焦点聚焦于台湾两大综合类中介机构平台「啧啧（Zec Zec）」与「flyingV」<sup>3</sup>进行讨论，此两大平台除了汇集台湾最多公民募资项目，平台亦有第三方中立性，具研究的指标意义。台湾目前对于募资的分类仍然有许多模糊及重迭之处，为了进一步了解公民募资的类型，不限于各式平台网站的讨论，笔者以群众募资项目发起方及项目性质进行整理（如图一）。

### 图 一：群众募资的类型

---

<sup>2</sup> 政府 / 非營利組織發起類，指政府項目募資平台，由政府發起募資專案，邀請地區居民進行市政債券購買，以促進當地社區建設。如台北眾力方程式；社區公共類，指資助社會項目或改善社區建設。如信義房屋勾勾 gogo 募平台（2017 已關站）；政治倡議類，發起支持選舉候選人募款、提出公共倡議，促進法案推動。如 VDemocracy（2014 已關站）。

<sup>3</sup> 嘖嘖（Zec Zec）募資平台，於以下內文，簡稱為嘖嘖。嘖嘖成立於 2012 年 2 月，初期主打新創文化，近年來也開始著重公眾議題的經營；flyingV 在 2012 年 4 月創辦，關心公共議題為主。嘖嘖與 flyingV 平台上募資主題涵蓋設計、公共、在地、遊戲、影視、休閒等。



项目发起方可分为个人、非营利组织、商业组织三大类，项目性质可分为公益募资<sup>4</sup>、宗教募款、公共募资：然而公益募资对象为「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需为非营利单位发起，是为了帮助社会弱势群体，解决社会问题，赞助人不一定会得到实质的物质或资金回报，基本上属于捐赠行为（王擎天，2016）；宗教募资则为宗教使用或以宗教回馈社会资金用途，上述两者皆非本篇研究之具有政治参与行为的讨论范畴。在此特别解释以台湾两大募资平台的来说，「公共募资」类别包含于 flyingV「公共」及啧啧募资平台的「空间」、「社会」、「地方创生」子募资类别，本篇研究关心的公民募资则是从两大平台公共募资中筛选出，「专注于群体利益」的专案，本文所指的公民募资，是为了成全社群的公共利益，推进总体利益之目标，具有「公众性」的使命（Charbit & Desmoulin, 2017）。因此在两大平台的公共募资中，有些项目项目非以达成社群总体为行动目标，而是以成就个人或企业营销宣传为目的，如啧啧募资项目「张元植 + 吕忠翰 K2 Project 8000 攀登计划」<sup>5</sup>，故分类上虽属于公共募资，却应排除在公民募资讨论范畴。而公民募资属于回馈型募资，赞助者

<sup>4</sup> 根據台灣公益勸募條例：只有公立學校、行政法人、公益性社團法人及財團法人能發起勸募，且勸募的目標是為「不特定多數人」的利益。

<sup>5</sup> 「張元植 + 呂忠翰 K2 Project 8000 攀登計畫」是以完成兩位登山客夢想的募資計畫，為個人目標導向。資料來源：嘖嘖募資平台  
<https://www.zeczec.com/projects/k2-project-x>

会预先购买服务或产品，或收到象征性的礼物做为对于项目的认同，这类关乎社会倡议的募资型态也正是本研究所要探索的方向。

## 二、国外公民募资研究与讨论

Davies (2014) 提及在美国有关募资的研究，一般是以商业募资为研究对象，在这些为数不多的文献中，有人研究小区公民与政府协商合作，通过公民募资，生产本地的公共财 (Charbit & Desmoulins, 2017)，在此的小区型公民募资旨在由公民共同集资，生产公共财。公共财就是公共物品，拥有不可分割性，Oliva (2018) 认为小区型公民募资是用以在改善地区领土或支持社会、文化活动的公共工程，由公众持有。关于公民募资争议性，已有部分学者观察到地方强势组织介入政府资源分配、数字落差等现象：Davies (2014) 提及若项目涉及公共建设、社会福利有关，致使公民募资可能是填补政府资金短缺的方式，强势组织或行动者甚至可能抢夺政府资源，造成地方发展不公，有时还变成私人资源干扰了政治议程；Oliva (2018) 也注意到在线的弱连结仍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信任，在线募资可能出现排挤性，存在数字鸿沟的现实，参与者需要经历数字化（计算机、手机、在线刷卡等技能）及拥有语言知识。回顾现有研究看公民募资三点特色：公民募资反转键盘酸民的角色、集结行动资本、线下与在线的结合：

### (一) 公民募资反转键盘酸民的角色

群众募资概念起源于众包 (Dresner, 2014)，众包能够「聚集」而不是「平均」公众意见，参与者未必有集体的意识，反而更常见个人主义的心态，这在网络上似乎无处不在 (Brabham, 2009)，致使有数位激进主义不过是「点击主义」或「懒人主义」之说，呈现万人响应，一人到场的现象 (Gladwell, 2010)。不过，公民募资不仅是「口惠」的响应，是「实质」上掏出钱包，也就是「捐款」，此种响应行为，超越讯息接受、知晓、同意、分享的范畴，更接近 Zuckerman (2014) 的「参与式公民」概念：「以数字媒体为核心组成的公民参与形式」，响应网络募资的人经常将募资讯息与其他社群媒体串

连, Oliva (2018) 称之为「共享的政府」, 意指小区中的公民成为自身福祉的参与者和促进者, 也就是透过公民募资, 捐献的行为本身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力, 促动了公共决策。

## (二) 集结行动资本

透过积极的捐献行为展现自我, 同时「与人连带协作」并传递信息, 动员更多关注相同议题的群众加入, 这可能是启动潜在社会资本的机会, 让社群参与集体问题的解决过程, 募资若能成功, 就是政治资本的创造, 可以干预政治经济结构 (Davies, 2014)。Díaz & Cacheda (2016) 表明募资已经是一种确实可行的融资替代来源, 帮助倡议运动来解决当前影响社会运动的困境和瓶颈, 募资也是倡议运动手中的一种政治工具, 信息透过传播渠道,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有效传播思想、概念和信息, 成为激活社会资本的渠道。当倡议运动获得公共、政府或是私人捐赠的经济资源后, 也巩固了在政治舞台上发生的机会。

## (三) 线下与在线的结合

Facebook 和 Twitter 社群平台的线下小区, 透过进行公民募资而进入在线参与, 已有研究 (Stiver et. al., 2015)。支持自己小区的项目, 募资本身就可提供「情感和道德的回报」 (Hollow, 2013), 透过公关活动推动在线募资, 进行集体行动和小区行动主义的整合 (Doan & Toledan, 2018)。另外, 公民募资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场域性」 (place-based), 也就是说, 一般的募资依赖于网络技术和在线小区, 而公民募资需要串连「线下」小区, 并对当地产生具体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 募资平台也为募资项目中有共同利益的人起到了中介和催化剂的作用。以上学者研究都证实了公民募资与场域、社群的概念有关, 透过募资网站做为接合点, 进行线下线上的串连 (Charbit & Desmoulins, 2017)。

## 三、台湾公民募资现有研究与实践

当然公民募资动员是具有在地特色的实践，回到台湾特殊的政治局势，两极化的政党政治、美国对台政策、执政党对中政策、台湾国际地位认同等，都关乎台湾公民募资的发展。在台湾的公民募资研究不多，若以「募资」与「众筹」为关键词，检视《台湾人文及社会科学数据库》、《台湾期刊论文索引系统》与《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等三个数据库，发现从 2012 至 2020 年（至 3 月 31 日），共有 52 笔学位或期刊论文，仅有一篇聚焦「公民募资」（林信熙，2019）<sup>6</sup>整理国外公民募资研究主题，其余研究如后：15 篇研究「募资的成功模式」，其他是「募资法规」10 篇、「募资平台阅听人研究」6 篇、「非营利组织或公益募资」5 篇、「社会企业募资」4 篇、「传播媒体」3 篇、「商业模式」2 篇、「文创产业募资」2 篇、「新闻群众募资」1 篇、「音乐募资」1 篇、「募资风险」1 篇、「资源动员」1 篇。

#### 四、取径政治消费的特性看公民募资实践

如前言所述，募资行动在募资平台上「商品化」，作为捐献者支持的政治参与形式，此种消费行为满足了消费者公民利他的道德行为，在过往台湾民主参与实践中，庄佳颖（2014）以政治消费主义讨论 1998-2013 年间的政治文化现象，藉由台湾国族建构与民主化观点，研究特定政治人物、社会运动发起者、社运支持者、政治迷的互动文化形成，在此讨论中，将商品消费建立在国族认同的论述。然而此消费场域多涉及选举情境中政治人物竞选商品的消费，这是有形商品的消费，消费可能几乎等于认同政党倾向。反观公民募资平台上，发起者角色不需要主动揭露党派，发起者与赞助者之间并没有清晰的政党认同共识，赞助者却可为了实践公共利益，以赞助的方式展现对活动或项目的消费支持。因此，为了理解台湾公民募资能动性，接续将讨论触角延伸至公民募资的行动者（募资发起方、募资赞助者），讨论其交相运作的行动特色。

---

<sup>6</sup>林信熙（2019）。地方公共財的機會與挑戰：以公民眾籌為例。中華大學科技管理學系碩士論文。

首先藉由「政治消费」视角审视公民募资发起方提供的商品，非一般理解的物质商品。募资赞助者的政治消费实践对象不仅是商品化的社会倡议，更是背后的政治意义，赞助者支持的是项目中文本表达出的行动理念，可视为服务性商品。根据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nsumerism* 一书，「政治消费」是指「透过消费者行为进行倡议，企图纠正及改善在道德、环境或政治上令人反感的惯习」（Diani, 2019）。其中的「消费性支持」（buycotts），表述了募资赞助者身为消费公民，支持项目理念的行动。本研究认为消费者在每次进行消费决策时，都如同为生活投票，而这些行为都将汇集成一股民意，潜移默化影响企业或政府：以公民募资来说，消费者以消费支持的方式赞助提案人的理念，并挹入金钱以实践行动，这种带有公民意识的行为，可看做是一种广泛的政治性参与，此概念也与 De Zúñiga 等人提出的「公民参与」概念不谋而合，他们认为消费行为本身不一定是为了影响国家，但与公民参与一样，这些行为也会产生政治后果，如同 Charbit & Desmoulin (2017) 恰如其分地强调「当公民募资行为进入了日常生活，更可以理解为一种新型的公共生活参与。」而政治消费主义做为非常规且广泛的政治参与形式，扩大了政治参与的范围，甚至渗透进生活政治 (Baek, 2010; Dalton, 2008; Van Deth, 2012)。因此，进一步将政治消费主义概念化，可将政治消费看作是当代政治参与，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政治的展现 (Copeland, 2014)。

Copeland (2014) 乐观提及政治消费者在意识形态上很老练，因此他们不必依靠党派暗示来做出明智的决定或参与政治。然而当我们将公民募资平台视为生活政治的参与时，必须更严谨审视政治消费的互动历程，进一步理解赞助者在公民募资中消费了什么，也就是募资项目中的文本提供了何种意义的再现，召唤赞助者：赞助者从四面八方前来，看似有意识的通过决定支持哪些项目，以捐献行为展现其行动意志，但事实上，意识形态渗透生活中的政治情境，募资发起方提供的说服策略成为捐赠动能的最后关键，因此，有必要深入讨论募资平台募资项目的说服策略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如何牵动公民消费者「有意识的道德决策」。

据此，「有意识的道德决策」，早已成为企业品牌的营销策略之一，有学者亦提醒，资本主义也如同帮助资本企业树立社会正义感，合理化了消费



行为 (Micheletti, Stolle, & Berlin, 2014)。在消费社会中，人们感知的身处地位和自我形象，出自于商品的消费，花钱是通往美好生活的想象，消费主义会根据社会价值以及政治经济系统，以不同方式进行操控 (Sturken & Cartwright, 2001)，消费者因此掉入消费与道德的双重陷阱中。卢岚兰 (2005) 提醒，「消费主义」的语境有多重涵义，其中特别提及消费主义也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进入了政党政治的领域，左派社会主义国家与右派资本主义国家各有表述。

## 五、募资发起方的动员特色

从上述讨论，在公民募资的消费行为，表面上看似驱动了公民消费者的能动性，可能也牵涉了政党政治的运筹帷幄，突显了募资发起方以何种角色传播讯息的重要性。从 Bennett、Segeberg 与 Walker (2014) 动员行动逻辑讨论，主要分为「集体式行动」、「连结式行动 (connective action)」其简单区别如下：「集体式行动」以组织为资源动员中心，组织成员拥有与组织相同的集体身分 / 认同或政治要求；「连结式行动」则充满个人化行动特色，身分 / 认同在网络空间呈现流动性的特色，行动者可透过社群平台及个人网络传播信息，不需要中央组织资源，去中心化的特征使得动员成本也较低，讯息传播速度更快。除此之外，Bennett & Segeberg 与 Walker 观察到新传播科技成为组织的动员代理手段，此种链接式行动的优势，包括动员的速度、中间群体在问题焦点和行动策略之间转移的灵活性，以及通过数字媒体和大众媒体接触大众的能力。

然而传统的集体式行动有两个困境：一是动员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号召人力及资源；其二是组织身分的认同问题，在成为组织的一份子时，必须与组织拥有相同的身份 / 认同或政治要求，个人需要克服障碍或损失，实际参与行动。当个人加入了以组织形式为号召的行动时，就涉及了对于组织的认同，而公民募资项目拥有明确的行动目标，有时以组织形式做为号召，对于赞助者的信心与项目成功有所帮助。然而，若公民募资涉及政治倾向认同，鲜明政治色彩的「组织」要求加入者必须有强烈的认同，因此另一种以「去

组织化」转以议题导向做为身份认同的号召，成为近期推展社会倡议的行动策略。陶振超（2017）引述近期国内外非传统政治议题的社会运动，如政治、经济、社会、灾难性方面新社会运动，如阿拉伯之春、西班牙愤怒者运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等，强调此类运动充满了「个人化集体行动」之特色。这类社会倡议的行动逻辑彰显了「链接式行动」特色，其特色是以主导「议题」做为号召，关乎参与者生活的场域及遭遇的切身问题。

Bennett、Seegerberg 与 Walker（2014），针对连结式行动特色进一步讨论，发现政治倡议行动的特色包含：（1）纳入更多年轻族群；年轻人以更加个性化（而不是集体主义）的方式看待政治并与之互动，并参与了基于解决问题的临时运动（而不是长期的组织承诺）（Vromen, Xenos, & Loader, 2015; Bang & Halupka, 2019）；（2）倡议者的行动平台：Parsloe 与 Holton（2018）认为网络行动主义可以为倡议者提供平台，通过独特的方式建立桥接（bridge）和纽带（bonding），将人们聚集在一起，让他们表达自己的意见，并为那些可能没有能力参与动态互动的个人行动者发声；（3）渗透至政治生活领域：Bang Halupka（2019）相信将政治生活中的问题概念化，透过群众的连结式行动，有助于让体制内的政治权威释放更多权力、知识和信任给体制外多样的社团。

上述讨论可以看到在新传播科技使用情境之下，社会倡议动员的行动逻辑逐渐从「集体式行动」转化成「连结式行动」，透过「去组织化」策略，改以「议题」做为号召。在此需注意的是，前述提及两种行动逻辑并非取代关系，而是根据不同社会倡议行动，倡议发起者或行动者各自形成行动策略。正是因为公民募资的组织中动员人力资源、意识形态的主张、甚至如何取得第三方团体成为盟友、盟友的政治立场与实力等协调策略，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切面，更有必要关注项目发起方行动逻辑。

从以上政治消费与动员行动逻辑的取径，看公民募资行动者特色，发现公民消费者浸润于生活政治中，本身的政治消费行为难以脱离意识形态的认同，除了传统的集体式动员，「去组织化」的链接式行动逻辑似乎有助于理解隐藏特定政党的角色。承上讨论，为了理解台湾公民募资实践，藉由文献对话，响应研究问题有二：「公民募资发起方在募资平台上的动员策略」及

「随着台湾政治变迁，公民募资发起项目背后的意识形态取向」，因此本篇取径「政治消费观点」，提出公民募资即是政治参与行动，因此消费背后的意识形态成为本篇研究关注焦点，并借镜新传播科技发展下「连结式行动」的动员特色，以此聚焦讨论项目发起方的角色与行动策略。

## 参、研究方法

### 一、募资网站的模板布局

在募资项目页面中，flyingV、啧啧募资平台提供募资发起方模板式的一页式网页，发起方可在网站架构下的框架上传文字（项目主题、项目介绍、回馈品说明）、图片（项目主视觉图片、回馈礼品、其他辅助叙事图片）、影片，主页面也有外连的机制，分别是其社群平台、电子邮件链接、分享募资项目按钮，另外在一页式网站中主要显示最大的区块为项目介绍，与项目介绍平行的页签则包含项目进度、互动留言，而本篇论文篇幅限制，不讨论网页互动的超文本与影片，焦点锁定于「募资说明」中的文本分析，进行消费实践的经验调查。（如图二）

图二：募资网站模板页面<sup>7</sup>



## 二、台湾公民募资项目趋势的研究架构

公民募资做为政治倡议是新兴的社会现象，以现有学术研究、社会脉络、实务场域分析材料，难以进一步回应台湾的公民募资现象，为了更加理解公民募资的行动轮廓，本篇研究资料取自两大募资平台自 2012 年 2 月开站至 2019 年 12 月期间，于 flyingV「公共」及啧啧募资平台的「空间」、「社会」、「地方创生」子类别的募资项目进行逐笔检查筛选出 562 项公民募资项目，并进行分类。研究分为三阶段：

### (一) 第一次定质分析：议题类型之分类

本文研究架构，首先采用社会科学研究的「定质分析」，透过传播资料的初步研读，以形成假设、发现新的关系与勾勒出概括的趋势。以内容性质的判读当作基本内容单位，而定质分析需仰赖研究者主观的分类应用，视文

<sup>7</sup> 資料來源：筆者重新整理與繪製（左）。截圖自 flyingV 募資網站：  
<https://www.flyingv.cc/projects/4878>（右）。

本为跳板，研究讯息传播者于文本后隐匿的意识形态（阎沁恒，1967）。从文献探讨中，理解到新传播科技下，动员逻辑倾向议题在前的连结式行动（Bennett 与 Segerberg, 2012; Bennett, Segerberg, & Walker, 2014），以此讨论希望透过数据分类，进行议题轮廓之初探。在 562 项募资项目中，定质分析方式以研究者于研究期间 2020 年 1 月至 11 月间，反复八次检视，依据项目发起背景、项目行动目的、要求等面向进行归类，若项目可能同时兼具多种类型特色，则以侧重属性者为主。

透过定质分析的分类，进行公民募资项目分类共十类：「党政趋向」<sup>8</sup>、「弱势关怀」<sup>9</sup>、「性别平权」、「动物保护」、「教育推广」、「环保倡议」、「小区营造」<sup>10</sup>、「自媒经营」、「健康促进」及「食安倡导」<sup>11</sup>。并且根据统计各项目之上架平台、总赞助人数、总赞助金额，分析其台湾公民募资实践经验上倡议主题之倾向。

## （二）第二次定质分析：叙事功能面向分类及论述

在首次分类公民募资类型的定质分析中，取总赞助人数、总赞助金额具研究代表性之类别，进行第二次之定质分析（见附录一）。<sup>12</sup> 叙事学本文结构分析，即是对语言中「选择」与「组合」的机制进行理解，透过切割文本表层，浮现出叙事者的策略，根据法国学者 Gerald 提及叙事研究即是找出叙事文本的基本要素，并将其中作用呈现出来（孙秀蕙、陈仪芬，2011，页 143），本篇论文将以叙事功能面向，分别以「行动目的」、「行动召唤」、「发起

---

<sup>8</sup> 党政趋向：与执政政府、地方政府、党派有关的窄义政治动员，关乎地缘政治、国家与地方治理的倡议。

<sup>9</sup> 弱势关怀：弱势族群之救助，包含偏乡族群、特殊疾病、身障、精障、遊民、新移民、清寒贫困者等。

<sup>10</sup> 社区营造：促进社区发展、传承当地文化，守护当地人文地景等在地公共事务推动。

<sup>11</sup> 食安倡导：关注食品安全议题，从田间实作推广健康食物，或抵制不良企业的黑心商品。

<sup>12</sup> 2012 年公民募资列表中，无党政趋向类募资专案，2012 年公民募资仅有 2 案：「Book Surfing--整个城市就是我的图书馆」隶属教育推广类；「【VetLaw】肥肉青年环岛志工服务种子团」隶属弱势关怀类，党政趋向类募资专案之文本研究自 2013 年开始计。

角色」、「政治立场表态」等四个面向进行分析「募资说明文案」（位置见图 2）：（1）透过「行动目的」及「行动召唤」去理解募资发起方如何透过议题的再现，动员公民募资的政治消费行为，来回应「公民募资发起方在募资平台的动员策略」之研究问题；（2）而「发起角色」、「政治立场表态」的探讨面向，则做为观察动员逻辑特色中（组织角色是否表态？政治立场作为身份认同？），公民募资发起方的身份与讯息内容意识形态，以此响应「公民募资发起方在募资平台的身份应用策略与意识形态的取向」之研究问题。

### （三）诠释批判的分析取径

在取得定质分析资料后，研究根据前述文献检核，以「政治消费主义」的视角，找寻密缝于字里行间的意识形态，藉此分析文本语境的动员特色。公民募资的情境与整体政治经济环境、社会脉络有关，由此展开论述批判讨论，在此将文本视为一种社会行动，做为研究者仰赖的论据来源，因此，在历史上可看成「社会过程的指标」，政治上更是「社会控制」与「意识形态」支配运作的场域（Devereux, 2007）。而根据 Devereux 提及文本产制、流通与意义的建构，都在复杂的社会与文化脉络中进行，其中不可忽视意识形态的存在。意识形态是指和某种利益牵连的观点，以这个观点用来描述这个世界，进而合理化某社会团体或组织的利益，因此藉由论述的方式，审视意识形态背后这套社会发展而成的语言或描述系统，如何建构并传播一套连贯的意义体系进而服务某群体利益。

一般来说，以论述途径做为分析策略的学者，会特别偏向某些议题及特色：Van Dijk (1985) 关注语言的再生产及理解，如何受到意识形态的主导以及认同的行动，他强调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认知的形式，也是集体的再现（倪炎元, 1999, 2018）；此外，采取 Ruth Wodak 的历史—批判论述分析，则有利于检视文本中的自我指涉、认同召唤、他者建构、理念操作、框架设定的策略（倪炎元, 2017）。本篇研究根据不同分析目的，撷取上述学者论述分析的特色与方法，理解公民募资文本中的符号、文本结构及叙事框架：首先采用 Van Dijk 研究方法，检视个别字汇与语句的策略性意义、功能以及语句之间的关联，从语言文本中有效识读出隐藏在其中的意识形态符码，关

注「意义」如何被创造与诠释，并产生隐而不显的「意识形态」，揭露其中运作的机制；同时以 Ruth Wodak 的历史—批判论述分析特色在于重视议题前后的历史脉络，并将脉络还原与重建，可揭露出论述实践中隐藏或明示的「操纵说服特征」（倪炎元，2018），据此本篇研究也将透过政治变迁下的历时性交叉检阅 2013 至 2019 年间，政党政治变迁与项目中政党意识立场，检视台湾公民募资的实践特色。

### 三、分析工具

募资网站的文本，并非皆以文字形式展现，为了版面设计美观，大多募资项目发起方，都会采用图文兼具的图片，进行文案宣传，因此在分析过程，需要以人工判断方式进行区别。本篇研究工具以「MAXQDA」质化分析软件进行分类（见图三），透过整页截图储存为 PDF 方式汇入「MAXQDA」软件，逐笔详阅文本语境内容，以定质分析进行「文本单位」之分类标示（见表一），做为本篇研究之语料素材，以下分别详述募资网站之模板布局及叙事单位之分类。

图三：分析界面示意



数据源：截图至研究者计算机之分析接口

公民募资论述分析方式依据每个面向中的文本内容进行分类，每项类别为最小叙事单位之分析，分类力求互斥周延。在此需特别说明文本单位认定

方式，经由「MAXQDA」质化分析辅助标示募资文本的数个文本单位后，透过「MAXQDA」内建表格程序，了解在各募资项目文本内容偏重哪个文本单位，最后经由人工判读，个别项目在「行动目的」、「行动召唤」、「发起角色」、「政治立场表态」中文本分类之归属<sup>13</sup>。以下为文本单位之分类示意（如表一）。

表一：文本单位之分类示意

文本分类	行动目的	行动召唤	发起角色	政治立场表态
文本单位	政治议程的介入：公投、罢免、法案倡议	太阳花相关	个人或非正式组织	鲜明政治立场
	作品	人权自由	组织或联盟	强调无政党立场
	在线工具	媒体改革		反对特定政权 / 政党 / 政治人物
	线下集会	代议民主失望		
	其他项目	台湾角色认同		
		政府角色失能		
		审议民主		
		选举文化的修正		

数据源：本研究重新整理与绘制。

<sup>13</sup> 以下分别说明自定义操作及立意说明：1.募资行动目的：指募集的资金将资助什麼類型的行動，依照募资專案之行動目的可分為 a.政治議程的介入，以公投、罷免、法案倡議等目的之遊行或登報等行動、b.作品係指影音書籍及互動遊戲等、c.線上工具則包含公民線上問政網站、國會直播平台、公民媒體等、d.線下集會則納入各種落地活動形式，舉凡講座、放映會、演唱會、返鄉專車等；e.其他專案則包含書店重建、外交活動、輔選監票志工等無法歸類之專案。2.行動召喚：在每篇募資文案中，發起方皆有一個訴諸行動的議題，由議題做為行動的鉤子，吸引了對特定議題關注的贊助者，而這些議題除了看作驅動贊助方捐獻的動力，也可能反應了在民眾對生活政治現況不滿的狀態，此類行動召喚的主軸包含太陽花相關、人權自由、媒體改革、代議民主失望、台灣角色認同、政府角色失能、審議民主及選舉文化的修正。3.發起角色：以募資發起方角色做為討論變項，進一步討論連結式行動中，組織或個人角色在發起議題的策略。4.政治立場表态：以政治立場做為討論變項，有助於連結發起議題與政治立場的關係，進而浮現背後的意識形態。



## 肆、研究发现

### 一、台湾公民募资整体趋势

平台共发起 562 项公民募资倡议项目，筹得约 2 亿 4 仟万元，共 15 万 962 人次参与台湾公民募资（如表二），募资动能显示出台湾以非经济目的的捐赠行为推动社会改革，在形塑台湾政治消费文化具有指标性意义。在 562 项募资项目中，「弱勢关怀」类最常见，占有所有公民募资项目的 48.75%，参与人数 30.42% 占第二位，而「党政趋向」类募资总额占 33.33%，为公民募资金流第一名，捐款人次也高达 40.79%，占捐款人次第一名。而项目平均金额次高者为「党政趋向」类，高达 114.0158 万，政党相关的募资议题形同是募资的吸钞机。

表二：flying V、啧啧公民募资类别统计表，2012-2019

类别	专案数	专案数百分比	捐款总额	捐款总额百分比	捐款人次 (万)	捐款人次	每人捐款	专案平均金额
			(万)			百分比		
1.党政趋向*	70	12.46%	7981.1035	33.33%	6.4956	40.79%	1229	114.0158
2.弱势关怀	274	48.75%	7285.9046	30.42%	3.7919	23.81%	1921	26.5909
3.性别平权	46	8.19%	2651.1286	11.07%	2.2021	13.83%	1204	57.6332
4.动物保护	71	12.63%	2756.1773	11.51%	1.9533	12.26%	1411	38.8194
5.教育推广	15	2.67%	1274.8947	5.32%	0.6567	4.12%	1941	84.9930
6.环保倡议	35	6.23%	722.3386	3.02%	0.3804	2.39%	1899	20.6382
7.小区营造	41	7.30%	665.4452	2.78%	0.3578	2.25%	1860	16.2304
8.自媒经营	3	0.53%	512.3372	2.14%	0.0621	0.39%	8250	170.7791
9.健康促进	5	0.89%	95.8769	0.40%	0.0250	0.16%	3835	19.1754
10.食安倡导	2	0.36%	3.7200	0.02%	0.0014	0.01%	2657	1.8600
<b>总数</b>	<b>562</b>	<b>100%</b>	<b>23948.9758</b>	<b>100%</b>	<b>15.9264</b>	<b>100%</b>	1504	42.6138

\* 「党政趋向」项目详细资料，见附录一。数据源：本研究搜集与整理。

回到前言（表 2）统计数据来看，党政趋向类募资之金流与人数都分列公民募资第一位，具研究之重要性。接续讨论如（表 3）所示。在公民募资 562 笔资料中的前十名<sup>14</sup>，「党政趋向类」占 5 项，除了青年返乡列车的投票倡议之外，显示其他三案都是与不适任代议士的罢免相关，其总捐献的费用共高达 2365 万 9742 元，占 70 案政党监督类募资总金额的 29.6%，动员金额的集中性显示了罢免代议士的募资主题具有高度的动员力，却也突显了募资捐献流向分配过于集中。

接续观察募资前十名（如表 3）的动员：以太阳花运动相关议题的募资动能最强大（3 案），前十名主题募资主要有两大要求，包含政治议程介入（选举、罢免）、地缘政治关系（太阳花、主权正名、反渗透、香港民主），而这两种要求都需要强大的资源及组织来号召群众，然而从表中可看出项目发起方多以个人或非正式团体身份发起项目，仅有「「回家以后」——2020 青年民主返乡列车」一案是以正式组织角色发起项目。

太阳花学运是台湾公民募资茁壮萌芽的滥觞，续存的民意能量仍以各种形式埋伏在「党政趋向」类项目中，发挥学运的长尾效应，其中募资金额及人数最高的「割阑尾计划」，锁定罢免国民党籍立委蔡正元、林鸿池与吴育升，群众对代议士放任服贸协议通关表达不满。2019 年启动的罢免时任高雄市长韩国瑜的「wecare 罢韩 30，高雄 Reset 大游行」，为台湾史上第一起成功以公民募资形式介入政治议程完成罢免行动的项目。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募资平台上对香港民主奥援，案 64「铜锣湾书店 | 台湾重启 | 为自由的灵魂

---

<sup>14</sup> 公民募資總表前十名專案，分別是 1.割闌尾計劃 Appendectomy Project（黨政趨向類：1198.4994 萬、11514 人次）、2.非常召集 | 牽手步入禮堂的最後一哩路（性別平權類：1037.9789 萬、5334 人次）、3.福山部落：方舟計畫（弱勢關懷類：802.4666 萬、1224 人次）、4.拯救台灣石虎：吃雞·毒殺·衝突化解——全民募資計畫（動物保護類：759.8476 萬、4580 人次）、5.【集資廣告】台灣，這次妳一定要撐下去（黨政趨向類：759.8476 萬、11514 人次）、6. wecare 罷韓 30，高雄 Reset 大遊行（黨政趨向類：616.0988 萬、4188 人次）、7. 銅鑼灣書店 | 台灣重啟 | 為自由的靈魂而開（黨政趨向類：597.7350 萬、2901 人次）、8.《美感教科書第二季》107 教改倒數計時，台灣孩子值得一套更美的課本！（教育推廣類：564.0281 萬、2824 人次）、9. 公民割草行動（黨政趨向類：551.3760 萬、4352 人次）、10.《政經關不了》最勇敢的政論節目·政經全面攻網（自媒經營類：510.5700 萬、549 人次）

而开」项目，为支持出版自由。在 2019 年初习近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及香港反送中抗争，针对年轻选民而言，「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即视感，反应了多数民众对香港处境的忧虑（俞振华，2020 年 1 月 22 日），而案「铜锣湾书店」显现香港民主议题的特殊性，在消费者公民的想象中，塑造了香港民主言论自由在台湾重现的可能。

表三：flying V、啧啧公民募资之党政趋向类前十名列表

专案名称	募资平台	台币（万）	捐款人次	项目发起方
割阑尾计划 Appendectomy Project	flying V	1198.4994	11514	割阑尾计划 (个人或非正式组织)
【集资广告】台湾，这次妳一定要撑下去	flying V	694.7166	3611	自己国家自己救 (个人或非正式组织)
wecare 罢韩 30，高雄 Reset 大游行	啧啧	616.0988	4188	wecare 高雄 (正式组织)
铜锣湾书店   台湾重启   为自由的灵魂而开	flyingV	597.7350	2901	林荣基 (个人或非正式组织)
公民割草行动	啧啧	551.3760	4352	公民割草行动 (正式组织)
太阳，不远 - 太阳花学运影像纪录	flying V	502.6619	3153	太阳花学运影像纪录 (个人或非正式组织)
沃草！国会无双 2.0：自己的国会自己督！	flying V	492.3659	3897	沃草 (正式组织)
台湾保卫战   拒绝中国渗透，推动「护台法案」!	啧啧	413.5616	2123	护台防中立法行动小组 (个人或非正式组织)
在挪台湾人国籍正名运动	啧啧	322.7431	1461	挪威居留证诉讼核心团队 (个人或非正式组织)
「回家以后」—— 2020 青年民主返乡列车	flyingV	288.3927	5586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 (正式组织)

数据源：本研究搜集与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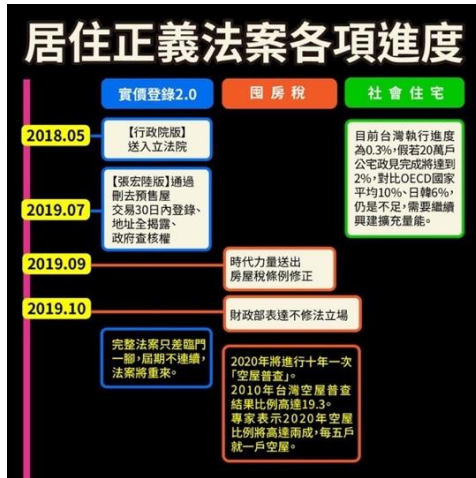
观察台湾公民募资的发起项目，从参与人数、募资金额等客观条件上，皆可看出「党政趋向类」的公民募资相当重要，这是展现民众试图以集体力量与政府的协商经验，有其深入探讨的必要性：学者提醒讨论公民募资特色时，强调不应只是关注平台、项目项目、募资赞助方，更需要结合募资发起方观点，了解其互相交互的实作经验（Wenzlaff, 2020）。与欧美偏向小区建设的公民募资特色有所不同，从以上台湾公民募资平台及项目项目整理（表 2 ~ 表 3），观察到党政趋向类的金钱（33.33%）及人力（40.79%）动员表现突出，然而令人玩味的是排名前十项项目主要涉及政治议程介入（选举、罢免）、地缘政治关系（太阳花、主权正名、反渗透、香港民主），在网站的募资发起方的介绍，却多以个人、非正式组织身份发起。从上述整理出台湾法令对于公民募资规范尚未周全，弹性规范的双面刃固然使新创企业可以弹性自由发展，而公民募资带有政治参与的实践特色，在募资发起方的身份上，却涉及了政党侧翼的猜想（陶本和，2015 年 12 月 23 日；赵婉淳，2019 年 12 月 27 日），因此循此台湾募资实作经验的发展脉络，本篇研究以「党政趋向类」的公民募资聚焦，进一步讨论公民募资本文本中的动员策略与意识形态。

## 二、从文本分析看动员策略与意识形态

### （一）行动目的着重于政治议程介入

逐笔观察募资的行动面向，可分为政治议程的介入（29%）、在线工具（14%）、线下集会（26%）、作品（10%）、其他项目（21%）等五个行动类型。公民募资的行动反映台湾政治经济结构上的缺失，也突显台湾倡议行动的取向，其中政治议程的介入（29%）占比最重，揭露了社会行动者不满政府及代议制度的缺失，提出法案倡议包含空污、废核、青年投票、罢免不适任官员、拒绝红媒、东海岸土地开发、气候变迁、两岸监督条例、居住正义（如图四）等。

图四：案 62「终结金权政治，实现居住正义」募资网站文本



数据源：截图自啧啧募资网站<sup>15</sup>

然而从议题中也可以看出在政治议程的介入中，募资平台发起方对于资本家剥削、经济劳工条件不平等、低薪、精神病除罪化司法等议题并无太多着墨，至今针对美国「占领华尔街」等反政商交相勾结的倡议募资或甚至是劳工权利等相关的募资主题，在台湾募资平台鲜少提及。从文本分析单位上，观察到线下集会（26%）是最常使用的行动类型，如讲座、放映会、音乐会、演唱会、街头抗争等；在线工具（14%）大多是太阳花当时的学生或公民团体自发性延伸的募资项目，项目的行动目的用于监督国会、问政网站或是公民媒体。从分析结果也回应了 Davies (2014)、Charbit 与 Desmoulin (2017) 提及公民募资重视社群的关系，并且连结了线下小区的动员，从数据上也再次证明了公民募资着重场域的经营，体现了公民募资中在地社群凝聚的行动特色，而募资平台则成为在线与线下之间的资源串接点。其他项目（21%）则表现在多元及特色的倡议表现，如外交行动、台湾正名等的媒体登报行动。而公民募资中的作品（10%），则大多都是 2014 年后太阳花学运后的作品，民众做为活动纪实或是提供公民媒体的观点再现。

<sup>15</sup> 參見 <https://www.zeczec.com/projects/housing-right-1109>

## (二) 以台湾认同做为行动召唤

行动召唤是募资文案的讯息重点，也是说服式传播的核心。募资发起方在募资文本中提供了「操纵说服特征」，这些核心议题与个人价值观一致 (De Zúñiga, Copeland & Bimber, 2014)，做为赞助方被文本中的核心价值吸引，有意识地进行伦理道德的消费，也就是「消费支持」。因此透过募资文本中行动召唤，可以窥见募资发起方提供何种核心说服策略做为刺激消费的动能：在募资文本分类中可以发现「台湾角色认同」(26%)是占比最大的论述核心，「政府角色失能」(19%)次之，接下来依序则为「代议民主失望」(16%)、「太阳花相关」(14%)、「媒体改革」(8%)、「审议民主」(9%)、「人权自由」(7%)、「选举文化」(1%)。

你终于可以站出来，成为决定台湾未来的关键 ~ 「案 67：  
回家以后 2020 青年民主返乡列车」

Monticelli 与 della Porta (2018) 主张消费行为建构个人身份，意味者个人消费(赞助)什么，等同于你认同什么。在公民募资文本中，将台湾做为募资个体的族群认同(26%)是最常见的文案手法，在此也强调了募资赞助者与土地之间的连结性，鼓励民众发挥草根的力量。于此分析浮现了 Wodak 提及的论述分析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处理「认同政治」，而认同的建立分散在不同地域、族群、世代的记忆、叙事与迷思中 (Wodak, 2010; 倪炎元, 2018)。根据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公布的《台湾民众台湾人 / 中国人认同趋势分布 1992~2020》，2007 年后台湾民众认为自己是台湾人(48.4%)的比例首次超越台湾民众认为自己是中国人(43.1%)的比例<sup>16</sup>，在募资文本中，大量出现「台湾」关键词，做为行动的呼唤，似乎也暗示了募资的行为就是投资台湾的未来。于此可观察出「台湾认同」成为积极性政治消费的一种手段，也响应了新传播科技下认同边界形塑了组织的样貌 (Diani, 2019)。

---

<sup>16</sup> 《台湾民众台湾人 / 中国人认同趋势分布 1992 年~2020 年 6 月》，资料来源：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 <https://esc.nccu.edu.tw/upload/44/doc/6960/TaiwanChinese.jpg>

募資文本中，时常出现直指政府角色失能的控诉（19%），现实状况对应了草根人民的被剥夺感，此时的赞助行动，更突显出公民募资赞助方不可推卸的道德消费角色，如同 Oliva（2018）提及的「共享政府」，公民在情感上成为了自身福祉的推动者。

无论是回家的房租，还是出门的消费，食衣住行都深受高房价冲击，...为什么我们的政党和政治人物，似乎都拿不出办法来解决？～「案 65：终结金权政治实现居住正义」

而针对代议民主的失望（16%），则反映了民众对于国会立法委员及当地政府首长议会的施政不满，主要议题包含了不适任民代的罢免或是政策的倡议。

代表地方选区、应该反映民意的代议士，却长期跑红白场、接受关说绑桩，派系角力大于公平正义，在国会殿堂里沦为党意的橡皮图章时，自己的立委应该自己罢！（罢免时任国民党台中市立委蔡锦隆）～「案 28：全面罢免 2：极速罢免」

太阳花相关的公民团体仍然持续为监督政府努力，除了相关学运纪念作品集外，特别一提的是，其他公民募资项目如青年返乡列车（2014 年），也跟随这股学运势力的余温号召捐款人，试图影响 2014 年九合一县市长及议员的选举。在此，可观察到「太阳花」也成为了募资情境中被消费的议题（14%），吸引对太阳花议题有共感的捐献者。

有什么方法可以不用像太阳花学运当时那样餐风露宿睡柏油路，却还是可以汇集人民的力量发挥影响力，改变台湾的未来？有的！今年的 11 月 29 日就有这样的机会。～「案 21：【青年返乡投票专车计划】青年投票、翻转政治」

### (三) 隱匿組織身份與政黨角色做為群眾動員

從以往研究理解公司企業與大型組織發起之社會文化活動項目在目標募資金額與實際募集金額上皆顯著高於小型組織或個人募資發起方，合理推斷組織在公民募資中的集結資源及信任優勢角色（王笙，2015；張又云，2015），然而與下述研究發現悖逆，本篇研究將募資發起方分類為組織或聯盟、個人或非正式團體<sup>17</sup>，在 70 筆黨政趨向類公民募資中的文本中發現以組織或聯盟發聲的募資項目為 41 案（59%），發起方為個人或非正式團體則有 29 案（41%）。

首先從模板架構審視項目發起方介紹界面，募資平台的規定中並無規定必須上傳發起組織或團體的非營利事業登記證等證明文件，贊助者其實難以分辨發起方背後組織的角色，也就是說，在募資平台的模板上，募資發起方可彈性選擇以何種身份表態，舉例「割闌尾」相關募資事件：案 13「割闌尾計劃 Appendectomy Project」中只提及提案者「割闌尾計劃」，沒有留下其他線索分辨發起角色為個人或組織；而案 25「割闌尾高雄區の急征」同樣也是簡單留下項目名「割闌尾高雄區の急征」。在「割闌尾事件」罷免的對象，蔡正元、林鴻池、吳育升、黃昭順、林國正、蔡錦隆的黨籍都是國民黨，雖然發起方都未直接表態政治立場，但文本中幽微透露出親綠的政治意識形態。從文本可窺見部分募資項目以個人或非正式團體之名，隱匿政治意識形態，對於自身角色採取迂回模糊的策略，展現出鏈接式行動邏輯的特性。

觀察黨政趨向類型的公民募資，隱藏組織身分似乎形成一種策略，以看似代表公民意見的個人發起項目，合理化了文本中隱藏的政治立場，如同 Bennett & Sergerberg（2012）分析鏈接式行動與集體式行動中，發現了組織藏於幕後，但對於傳播內容仍然具有控制權，也就是雜揉型的鏈接式行動特色：運用社交技術手段，讓鬆散的公共網絡圍繞個人化的行動主題而聚集起

---

<sup>17</sup> 組織或聯盟是指若共同發起方有登記於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經濟部商業司公司／商業／工廠登記資料、或由維基百科登錄，即認為組織或聯盟；非正式團體是指在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未登記在案之發起方。



来，在不向其参与者强加政治符号和集体身份 / 认同的情况下动员资源或创立联盟。

值得一提的是，不以正式组织为认同边界时，身份认同则成为动员策略，其中以「我们」、「年轻人」为名吸纳集结作为手段：募资文本中匡列对话的沟通对象，并且将对话族群也列入「我群」，综观文本中的角色表态，时常惯用「我们」，如案 13「割阑尾计划」中募资网站的文字云，计算出文本中的可复制文字共出现 67 次「我们」单词，图片中则出现 4 次「我们」（图五）。

图五：案 16「割阑尾计划」文字云及图片<sup>18</sup>



此种论述策略与 Wodak 提及自我指涉经常使用「我们」来代表群体中的「大我」。而在公民募资中的「我们」，则同时或个别指涉几种角色：（1）经历相同社会情境者、（2）当地居民、（3）受威权压迫的弱势者、（4）发起团体代表、（5）一般职业角色等。

此外在台湾，年轻人等同于「低薪化」的代表，自 2009 年 5 月 11 日颁布「大专毕业生至企业职场实习方案」，俗称「22K 方案」，低薪化趋势已成为当代年轻人出社会之后的困境，甚至在网络平台上，年轻人自称「鲁蛇」（loser）、「本鲁」自嘲（吴骏盛 2014；转引自庄佳颖 2014）。

<sup>18</sup> 圖左：資料來源：由研究者自制文字雲。生產器來源：

<https://wordcloud.timdream.org/>

圖右：資料來源：截圖自 flyingV 募資網站：<https://www.flyingv.cc/projects/3080>

孔子说三十而立，但台湾现在年轻人却是「三十焦虑」…  
领着 22K 月薪面对高而房价，不只焦虑，更是绝望与愤怒…放  
弃购屋，却被批评不存钱、不努力的「鲁蛇」。~「案 19: 巢  
运: 帝宝一坪换公平」

对比政治权贵，年轻族群是社会上相对资源弱勢的群体，文案发起方透  
过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与想象的对话者连结，勾勒出年轻人的世代困境，对于  
弱勢的赞助，也形成合理了道德的消费。在此的语艺作用形成了「实质共享」  
的关系，也就是两个个体透过拥有相同的理念、态度、特质等呈现实质的连  
结，形成了同构型（彭怀恩，2002）。

#### （四）反红反蓝视为敌对角色的共鸣

对于政治宣传来说，最常见的宣传策略，其一是「激发敌我之间的对立」  
也被认为是冲突的重大驱力，其二，运用刻板印象，塑造共同敌人，也称为  
「共鸣策略」，似乎对立越极端，冲突就越明显，冲突越明显，说服重点就  
越明确（孙秀蕙、陈仪芬，2011）。本文将以上两种策略应用为「排斥」的  
策略解释，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募资文案中即使募资发起方选择不直接表述  
政治立场，但 70 案中的 52 案仍可从文本中观察到特定的反对立场，并于论  
述策略中塑造一个共同的敌人，这些反对立场包含反蓝（30 案，58%）；反  
红（12 案，23%）；反绿（6 案，11%）；反当地政府（1 案，2%）、反媒  
体霸权等（3 案，6%）。Díaz & Cacheda（2016）提及群众募资做为倡议运  
动的形式，参与者拥有共同的倡议目标，而倡议的形式往往是以反对霸权方  
式呈现，透过对抗共同的目标，来创建一个集体身份。从文本中的对立立场  
来看，反蓝的修辞论述高达 58%、反红论述为 23%，显示出募资发起方塑造  
「负向他者」，操作「对立论述」来做为另一种政治消费的动能，这也显示  
出了在台湾两极化政党政治的特色下，操作对立意识似乎比认同某个政党，  
更能争取支持。观察反国民党政权的募资主题，亦发现长期性的倡议行动，  
包含废核（6 案）、228 共生音乐节（4 案）、台湾独立（2 案）、投票列车  
（5 案）等行动要求：将中国大陆政府视为敌对论述则包含了反大陆政权压

迫、反紅媒、撐香港、台灣正名等四個倡議方向，從反紅的論述中，大致可觀察出文本中將「中國」框架為「加害者」，並且塑造我者為「受害人」，鮮明的表現出透過強化衝突，並透過情緒性字眼「蠻橫」提升了加害者的迫害。（圖 6）

圖六：案 55 「台灣不是中華台北！支持東奧正名、幫台灣隊加油！」

19



在對照反紅的議題框架：反大陸政權壓迫、反紅媒、撐香港、台灣正名，以上論述都是國民黨政權難以響應的重大爭議性議題。林怡廷（2020 年 3 月 6 日）提及台灣經歷民主化及本土化後，台灣認同及民主價值已是主流的社会價值，在兩岸議題上，蔡英文政府公開反對一國兩制、支持反送中，反觀國民黨明顯的亲中色彩使其落入囚徒困境，失去台灣社会和年轻人认同，因此藉由反紅的論述，某方面也間接的擴大了我群與他群（國民黨、中國大陸政權）的差異性。

### 三、从历时性分析看公民募資經驗

吳乃德（1996）提及「台灣人」的族群意識和對台灣的國家認同是同步並且逐步發展的，而國家認同歧異却是台灣當代政治最顯著的分歧，並且一直是撕裂台灣的重要議題，吳乃德（1996）曾經提出國家認同是選舉中最常

<sup>19</sup> 資料來源：截圖自嘖嘖募資網站：<https://www.zeczec.com/projects/TeamTaiwan>

被讨论的议题，也是候选人攻击对手的主要武器，他认为族群认同的形成是透过政治动员的社会工程。回到台湾 2012 年至 2019 年的政治情境，经历了两次九合一选举与总统大选，而台湾认同以及和中国大陆的关系，一直是台湾政党政治的主旋律，2019 年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四十周年谈话，年中掀起滔天巨浪的香港反送中运动，撼动台湾政局，也让国人对国族和国家认同出现震荡，世代对于国家认同的冲突到了历史新高（林幸妃，2019 年 12 月 30 日）。

顺着以上研究脉络，接续讨论公民募资提出的当时政治环境（时任执政党、时任县市长多数执政党）与募资发起方的反对立场进行比对：将 70 案募资项目依照发起时程排序，关键的时间断点分别为 2014 年九合一选举（2014 年 11 月 29 日，选举结果民进党取得多数县市市长执政）、2016 年总统大选（2016 年 1 月 16 日，选举结果民进党蔡英文当选）、2018 年九合一选举（2018 年 11 月 24 日，选举结果民进党大败，国民党再次取得多数县市长席位）、2020 总统大选（2020 年 1 月 16 日，选举结果民进党蔡英文连任），主要分成四个时期进行观察：（如图七、图八）

图七：议题要求与执政政党的对照—1

編號	專案名稱	反對對象	時任執政政府	時任縣市長多數執政黨	專案上線期間	時期
1	PLU.R.S.電音反核陣線音樂遊行				2013/2/21-3/8	時期 A : 2014年九合一選舉日前 (2014年11月29日)
2	台灣需要白色的力量				2014/1/1-2/28	
3	3/8 全台廢核大遊行：忍無可忍，不見不散				2014/2/6-3/10	
4	PLU.R.S.電音反核陣線 2014 音樂遊行				2014/2/19-3/11	
5	【集資廣告】台灣，這次妳一定要撐下去				2014/3/24-3/24	
6	413·白色力量守護台灣之夜				2014/4/7-4/12	
7	太陽，不遠 - 太陽花學運影像紀錄				2014/4/7-6/5	
8	蒲公英計畫：318 公民運動札記《反什麼服貿》服貿紀事				2014/4/7-4/11	
9	盛開的向日葵-太陽花學運創作合輯				2014/4/8-4/18	
10	學韻：台科大學生太陽花主題曲				2014/4/14-6/10	
11	太陽花學運合輯，等待破曉				2014/4/16-6/12	
12	勇氣的種子：『誰是太陽花』樂遊創作專案				2014/4/19-6/7	
13	割關尾計劃 Appendectomy Project				2014/5/3-6/19	
14	守護希望世代出版計畫-關於真相與法律 公民參與 集體說故事 次章！國會無雙 2.0：自己的國會自己督				2014/5/13-7/13	
15	新聞e論壇 - Be your eyes & ears				2014/5/26-6/11	
16	公民攝影守護民主陣線“公民直播記者培訓”全臺巡迴計畫				2014/6/3-8/4	
17	公民卡拉OK				2014/8/5-8/31	
18	奧運：帝實一坪換公平				2014/8/26-10/25	
19	市長，給問嗎？前進大台中				2014/9/2-10/1	
20	青年返鄉投票專車計畫_青年投票、翻轉政治				2014/10/31-11/10	
21	監票者聯盟全國監票活動				2014/11/9-12/6	
22	全民監政				2014/11/13-2015/1/13	
23	雲林青年返鄉投票專車計畫				2014/11/19-11/28	
24	割關尾高雄區的急徵				2014/11/29-2015/1/29	

編號	專案名稱	反對對象	時任執政政府	時任縣市長多數執政黨	日期	時期
26	全民參政：鍵盤民主網				2014/12/1-1/31	時期 B : 2015年1月14日九合一選舉後至2016年1月6日總統大選日前
27	2015 台灣獨泥板助印募資				2015/1/7-2/17	
28	全面罷免 2：極速罷免				2015/1/16-2/23	
29	台灣第一屆模擬 WHO - 許臺灣的醫療與外交，一個美好的未來				2015/1/17-2/5	
30	228 共生音樂節—青年再起				2015/1/27-3/20	
31	314 廢核遊行 台南場健康家園巡迴行				2015/2/26-3/13	
32	《廢核重生》314 南台灣廢核大遊行				2015/2/27-3/13	
33	314 核電告別式 - 全國廢核大遊行				2015/3/2-3/13	
34	革命議會：拆車輪計畫				2015/9/15-10/31	
35	對國際發聲！請支持台灣成為真正的國家！				2015/11/14-11/22	
36	海馬迴補修 兩岸監督條例升空計劃				2015/11/16-12/10	
37	全國青少年投票日：告別舊國會，十八歲要投票				2015/12/2-2016/1/20	
38	青年·回投 中部返鄉投票專車計畫				2015/12/22-12/31	
39	最後一里路，全民『監票』				2016/1/7-1/14	
40	正義衙門，打開台灣的正義之門				2016/1/10-3/7	
41	228 共生音樂節：我們在這裡				2016/1/13-3/10	

数据源：笔者重新整理与绘制。<sup>20</sup>

<sup>20</sup> 圖表說明：藍色為國民黨、綠色為民進黨、紅色為中國大陸政權、灰色為當地政府、黃色為媒體霸權。

图八：议题要求与执政政党的对照—2

編號	專案名稱	反對對象	時任執政政府	時任縣市長多數執政黨	日期	時期
42	愛國T恤-5_20邀請您·一起穿出屬於台灣人的榮耀	紅	藍	綠	2016/2/1-3/30	日 時 前 期 ( C 2 : 0 2 1 0 6 1 年 6 1 年 月 總 1 統 7 選 日 舉 至 後 2 至 0 2 1 0 年 8
43	對世界發聲！落實轉型正義·門牌喊聲建國！	藍	藍	綠	2016/3/3-4/30	
44	605【顧健康 疼困仔 反污染】大遊行	綠	藍	綠	2016/5/13-6/14	
45	海濱單車天堂怎麼了？集氣登頭版廣告	灰	藍	綠	2016/12/24-2017/1/17	
46	219我在高雄反空污	綠	藍	綠	2017/1/26-2/19	
47	228共生音樂節—欲行 è 路	藍	藍	綠	2017/2/7-3/12	
48	第六屆共生音樂節—壹無此人	藍	藍	綠	2018/1/23-3/30	
49	搖滾凱道365_沒有人是局外人_海濱巡迴計畫	綠	藍	綠	2018/3/30-6/1	
50	改變選舉生態·就從抱怨開始				2018/5/11-6/11	
51	在那台灣人國籍正名運動	紅		綠	2018/8/1-9/30	
52	減煤好空氣—2018高雄反空污大遊行	綠	藍	綠	2018/9/26-11/11	
53	台灣不是中華台北！支持東奧正名·幫台灣隊加油	紅		綠	2018/10/19-11/9	
54	喂？我在路上了_2018 青年民主返鄉列車			綠	2018/10/24-11/9	
55	給我好空氣   問政新北第七選區			綠	2018/11/2-12/2	
56	廢話電子報：廢死聯盟其實很怕死又不想死的真心話				2018/12/18 ( 訂閱制 )	
57	世衛無國界醫療外交計畫-看見台灣醫實力	紅		藍	2019/4/11-5/9	舉 時 前 期 ( D 2 : 0 2 1 0 8 1 年 8 1 年 2 九 月 合 2 一 5 縣 日 市 至 長 2 選 0 舉 1 後 9 及 年 2 1 0 2 2 月 0 3 年 1 總 日 統 ) 選
58	一起讓更多人關心台灣吧	紅	綠	藍	2019/4/24 ( 訂閱制 )	
59	拒絕紅色媒體、守護台灣民主：623 凱道集結聲援計畫	紅	藍	藍	2019/6/16-6/16	
60	wecare罷韓30·高雄Reset大遊行	藍	綠	藍	2019/7/19-8/31	
61	公民割草行動	藍	藍	藍	2019/7/19-7/31	
62	沒有圍牆的監獄：維吾爾人的今天 特展	紅	藍	藍	2019/8/14-9/28	
63	台灣保衛戰   拒絕中國滲透·推動「護台法案」!	紅	藍	藍	2019/8/20-9/24	
64	銅鑼灣書店	紅	藍	藍	2019/9/5-11/4	
65	終結金權政治·實現居住正義	綠	藍	藍	2019/10/31-11/3	
66	減煤爭好氣·呼吸要平權：2019 高雄反空污大遊行	綠	藍	藍	2019/11/1-12/15	
67	回家以後 2020 青年民主返鄉列車			藍	2019/11/24-12/30	
68	2020年政黨不分區立委辯論式政見發表會		藍	藍	2019/12/3 - 2020/1/31	
69	每月來點「政」能量   一起用政治知識來改變台灣			藍	2019/12/4 ( 訂閱制 )	
70	撐香港   援助與安置計畫	紅	藍	藍	2019/12/10-12/15	

数据源：笔者重新整理与绘制。

时期 A, 2014 年九合一选举日前 (2013 年至 2014 年 11 月 29 日): 为国民党马英九执政期间, 于 2014 年发生太阳花学运期间及之后, 多项项目都表明了太阳花学运相关行动及试图影响 2014 年九合一选举结果为主要行动导向, 高达 17 案募资项目持有反对当时执政党—国民党的立场, 其中太阳花相关募资占了 10 案, 反蓝论述是这时期的主基调。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案 25「割闌尾高雄区の急征」, 动员旨在罢免高雄区立委黄昭顺、林国正, 由于募资发起日为九合一选举投票日 (2014 年 11 月 29 日), 于法不可宣传选举人广告, 而募资项目中的反蓝语境重现太阳花运动国民党代议士的不适任, 募资发起方在如此敏感的选举日发布募资项目, 是否间接影响舆情? 无从得知。

时期 B, 2014 年九合一选举至 2016 年总统大选日前 (2014 年 12 月 25 日至 2016 年 1 月 16 日): 在此阶段, 民进党地方选战得胜, 中央与地方分别由蓝、绿主导, 在此阶段民进党积极布局 2016 年总统选战, 而值得注意的是, 时期 B 首次出现台湾公民募资史上台湾独立相关的行动 (案 27、案 35), 而反核行动在此时于台湾北中南各地发起游行集结行动 (案 31、案 32、案 33), 可以看见此阶段的议题集中在统独及反核议题。而在总统大选前一周, 则有二二八事件、转型正义相关募资主题 (案 40、41), 募资项目发起时机敏感, 做为案例讨论可持续关注。

时期 C, 2016 年总统选举后至 2018 年九合一县市长选举日前 (2016 年 1 月 17 日至 2018 年 11 月 24 日): 2016 年总统选举蓝下绿上, 民进党蔡英文赢得总统大选, 这段时期是朝野同时皆由民进党占多次席位, 本篇研究分析 2016 年总统大选后仅有 4 件募资项目发起, 2017 年整年度更只有 2 起, 发案频次明显雪崩式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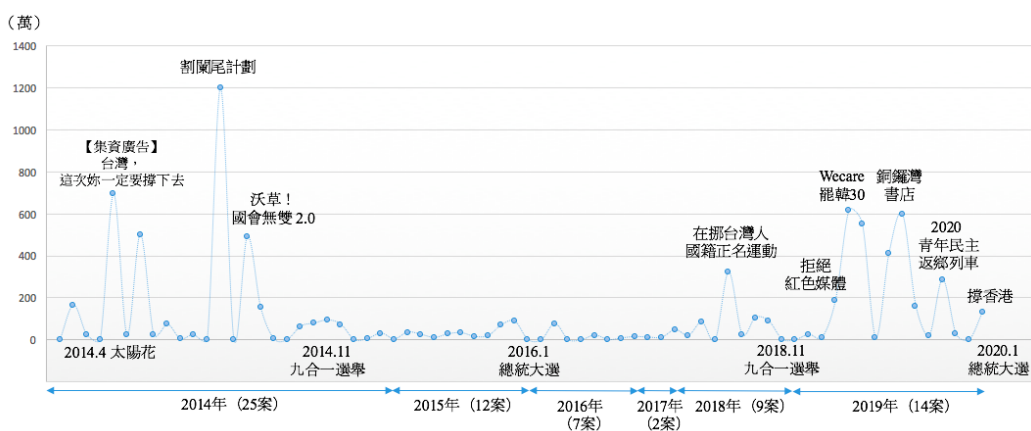
时期 D, 2018 年九合一县市长选举后及 2020 年总统选举前 (2018 年 12 月 25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则是 2018 年九合一选举之后, 同时也是 2020 总统大选前 2 年, 在地方首长选举的表现上, 民进党失利仅拿下地方首长 6 席, 国民党则获得 15 席<sup>21</sup>, 于此同时, 可以观察到许多反对中国大陆威

---

<sup>21</sup> 2018 年中華民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 資料來源: 維基百科。

权的募资案例增加，高达 7 案，议题要求包含反对红色媒体、台湾正名、撑香港、反中国渗透等议题，反蓝的议题则有 2 案，主要是针对罢免韩国瑜的议题，反绿则有 2 案，议题要求在居住正义及高雄反空污的议题。

总合以上四个阶段的历时性分析，从「募资项目发起的政治时势」与「募资发起方的反对立场」交相观察发现如下：监督民进党之公民募资项目远少于监督国民党、2018 年九合一选举前后敌对共鸣目标转向反红色渗透、募资动员高峰期与社会运动及政治时事连动。特别观察六年间案量峰期变化（见图 9），表明了募资倡议的发起与社会运动、选举活动、地缘政治情势等有高度相关性，这类重大政治事件牵动着募资动员的节奏，募资商品的消费被交织在地缘政治与政党意识的情境中，高峰更是集中于选战前与大型社会事件后。此外，消费实践与党政更迭有明显的交互动态关系，2016 至 2017 年两年间朝野都是民进党主政，募资发起量明显偏少，整体公民社会的募资行动者为何在这两年间近乎沉寂，其中不言而喻或有待进一步解释。摊开历时性数据，除了募资集中在选战前，不利于民主发展之外，公民募资行动看似形塑出公共意识，却可能由特定的意识形态主导，当民智与消费者公民的道德被利用，也反映出了群众智慧的决策风险。



图九：募资项目年度发起量及金额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8年中華民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



数据源：笔者重新整理与绘制。

## 伍、结论

募资赞助方视为公民消费者，认同了募资发起方议题建构的价值，以金钱赞助的行为响应了募资议题，将在线倡议化为实际的行动。从层层线索观察，在公民募资平台的动员流程中，发起方的角色与文本策略也成为公民募资平台动员系统的重要决策关键：

### 一、公民募资的角色策略——「弱勢我者」

本研究发现，揭示了公民募资文本在「我者」定位上的特殊策略：Wadak提及论述策略都涉及「正向我者」、「负向他者」，这是建构认同与差异论述的基础（倪炎元，2018），然而不同于 Wadak 的「正向我者」、「负向他者」论述策略，本篇研究发现在公民募资的叙事处理上，呈现「弱势我者」、「负向他者」的策略，通常透过「年轻人」指涉弱势我群，强化了政治消费的道德性，循着文本透露出的发起方策略，本文发现政治性公民募资的文本善于使用「吸纳」、「排斥」的策略制造出冲突的共鸣，募资发起方大量使用「我们」、「年轻人」、「草根」的字眼建构了发起方身份，象征这群人与捐献者共同拥有相对弱势的身份。在回顾网络群众募资平台中资源交换与行动者参与动机的文献中，发现群众募资涉及寻求认可、建立连结、参与感或帮助他人等更涉及情感层面的资源流动（陈慧如、陈谊珊，2016）。观察公民募资的文本运用，淡化以「政党」、「组织联盟」视为「正向我者」的叙述策略，透过「弱势我者」做为募资发起方的角色定位，也实现了募资动员中在认同、连结等情感需求。

### 二、台湾认同的歧异视为身份认同标章

本篇论文整理出募资发起方建构「台湾认同」（30%）的议题，将台湾价值做为催化剂，来获得社群团结，此研究发现也印证了张嘉玲（2016）提及「强调本土意识，进而取得募资者赞同」是群众募资成功关键之一。在以往募资的动员经验中，募资项目需要组织角色以提升项目信任度、动员各界资源，然而在台湾公民募资行动特色发现，募资发起方藉由议题的框架，形塑了捐献者的身分／认同，在建构认同的策略上，公民募资发起方更倾向以「倡议议题」在前，「台湾认同」在文本中做为身份边界认同，此时组织的角色隐于幕后，这种动员策略与 Bennett & Segerberg（2012）提出了「链接式行动的逻辑」相呼应，募资发起方在处理「认同政治」时，将组织的角色隐匿于后台，化身为个体公民发起行动，以个人角色做为整体的代表发起倡议，此种协调方式，有利于募资项目的「去政党化」，进而争取中间选民，淡化组织角色的动员策略，免除了个人在行动中被定性标签，捐献者可专注于行动议题。在论述策略上，募资发起方为了符合认同的价值，塑造共同的敌人以操作台湾认同的价值，赋权赞助者的行动正当性：然而从公民募资的论述策略中，观察到台湾认同的意义被政治角力腐蚀，蓝绿两党的认同者在一中／台独、中国人／台湾人、威权态度／民主理念，这些主观态度上有清楚的分野，身份认同的本质失去了「文化」、「族群」的内涵。

### 三、政党意识形态隐匿于日常生活中的政治

当公民募资进入日常生活，也成为当代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Charbit & Desmoulin, 2017），以往涉及重大政治选举背景的动员，公民在行动前，清楚理解各政党所拥护的意识形态后才进一步行动。然而，以议题主导的在线公民募资，其政治动员是以非常规形式纳入公民消费者的日常生活，捐献者的决定转瞬在指尖之间，募资发生的时间段也非在特定选举日，政治参与的正式情境松动，政党意识形态也随之渗透至公民社会的日常，也解释了政治消费的「生活方式政治」选择情境（Giddens, 1991）。藉由历时性分析的线索，本篇研究勾勒出线上流动的政治参与如何镶嵌在消费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募资发生高峰期座落于选战前或牵动于地缘政治，然而公民募资做为监

督政府的工具之一，对比 2014 年 25 案，于 2017 年间仅有 2 案，监督公器的角色明显失衡，此种峰期的明显变化更揭露出看似透明的公民募资藏有猫腻，而公民消费者浸润日常生活政治中的确难以察觉。当公民募资发起者化整为零，回避了政党角色的表态，消费者公民选择行动代理人解决社会问题，也必须审思、审查募资发起人背后组织的意识形态，观察该发起组织长期支持的议题、组织成员政党关系及意识形态等。

#### 四、政党意识渗透稀释了公共意志

台湾长期蓝绿两党角力的政治环境，致使公民募资的公共论述空间也渗透了国民党与民进党的党派角力，甚至也交织着地缘政治的走势：从太阳花运动的反服贸事件后，募资平台大量发起「反蓝」的倡议主题（见图 7），到 2016 年蔡英文上台之后（见图 8），公民募资以「反红」做为倡议主轴，若从历时性观察公民募资议题的核心，脱离不了台湾主权、抵制大陆政权等主题，随着社会弥漫着亡国感氛围，这类主题更接近民进党政府的「议题所有权」策略。在利他性的公民募资消费中，实现社会改革的价值是最重要的动能，而历经不同政党轮替的政治情境，公民募资倡议与政党议题所有权，共构了属于台湾公民募资的消费经验。实际上进一步对应募资发起的论述情境，研究发现在蓝绿两极化政治的政治背景下，募资平台的监督立场却严重倾斜于反蓝、反红的论述（82%），值得省思的是，在民进党政府执政期间，更少见监督民进党募资项目（10%）的发起，显示公民募资监督政府的作用失衡，另外一方面，以反对政党立场为排斥论述的公民募资，在劳工权益、弱势关怀、国防、教育等重要政治议题上出现排挤效应。鲁索曾在《社会契约论》提倡「公共意志」可以排除政党政治或代议制，真正代表全体人民意志的理想社会。原以为「公共意志」实现在公民募资，然而谁来建立、营运公共意识系统？当公共意识营运包藏政党意识的运筹帷幄，消费者公民从捐献行为获得的代理行动是否真的能够享受社会倡议下的成果？本篇研究行文至此对公民募资众志成城的神话打一个问号。

本篇研究透过文本解构数字政治参与的神话，并非意图指向公民募资可能为侧翼力量的集资金道：台湾是民主后进国家，在公民社会的政治动员过程中仍持续在经验中学习与省思，本文以政治消费视野看公民募资，从上述讨论消费者公民更应该理性理解，公民募资于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参与实践是一种「消费性支持」，研究证据表明浮现了募资行动中充满政党倾向的暗示，而公民募资非正式选举的政治参与，消费者公民浸润于日常接触的在线募资平台，公民募资行为代表了生活方式的政治消费主义的展现，赞助者不易察觉能动性背后，带有政党意识伪装成个人角色的政治行动。如同 Aitamurto (2012) 提及群众的在线政治参与是民主实践的过程，不是点到为止的昙花一现，而最后的目标应是公民共同追求的民主与平等社会。政策施行于民，公民从作中学需理性监督，决策倾向不应该依附在政党偏好，并且注意能见度较低却事关重要的倡议议题，有效发挥公民募资的公共性。

## 五、研究限制及未来研究建议

透过政治消费与动员逻辑的讨论，观察到公民募资中的募资发起方透过隐匿组织身份将政治意识藏于行动议题之后。然而，「党政趋向类」公民募资在不同国家发展脉络下，亦可能呈现不同特色，此与国家的民主成熟度、政治文化背景、经济发展、人口结构、教育程度、地缘政治等皆息息相关，本篇研究仅限于台湾公民募资之经验，以台湾做为案例研究，与其他国家募资消费经验必有不同之处，也有自身的挑战与课题，然而台湾在两极化政党背景、地缘政治的政权威胁等背景下的公民募资实践经验，可当作国际政治研究之应用与借镜。本研究抛砖引玉透过文本分析描绘出台湾募资消费实践的轮廓，其分析过程可能涉及个人语境诠释判断的限制：本文以诠释批判视野，透过定质分析募资发起方的策略，分类上是以台湾在地经验进行归类，且本研究中纳入多达 70 篇「党政趋向类」项目文本尚未纳入影音文本进行讨论，在分析完整性未有完善；此外，本篇研究分类之公民募资其他九个类型，其发起方策略及意识形态之论述策略可能也有所不同，是否渗入特定政

党意识形态，致使议题排他性也有待商榷。另一方面，本篇论文尚未解决政党暗示性文本与在线线下动员群众的互动关系，也仍待处理行动要求与成功募资的关系。本篇论文以台湾公民募资实践经验之研究初探，提供动员策略的大致轮廓，更多相关议题讨论，期待更多学者进一步探讨之。

## 参考书目

- 〈厌倦蓝绿第三势力展翅 选制不利小党 学者：挑战仍大〉（2014 年 4 月 15 日），《大纪元》。取自 <https://reurl.cc/GV4jmp>，上网日期：2020 年 4 月 20 日。
- 王擎天（2016）。《众筹：无所不筹，梦想落地》。台北：采舍。
- 吴乃德（1996）。〈自由主义和族群认同：搜寻台湾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台湾政治学刊》，1: 5-39。
- 林怡廷（2020 年 3 月 6 日）。〈站在反共和亲中的十字路口，国民党如何面对内部的「中国因素」？〉，《报导者》。取自 <https://www.twreporter.org/a/kmt-china-relationship-crossroad>
- 林幸妃（2019 年 12 月 30 日）。〈天下 2020 独家国情调查：五成六民众不满经济，但对台湾乐观者首度超过悲观〉，《天下杂志》。取自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98352>，上网日期：2020 年 4 月 15 日。
- 俞振华（2020 年 1 月 22 日）。〈国民党如何从 2018 的大胜到 2020 大败〉，《奔腾思潮》，取自 <https://www.lepenseur.com.tw/article/251>，上网日期：2020 年 4 月 20 日。
- 倪炎元（2017）。〈2014 年台湾太阳花学运中的官方论述策略〉，《传播与社会学刊》，42: 23-57。
- 倪炎元（2018）。《论述研究与传播议题分析》。台北：五南图书。
- 孙秀蕙、陈仪芬（2011）。《结构符号学与传播文本：理论与研究实例》。台北：正中。
- 张嘉玲（2016）。〈案以群分：大数据解析回馈型群众募资成功关键要素〉，《台湾经济研究月刊》，39(2): 27-37。
- 庄佳颖（2014）。〈从政治消费文化观点看当代台湾社会的民主参与和认同建构〉，《台湾国际研究季刊》，10(1): 160-184。
- 郭琼俐（2020 年 4 月 21 日）。〈「罢韩一役」民进党中央态度模糊 背后暗藏这个的政治盘算〉，《财讯》。取自 <https://www.wealth.com.tw/home/articles/25242>，上网日期：2020 年 4 月 20 日。
- 陈慧如、陈谊珊（2016）。〈群众募资模式探究：非营利组织案例分析〉，《经营管理理论丛》，12(1): 1-14。
- 陶本和（2015 年 12 月 13 日）。〈泛绿外围组织参与办辩论？沃草：被贴标签，

- 不公平》，《ETtoday 今日新闻网》。取自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51223/617934.htm>
- 陶振超 (2017)。〈社交媒体的动员力量：网络机会模式之观点〉，《新闻学研究》，131: 49-86。
- 彭怀恩 (2002)。《政治传播与沟通》。台北：风云论坛。
- 群众观点 (2016)。〈台湾群众募资报告，2015〉，《群众观点》。取自 <https://annual-report.crowdwatch.tw/2015>，上网日期：2020 年 4 月 20 日。
- 赵婉淳 (2019 年 12 月 27 日)。〈陈丽娜要监委调查 Wecare 募资 呛尹立勿闪躲〉，《中时电子报》。取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1227003389-260407?chdtv>，上网日期：2020 年 4 月 20 日。
- 卢岚兰 (2005)。《媒介消费：阅听人与社会》。台北：扬智文化。
- 阎沁恒 (1967)。〈传播内容之定量分析与定质分析〉，《新闻学研究》，1: 305-324。
- Aitamurto, T. (2012). Crowdsourcing for democracy: A new era in policy-making. *Crowdsourcing for Democracy: A new era in policy-making*. Finland: Committee for the Future.
- Baek, Y. (2010). To buy or not to buy: who are political consumers? What do they think and how do they participate? *Political Studies*, 58(5), 1065-1086.
- Bang, H., & Halupka, M. (2019). Contentious connective action: A new kind of life-political association for problematizing how expert systems operat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2(1), 89-104.
- Bennett, W. L., & Segerberg, A. (2012).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5(5), 739-768.
- Bennett, W. L., Segerberg, A., & Walker, S. (2014). Organization in the crowd: peer production in large-scale networked protest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7(2), 232-260.
- Berger, S. (2019). A behavior economic perspective to political consumerism. In Boström, M., Micheletti, M., & Oosterveer, P.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nsumerism* (pp. 111-133).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abham, D. C. (2009). Crowdsourcing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process for planning projects. *Planning Theory*, 8(3), 242-262.
- Brent, D. A., & Lorah, K. (2019).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civic crowdfunding. *Cities*, 90, 122-130.
- Brint, S. (2001). Gemeinschaft revisited: A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concept. *Sociological theory*, 19(1), 1-23.
- Charbit, C., & Desmoulin, G. (2017). Civic Crowdfunding: A collective option for local public goods? *OECD Region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s*, 2017(2), 1. Paris, France: OECD.
- Copeland, L. (2014). Value Change and Political Action: Postmaterialism, Political Consumerism,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erican Politics*

- Research* 42(2): 257-282.
- Dalton, R. J. (2008). Citizenship norms and the expansion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studies*, 56(1), 76-98.
- Davies, R. (2014). *Civic crowdfunding: Participatory communities, entrepreneur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
- Davies, R. (2015). Three provocations for civic crowdfunding.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8(3), 342-355.
- De Zúñiga, H. G., Copeland, L., & Bimber, B. (2014). Political consumerism: Civic engagement and the social media connection. *New media & society*, 16(3), 488-506.
- Devereux, E. (Ed.). (2007). *Media studies: Key issues and debates*. Los Angeles: Sage.
- Diani M. (2019). Modes of coordination in political. In M. Boström, M. Micheletti, & P. Oosterve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nsumerism* (pp. 89-109).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íaz, J. R., & Cacheda, B. G. (2016, March). Financing social activism: Crowdfunding and advocacy social movement in Spain in times of crisis. In *Proceedings of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lectronic governance* (pp. 139-148). Montevideo, Uruguay.
- Doan, M. A., & Toledano, M. (2018). Beyond organization-centred public relations: collective action through a civic crowdfunding campaign.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44(1), 37-46.
- Dresner, S. (2014). *Crowdfunding: A guide to raising capital on the Internet*.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Redwood City,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ladwell, M. (2010). Small change: Why 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weeted. *The New Yorker*, 42-49.
- Hollow, M. (2013). Crowdfunding and civic society in Europe: a profitable partnership? *Open Citizenship* 4(1): 68-72.
- Hsieh, H. C., Hsieh, Y. C., & Vu, T. H. C. (2019). How social movements influence crowdfunding success.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53, 308-320.
- Micheletti, M., Stolle, D., & Berlin, D. (2014). Sustainable citizenship: The role of citizens and consumers as agents of the environmental state. *State and environment: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1, 203-236.
- Mollick, E (2014). The dynamics of crowdfunding: An exploratory study.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9(1): 1-16.
- Monticelli, L., & della Porta, D. (2018). The Successes of Political Consumerism as a Social Movement.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nsumerism*.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liva, N. (2018). Crowdfunding and Civic Crowdfunding: Theoretical Features and Future Prospects. In U. Comite (Eds.), *Public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pp. 115-126). London: IntechOpen.
- Parsloe, S. M., & Holton, A. E. (2018). Boycottautismspeaks: Communicating a counternarrative through cyberactivism and connective ac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1(8), 1116-1133.
- Stiver, A., Barroca, L., Minocha, S., Richards, M., & Roberts, D. (2015). Civic crowdfunding research: 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future agenda. *New media & society*, 17(2), 249-271.
- Sturken, M., & Cartwright, L. (2001). *Practices of looking*.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an Deth, J.W. (2012). Is creative participation good for democracy, in M. Micheletti and A. McFarland (Eds.), *Creative participation: Responsibility-taking in the political world* (pp. 148-172). Boulder, CO: Paradigm.
- Van Dijk, T. A.(1985). Structures of news in the press. *Discourse and communication: New approaches to the analysis of mass media discourse and communication*, 10, 69.
- Vromen, A., Xenos, M. A., & Loader, B. (2015). Young people, social media and connective action: From organisational maintenance to everyday political talk.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18(1), 80-100.
- Wodak, R. (2010). The glocalization of politics in television: Fiction or rea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3(1), 43-62.
- Wenzlaff, K. (2020). Civic Crowdfunding: Four Perspectives on the Definition of Civic Crowdfunding. In *Advances in Crowdfunding* (pp. 441-472). Palgrave Macmillan, Cham.
- Zuckerman, E. (2014). New media, new civics? *Policy & Internet*, 6(2), 151-168.



**Consumption Practices of Taiwan Civic Crowdfunding  
2012-2019**  
Yi-ping Chang\*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f "Civic Crowdfunding" from 2012 to 2019 on zaccac and flyingV websites. The citizen behavior of online donation is a way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s well as well-intended political consumption.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category of "Party-Politics Induced Projects" are the most outstanding in donations of person-time and total-amount, and such requests are mostly related to cross-strait politics, recall voting,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However, civic crowdfunding practices on behalf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progress-oriented political consumption, its discourse seems to relate with the KMT & DPP party competition, or geopolitics. On the other hand, the call-to-action strategy is straightforward to "Taiwan Recognition". Especially most of the fundraisers deliberately downplay the role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set the identity as "Individual Citizens ". Civic crowdfunding seems to be a bottom-up reform force; however,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promotion of fund-raising strategies mainly occurs on issues of self-identity. The donors should not ignore that political ideologies follow by the fundraisers behind the political consumerism.

**Keywords:** connective action, crowdfunding, civic crowdfund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consumerism

---

\*Yi-ping Chang is a PhD student of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110463502@nccu.edu.tw

## 附录一

编号	专案名称	募资平台	捐款总额 (万)	捐款 人次	项目上线期间
1	P.L.U.R.S. 电音反核阵线音乐游行	flying V	2.5830	32	2013/2/21-3/8
2	台湾需要白色的力量	flying V	164.8369	1709	2014/1/1-2/28
3	3/8 全台废核大游行：忍无可忍，不见不散	flying V	23.6566	303	2014/2/6-3/10
4	P.L.U.R.S. 电音反核阵线 2014 音乐游行	flying V	1.5124	26	2014/2/19-3/11
5	【集资广告】台湾，这次妳一定要撑下去	flying V	694.7166	3611	2014/3/24-3/24
6	413. 白色力量守护台湾之夜	flying V	23.1133	99	2014/4/7-4/12
7	太阳，不远 - 太阳花学运影像纪录	flying V	502.6619	3153	2014/4/7-6/5
8	蒲公英计划：318 公民运动札记 / 《反什么服贸》服贸纪事	flying V	24.3321	614	2014/4/7-4/11
9	盛开的向日葵-太阳花学运创作合辑	flying V	75.8825	1479	2014/4/8-4/18
10	学韵：台科大学生太阳花主题曲 EP	flying V	5.1081	50	2014/4/14-6/10
11	太阳花学运合辑，等待破晓	flying V	26.2972	386	2014/4/16-6/12
12	勇气的种子：『谁是太阳花』桌游创作专案	flying V	0.6842	26	2014/4/19-6/7
13	割阑尾计划 Appendectomy Project	flying V	1198.4994	11514	2014/5/3-6/19
14	「守护希望世代」出版计划--关于真相与法律/公民参与 * 集体说故事 * 疗愈抱报	flying V	1.3750	15	2014/5/13-7/13
15	沃草！国会无双 2.0：自己的国会自己督！	flying V	492.3659	3897	2014/5/26-6/11
16	新闻 e 论坛 - Be your eyes & ears	flying V	154.4957	1486	2014/6/3-8/4

台灣公民募資的消費實踐（2012-2019 年）

17	公民摄影守护民主阵线”公民直播记者培训” 全台巡回计划	flying V	4.4902	26	2014/8/5-8/31
18	公民卡拉 OK	flying V	1.0900	12	2014/8/8-10/9
19	巢运：帝宝一坪换公平	flying V	64.6276	469	2014/8/26-10/25
20	「市长，给问吗？」前进大台中！	flying V	78.8305	787	2014/9/2-10/1
21	【青年返乡投票专车计划】青年投票、翻转政治	flying V	93.9817	840	2014/10/31-11/10
22	监票者联盟全国监票活动	flying V	73.9618	754	2014/11/9-12/6
23	全民监政	flying V	0.2100	3	2014/11/13-2015/1/13
24	云林青年返乡投票专车计划	flying V	5.3900	19	2014/11/19-11/28
25	割阑尾高雄区の急征	flying V	31.8422	307	2014/11/29-2015/1/29
26	全民参政：键盘民主网	flying V	3.9910	8	2014/12/1-1/31
27	2015 台独挡泥板助印募资	flying V	36.6451	176	2015/1/7-2/17
28	全面罢免 2：极速罢免	flying V	25.1650	278	2015/1/16-2/23
29	台湾第一届模拟 WHO - 许台湾的医疗与外交，一个美好的未来	flying V	10.7150	34	2015/1/17-2/5
30	228 共生音乐节—青年再起	flying V	27.6818	295	2015/1/27-3/20
31	314 废核游行·台南场【健康家园】逗阵行!	flying V	33.3156	332	2015/2/26-3/13
32	《废核重生》314 南台湾废核大游行	flying V	15.7719	175	2015/2/27-3/13
33	314 核电告别式 - 全国废核大游行	flying V	19.0269	442	2015/3/2-3/13
34	革命议会：拆车轮计划	flying V	70.6526	408	2015/9/15-10/31
35	对国际发声！请支持台湾成为真正的国家！	flying V	88.5518	751	2015/11/14-11/22
36	「海马回补修」两岸监督条例升空计划	flying V	0.3815	11	2015/11/16-12/10
37	全国青少年投票日：告别旧国会，十	flying V	0.5800	10	2015/12/2-2016/1

	八岁要投票!				/20
38	【青年·回投】中部返乡投票专车计划	flying V	77.6006	439	2015/12/22-12/31
39	最后一里路，全民『监票』	flying V	0.4901	28	2016/1/7-1/14
40	正义衙门，打开台湾的正义之门	flying V	0.0200	2	2016/1/10-3/7
41	228 共生音乐节：我们在这里	flying V	22.2251	199	2016/1/13-3/10
42	爱国 T 恤-5/20 邀请您，一起穿出属于台湾人的荣耀	flying V	0.3000	6	2016/2/1-3/30
43	对世界发声！落实转型正义，斗阵喊声建国！	flying V	8.3441	77	2016/3/3-4/30
44	605【顾健康 疼囡仔 反污染】大游行	flying V	15.0262	35	2016/5/13-6/14
45	海滨单车天堂怎么了？集气登头版广告	flyingV	12.1694	134	2016/12/24-2017/1/17
46	219 我在高雄反空污	flyingV	11.7210	105	2017/1/26-2/19
47	228 共生音乐节—欲行 è 路	flyingV	47.8710	281	2017/2/7-3/12
48	第六届共生音乐节—查无此人	flyingV	21.3354	221	2018/1/23-3/30
49	摇滚凯道 365 ——【没有人是局外人】海啸巡回计划	flyingV	83.5543	752	2018/3/30-6/1
50	改变选举生态，就从抱怨开始	flyingV	0.3050	9	2018/5/11-6/11
51	在挪台湾人国籍正名运动	啧啧	322.7431	1461	2018/8/1-9/30
52	减煤好空气—2018 高雄反空污大游行	flyingV	27.4187	158	2018/9/26-11/11
53	台湾不是中华台北！支持东奥正名、帮台湾队加油！	啧啧	105.4457	608	2018/10/19-11/9
54	「喂？我在路上了」——2018 青年民主返乡列车	flyingV	89.3839	2842	2018/10/24-11/9
55	给我好空气   问政新北第七选区	flyingV	2.9400	30	2018/11/2-12/2
56	废话电子报：废死联盟其实很怕死又不想死的真心话	啧啧	0.5895	35	2018/12/18 (订阅制)

台灣公民募資的消費實踐 (2012-2019 年)

57	世卫无国界医疗外交计划-看见台湾医实力!	啧啧	25.8059	136	2019/4/11-5/9
58	一起让更多人关心台湾吧	啧啧	12.7455	372	2019/4/24 (订阅制)
59	拒绝红色媒体、守护台湾民主: 623 凯道集结募资计划	啧啧	190.1614	1320	2019/6/16-6/16
60	wecare 罢韩 30, 高雄 Reset 大游行	啧啧	616.0988	4188	2019/7/19-8/31
61	公民割草行动	啧啧	551.3760	4352	2019/7/19-7/31
62	「没有围墙的监狱: 维吾尔人的今天」特展	flyingV	12.3050	148	2019/8/14-9/28
63	台湾保卫战   拒绝中国渗透, 推动「护台法案」!	啧啧	413.5616	2123	2019/8/20-9/24
64	铜锣湾书店   台湾重启   为自由的灵魂而开	flyingV	597.7350	2901	2019/9/5-11/4
65	终结金权政治, 实现居住正义	啧啧	161.5362	904	2019/10/31-11/3
66	减煤争好气, 呼吸要平权: 2019 高雄反空污大游行	啧啧	20.0700	68	2019/11/1-12/15
67	「回家以后」—— 2020 青年民主返乡列车	flyingV	288.3927	5586	2019/11/24-12/30
68	2020 年政党不分区立委辩论式政见发表会	啧啧	28.7620	268	2019/12/3-2020/1/31
69	每月来点「政」能量   一起用政治知识来改变台湾!	啧啧	1.0722	48	2019/12/4 (订阅制)
70	撑香港   援助与安置计划	啧啧	132.9751	583	2019/12/10-12/15

## 信任媒体就信任政治？ 2003~2018 趋势分析

王教安、王嵩音\*

### 本文引用格式

王教安、王嵩音（2021）。〈信任媒体就信任政治？2003~2018 趋势分析〉，  
《传播、文化与政治》，14:87-113。

---

投稿日期：2021 年 9 月 10 日；通过日期：2021 年 11 月 20 日。

\* 作者王教安为台湾中正大学电讯传播研究所硕士；王嵩音为台湾中正大学传播系暨电讯传播研究所专任教授，e-mail: telsiw@ccu.edu.tw。

## 《摘要》

媒体信任和政治信任都是维持国家社会正常运作的重要关键。然而国内外甚少研究探讨两者之关联。本研究运用 2003 年和 2008 年「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以及 2015 年与 2018 年「台湾传播调查数据库」共计四年的全国性资料观察两者之间关联的长期趋势。媒体信任是以报纸、电视、杂志、广播与网络五种媒体之绝对可信度测量，而政治信任则是以受访者是否同意「政府会为全民谋求最大的福利」和「政府首长在媒体上说的话是可相信的」两个陈述句加总测量。研究结果显示各媒体之可信度逐年下滑，且都仅在及格边缘。数据也显示民众对于政治信任的态度倾向不信任。四年中有三年的电视可信度与政治信任之间呈现正向关联，较符合「良性循环说」的观点。而广播可信度在 2015 年时，与政治信任呈现负向关联，则符合「媒介抑郁论」的观点。

**关键词：**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台湾传播调查数据库、政治信任、媒体可信度、趋势分析

## 壹、前言

Rudolph & Evans (2005) 认为政治信任是一种对政府的情感，可以被概括为人民对政府的施政满意度。信任的建立对于国家机构来说，是最首要的事情。而大众媒体则是政治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一方面扮演着民众与政府的桥梁，另一方面也具有第四权责任，发挥监督政府的功用。因此，对于民众而言，无论对于媒体或是政府的信任都是维持国家社会正常运作的重要关键。

根据 2017 年中华民国群我伦理促进会所公布的最新资料如表一，台湾民众对「新闻记者」这行业的信任感竟只有 29%，相较于 2016 年的 34.9%，下滑了近 6%，成为当年「最不受民众信任」行业第一名，也透露出媒体目前的危机。<sup>1</sup>

表一： 2015 ~ 2017 年台湾地区社会信任调查名次表

	2008	2013	2015	2016	2017
政府官员	11/13	14/14	14/14	7/10	9/10
新闻记者	12/13	12/14	12/14	9/10	10/10

数据源：本研究整理

上表除了显示新闻记者是目前台湾民众不信任的对象外，也透露出另一个不受民众所信任的对象，那就是政府官员。其排名几乎皆是垫底的，与新闻记者轮流为最后一名。

台湾近二十年来无论在政治以及社会都历经许多的变迁情况，包括在政治上已完成三次政党轮替，逐步迈向民主政治之途。然而宪政体制改革、统独意识冲突、社会贫富不均以及贪污腐化等问题均影响政治的顺利发展（王业立编，2017）。期间包括 2006 年的「反贪污红衫军」事件以及 2014 年「太

---

<sup>1</sup>中華民國群我倫理促進會 <http://www.humanrightwatch.cc/?p=24064#more-24064>



阳花学运」都对台湾的政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台湾历年政治大事纪详见附录一。

至于在媒体产业发展方面，台湾新闻媒体长期以来受到学界与社会大众的批判。自从有线电视日益普及之后，尤其是电视媒体进入恶性竞争时代，导致媒体内容竞逐庸俗而新闻内容八卦化。期间 2005 年发生台湾假新闻始祖之「脚尾饭」事件，2012 年则接续发生「旺中案」以及「反媒体垄断」事件，引发社会舆论。台湾历年媒体大事纪详见附录二。

上述或许可以部份解释民众于政府官员和新闻记者的态度，也同时引发本研究试图探讨媒体信任和政治信任的变迁情形与两者之间的关联。有关媒体信任与政治信任的讨论至少有二派的说法。「媒介抑郁论」认为媒体多报导政治的黑暗面会降低民众的政治信任。而「良性循环说」则认为无论媒体是正面或负面报导政治，都会增进民众对于政治的参与以及政治信任感。而纵观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可以发现，政治信任感与媒体可信度经常被作为两个独立的变项来探讨。政治学者经常研究政治信任，并且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去观察个人因素与结构因素对于政治信任的影响。而媒体可信度的概念则被广泛运用在传播领域当中，观察新闻内容对媒体可信度所产生的影响，鲜少研究探讨媒体信任与政治信任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此本研究希望能够开启媒体可信度与政治信任感之间的研究契机，并试图以跨年代资料分析两者关联之长期变迁趋势。

## 贰、文献探讨

### 一、媒体可信度 (media credibility)

传播学界对于媒体信任多以「媒体可信度」做为评估。学者们将可信度 (credibility) 视为是一种阅听人对于讯息传递者相信程度的评价，其评估并非针对讯息本身的价值 (actually quality) 来评估，而是针对讯息来源的「可靠性」(trustworthiness) 或「专业性」(expertise)，来进行主观性的认定。若是要将可信度做更为精简的定义，可称其为阅听人对讯息的「认知可信度」

(perceived credibility; Freeman & Spyridakis, 2004; Gaziano & McGrath, 1986; Hovland & Weiss, 1951)。现今，随着网络迅速发展以及社群网站的兴起，造成讯息的生产方式出现改变，使用者自身可自行生产内容并且传递给任何人。这样的模式使得学者们开始关心这些使用者产制内容 (user-generated content, UGC) 的真实性，此因素的出现也驱使可信度的定义产生改变，更将之后的研究焦点转为关注讯息本身的价值 (Li & Suh, 2015)。

过往有关媒体可信度的测量大致可分为「相对可信度」与「绝对可信度」两种。由于两者各自都有缺失，因此同时测量可以弥补两者之间的不足。相对可信度是指，同一件新闻事件，在不同类型的媒体报导上产生矛盾、不一致时，阅听众对各类型媒体所做的可信度评估 (Schweiger, 2000)。整理过去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在测量相对可信度时，研究者会直接向受试者询问：「如果您发现报纸、杂志、广播或电视对同一件事情报导不同时，请问您会相信哪一种媒体？」

最早应用相对可信度来进行测量的是 Roper 机构。自 1950 年代起，Roper 开始为电视信息局调查美国民众对各类型媒体的可信度差异来进行比较，即是采用此方法。透过询问美国民众：「当不同类型的媒体报导同一事件，报导产生差异时，你会相信哪一种媒体？」。历年来的研究结果均发现电视的可信度已超越报纸可信度，成为美国最被民众信赖的媒体类型，广播位居第三，杂志则是排名最后。也因为这种测量方式最为简易，且定义最为明确，因此最常被学术界拿来使用 (罗文辉、林文琪、牛隆光、蔡卓芬，2003)。

由于，Roper 机构是美国史上最久且最大规模的长期调查机构，再加上相对可信度操作上较为简单易懂，因此也成为往后媒体可信度研究者主要参照的范本，但这样的问法却也隐藏着不少缺失。有学者认为，这样的询问方式，仅只能针对事情报导不同时做出比较，无法反映在报导相同时，受试者较相信哪种媒体 (Cater & Greenberg, 1965)。

Greenberg & Roloff (1974) 也批评 Roper 机构并未提供认知参考点，会使得受访者对题意产生误解，像是对电视的认知可能为全国性电视网，对报纸却是地方性报纸，这样的比较方式，会使得结果产生严重的误差。

另外，相对可信度的测量尺度毕竟是一种顺序层次，除了无法真正了解阅听人对各类型媒体的相信程度，只能了解内心中的排名之外，也无法知道各类型媒体之间的差距。因此，有许多学者为了改善此问题，于是发展出绝对可信度的度量方式，以补足相对可信度的缺失。

Cater & Greenberg (1965) 为了弥补相对可信度的缺失，因此修正了 Roper 机构的相对可信度问法，提出了新的测量方式——绝对可信度。绝对可信度是指，研究者直接让阅听人对不同类型的媒体所呈现的新闻内容可信程度，直接进行评分 (Schweiger, 2000)。整理过去相关文献，发现测量绝对可信度时，研究者通常会直接向受试者询问：「请问您对报纸、杂志、广播或电视的新闻报导，相信程度从 1 到 10 分，您会给几分？」(徐美苓, 2015)。这样的询问方式，除了能了解阅听人对媒体的排名之外，也能了解各类型媒体间的实际差距。这样的研究结果也证实，采用不同的问法，会有不同的结果出现，像是若以 Roper 机构的问法，得到的结果会是相信电视的人比相信报纸的人多了一倍；但改采绝对可信度的问法，就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差距有缩小，分别为 82% 相信电视，68% 相信报纸。

基于上述，本研究采用「绝对可信度」，进行趋势分析，探讨以下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 1：台湾民众对于报纸、电视、杂志、广播、网络可信度的趋势为何？

## 二、政治信任 (political trust)

政治信任是民主政治的重要资源，也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愿意诚实付税以及接受政府政策的基础 (Hertherington, 2005)。在定义上，政治信任是人民对于政府和政治机构的信任态度。公民依据心中的期望对于政治体系进行主观的评价。换言之，政治信任是公民对于政治体系的评价，也就是认为政府即使在不刻意监督的情况下也能正确施政。

在民主国家，政治信任是维持政府正常运作的重要基础。虽然学界对于政治信任要达到何种程度才能使得政权正常运作仍具争议。但是较一致的共识是低度的政治信任会造成政治体系的不稳定 (Parry, 1976)。

政治学界依据制度理论观点认为政治信任会受政治环境所影响，主要因政府绩效成果而生成 (Norris, 2000)。意即政治信任是基于民众主观地对政府绩效表现所给予的评价，若政治绩效良好则能增加信任，反之则对政府产生怀疑与不信任，而这样的信任感很容易受到政府短期表现而产生改变。像是政府在施政的表现上不如预期，或者是民众对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评价不高，又或者是政府的操守出现问题，如贪污、丑闻等，都会使民众对政治产生不信任。

Feldman (1983) 认为美国民众的政治信任低落，主要是因为民众对于现任民选官员以及制度的不满所致。其中，民众不满国会，是导致政治信任低落的主要原因。Hetherington (1998) 根据美国当时的社会环境，提出影响政治信任感的因素包含：国内、外政策满意度、政府效能的认知、世界观、新闻媒体的报导与评价。

国内研究方面，盛治仁 (2003) 之研究指出，台湾先前历经政治制度的转变，像总统直选、国会改选与政党轮替等，使得台湾民众对于政治信任感趋向于不稳定以及退步的趋势。陈陆辉 (2006) 的研究结果则发现受访者对于经济情况的回溯性评估，也是会影响政治信任的关键。若受访者相对于先前，经济状况有改善，则政治信任感会提高；反之，若相对于先前，经济状况倒退，则政治信任感会降低。郑夙芬、陈陆辉、刘嘉薇 (2008) 的研究指出，政府的绩效表现，会影响民众对于政治的信任感。譬如民众对于政府举办的选举、公民投票过程以及对于正副元首枪击事件处理的满意度上，皆会对民众政治信任感产生显著地影响。

至于政治信任测量的对象，学界多根据 Easton (1965) 所提出的政治系统论检视民众对于三种不同政治对象的信任，分别为政治社群 (political community)、政治体制 (regime) 与执政者 (authorities)。

政治社群是以政治分工而形成的一群人，其成员间透过多元的政治关系集结在一起，一同追求该体系的政治目标。简言之，即大众对于其所属政治

群体、疆界的认定与态度倾向，如国家荣誉感、国家认同等，属于长期、稳定的偏好态度。在操作上，其测量题目大多是询问：「是否以国家为荣？」、「是否愿为国家而战？」等。

政治体制是指宪法秩序，包含价值与规范。其中价值表示人民日常生活与行为的基本原则；规范则是人民可接受的程序与行为的界线。简单来说，即是良好的政治体制能让社会阶级有良好的流动，也能使人民之间的关系较为和谐，遇到纠纷时，司法体制能给予公正的判决。在操作上，其测量题目大多是询问：「是否认为民主政治是最好的政体？」。

执政者是指能制定或是执行决策，承担政治后果且具有权力的人。也就是说，执政者是人民对政府执政结果的评估，包括政治制定的能力、道德操守、效率、政策推动的正确性及是否能谋求一般民众的福祉等。人民会检视政府施政的效率面与公开面，包含是否是出自于私利或是别有用心，都会是影响民众对政治的信心程度。此层面也反映出政治信任除了是民众对于政府的评价之外，也包含人民对于政府情感上的喜恶，是属于短期和易变的支持，与政治体制与政治社群的支持相反（Cappella & Jamieson, 1997；陈陆辉，2003）。在操作上，其测量题目大多是询问：「是否相信政府首长说的话？」、「政府是否会为全民谋求最大的福利？」等。

综合上述，本研究仅针对执政者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分析台湾民众长期对于执政者的政治信任分布情形，因此本研究第二项研究问题如下：

研究问题 2：台湾民众政治信任的趋势为何？

### 三、政治信任与媒体信任

Dunleavy & O'Leary (1987) 认为民众对于政治的接触与参与，大多数皆来自于传播媒介的呈现，并非直接接触政治人物或政府官员，因此传播媒介对于政治信息的传递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影响阅听人对于政治的态度。

有关媒体信任与政治信任的关联至少有二派的学说。有一派学者认为大众媒体会对政治态度形成负面影响，并将此影响定义为「媒介抑郁论」(media malaise theory)。此派学者认为媒体对于政治有越来越多的负面报导时，会使

民众内心产生负面的印象，对于政治感到失望，觉得政治是黑暗的，进而对政治失去信心 (Robinson, 1976)。O'Brien (2009) 也发现媒体长期对于政策议题做负面的报导，会降低民众对政府官员的信任感。

但是另有一派学者认为，媒体的报导方式对政治信任会产生正面的影响，他们将此定义为「良性循环论」(virtuous circle theory)。此派学者认为媒体对于政治议题的呈现不论好坏，都能激发出民众对于政治的参与。当媒体报导负面时，会使得民众更愿意投入监督政府的角色，希望实践自己的公民权，让政府不肆意妄为；当媒体报导正面时，会使得民众对于政治产生期待，进而提高其政治涉入感，甚至直接参与政治 (Norris, 2000)。

Tsfati & Cohen (2005) 指出民众对于媒体的信任程度不仅影响其媒体使用行为民众，也是影响民主制度信任的重要因素。有研究发现美国民众长期以来对于新闻媒体的不信任是造成美国政治系统两极化的主要促因 (Ladd, 2012)。

Ariely (2015) 藉由 32 个欧洲国家的调查数据，并且运用多元比较法进行跨国比较，探讨各国民众对于报业的信任感以及政治信任感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受到不同的媒体环境所影响。研究发现报业的信任感与政治信任感呈现正相关，但相关程度会因每个国家的媒体环境情况有所差异。该研究发现新闻媒体越专业和自主的国家，其媒体信任和政治信任的关联越弱；而两者关系越强的国家通常是媒体与政党关系密切之平行结构 (press/party parallelism)。因此媒体信任和政治信任关系太紧密未必是好事，反而可能限制媒体监督政府的作为。

国内研究方面，刘嘉薇、黄纪 (2010) 利用二手数据分析，透过陈义彦与陈陆辉于 2004 至 2006 年所做的「我国大学生政治价值与态度的持续与变迁-大学四年社会化过程之研究」全国性调查，试图从媒介政治信息的角度，讨论政治信任感的持续与变迁，另外也加入社会结构因素、政党认同因素做探讨。研究发现大学生对媒介公正性评估越高，政治信任感也会随之提高，符合「良性循环论」的观点。而在政党认同因素上，发现偏绿支持者，接触频率高且认为媒介公正时，政治信任感比接触频率低者更低，则较为符合「媒介抑郁论」的观点。

上述研究仅能获得关于台湾大学生对于政治信任与媒体公正性的观察。而且媒体公正性仅为媒体信任概念的其中一个面向，并无法代表整个媒体信任的概念。因此，本研究运用全国性调查数据，以各个媒体的可信度作为自变项，政治信任为依变项，探究两者之关联。本研究提出第三个研究问题如下：

研究问题 3：在不同的年度媒体可信度和政治信任关联为何？

## 参、研究方法

### 一、调查资料

有鉴于台湾近二十年来，整个社会变迁十分巨大，在政治与传播层面产生何种变迁？各层面变迁彼此之间的关系为何？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重要议题。因此本研究将采取纵贯性资料分析，期望能提供有价值的科学实证纪录。

本研究采用由中研院所主持的五年一次「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2003年和2008年调查，以及2015年与2018年由科技部所进行的「台湾传播调查数据库」全国性调查，共计四年的全国性资料做分析。这四年的调查样本抽样方式是以台湾地区年满十八岁及以上之中华民国国民为研究母体，并以台湾地区户籍资料文件为抽样名册（sampling frame），利用分层等机率三阶段抽样法（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PPS）抽出受访对象。实际抽样执行程序是依据人口特性、商业发展、公共设施、财政状况、地理环境等相关指标，将台湾各乡镇分为七层。在抽样时，先计算各分层所有乡镇之人口数，依其人口数比例来分配各分层欲抽出之人数，并在各分层中依人口数多寡而抽取一定数目的乡镇市区；其后，在每一乡镇市区中，再依人口数之多寡依照等距抽样法（systematic sampling）有系统地抽取一定数目的村里；最后，在前述中选村里中再同样依等距抽样法抽取一定数目的受访个案。四次调查的基本资料详见下表。

表二： 四次调查基本资料

年份	受访年龄	样本数	完访率	调查期间
2003	18 岁以上	2,161	54.0%	2003/08/10~2003/10/24
2008	18 岁以上	1,980	43.0%	2008/07/20~2008/08/24
2015	18 岁以上	2,002	29.8%	2015/11/14~2016/01/15
2018	18 岁以上	2,028	28.4%	2018/07/04~2018/10/11

## 二、变数测量

### (一) 媒体绝对可信度

绝对可信度是指，研究者直接让阅听人对不同类型的媒体所呈现的新闻内容可信程度进行评分 (Schweiger, 2000)。因此在问卷中，请受访者各别针对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与网络媒体所报导新闻的整体表现给予评价，从 0 分代表最不可信，100 分代表最可信。

### (二) 政治信任

本研究分析台湾地区民众近几年对于执政者的政治信任分布情形。本研究将政治信任定义为政府会为全民谋求最大的福利以及相信政府首长在媒体上的发言，询问受访者是否同意两个陈述句，并加总后成为「政治信任」。各年度政治信任指标之 Cronbach's  $\alpha$  信度值依序为 .65 (2003 年)、.74(2008 年)、.70 (2015 年)、.71 (2018 年)，均达到可信的程度。

### (三) 控制变项

本研究整理过去研究，发现影响政治信任的因素如下：

#### 1. 人口学变项

从文化理论角度来看，政治信任之所以会产生变化，是因为人会随着人生成长，各种经验的累积，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价值体系与政治态度，因



此会对政治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Mishler & Rose, 1997)。陈忆宁、罗文辉 (2006) 的研究结果发现, 性别与年龄皆对政治信任产生影响。在性别方面, 男性相对于女性而言, 政治信任度较高; 在年龄方面, 年龄越长, 信任感越强烈。郑夙芬、陈陆辉、刘嘉薇 (2008) 的研究则指出, 教育程度是影响政治信任的因素, 小学教育程度比大学教育程度对政治信任的程度较高。

## 2.政党倾向

陈陆辉 (2006) 以及郑夙芬、陈陆辉、刘嘉薇 (2008) 的研究皆发现党派立场会对政治信任态度产生显著影响力。当执政党与自己的党派立场相同时, 则较信任政治; 若执政党与自己党派立场不同时, 则倾向不信任。

综合上述, 本研究将受访者之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政党倾向作为控制变项, 探讨媒体可信度对于政治信任的影响。

# 肆、资料分析

## 一、各媒体可信度趋势分析

从表三可以发现不论是在哪一年的调查, 若以 60 分为信任基准的话, 各媒体多呈现在及格边缘, 约 55~65 分的区间之中, 显示出台湾民众对于媒体的信任感并不高。而且整体媒体可信度有逐年降低的趋势。至于比较各媒体可信度, 皆以电视的可信度高于其他媒体。四年调查各媒体总平均数依高低顺序分别为电视、报纸、广播、网络、杂志。

若针对各媒体本身的逐年比较, 可以发现报纸在 2015 年时达到高峰 64.9 分, 其余三次的调查中, 皆呈现上下震荡的情况, 且都处及格边缘。

在电视方面, 可以发现电视可信度有逐年下降的趋势, 从 2003 年 70.9 分为最高点, 自该年起电视的评价便一路下滑, 更在 2018 年跌落谷底。

网络是在 2003 年调查才开始测量。其表现在台湾民众心中是不及格的, 仅有 53.6 分, 低于基本分数, 但在后续两次的测量中表现较佳, 2008 年并

超过报纸成为仅次于电视的媒体，分别为 2008 年的 66 分、2015 年 60.3 分。2018 年则下滑至不及格的分数。

杂志如同网络一样，也是在 2003 年起才开始测量。杂志表现不理想，2003 年 54.5 以及 2008 年的 55.8 分，皆是低于及格分数的，但到了 2015 年时突破及格线达到 62.1 分，但是 2018 年又降至最低的 54.4 分。

最后在广播的部分，在 2003 年最初的测量有 61 分的表现，但到了 2008 年时为 59 分，低于及格分数。2015 年分数提高至 63.7 分，但于 2018 年又跌到不及格的 58.7 分。

综合而言，五种媒体的可信度有逐年下滑的趋势。而电视在四次调查总平均分数居各媒体之冠。

表三：各媒体可信度统计表

年份/媒体	报纸	电视	杂志	广播	网络	平均值
2003	63.6	70.9	54.5	61.0	53.6	60.7
2008	61.2	67.0	55.8	59.0	66.0	61.8
2015	64.9	65.9	62.1	63.7	60.3	63.4
2018	62.3	63.8	54.4	58.7	59.8	59.8
平均值	63.0	66.9	56.7	60.6	59.9	61.4

注：分数为 0~100 分，60 分为可信任基准。分数越高代表可信度越高。

## 二、政治信任度趋势分析

首先从「政府会为全民谋求最大福利」的题项观察，可以发现在这四次的调查当中，台湾民众皆是倾向不同意的态度，并且在 2008 年时达到了最低的 2.70。2015 年时，稍微提高与 2003 年同样的水平，回升到 2.81，而于 2018 年达最高程度之 2.83。若从「政府首长在媒体上所说的话是可以相信的」的题项观察，台湾民众在这四次的调查中依然是呈现不信任的态度，而且逐

年下滑，从 2003 年的 2.76，2008 年的 2.51，到 2015 年的 2.36，最后到 2018 年仅剩 2.30（详见表四）。

整体而言，台湾民众在政治信任的态度上，均倾向不信任，且逐年下降，从 2003 年的 2.82，到 2008 年的 2.61，2015 年的 2.59，最后到 2018 年的 2.57。显然台湾民众长期以来对于政府呈现不信任的态度。

表四： 政治信任度之趋势

年度	2003	2008	2015	2018
政府会为全民谋求最大的福利	(M=2.81, SD=.87)	(M=2.70, SD=.99)	(M=2.81, SD=1.09)	(M=2.83, SD=1.17)
政府首长在媒体上说的话是可以相信的	(M=2.76, SD=.85)	(M=2.52, SD=.90)	(M=2.36, SD=.91)	(M=2.30, SD=1.01)
政治信任	(M=2.82, SD=.75)	(M=2.61, SD=.84)	(M=2.58, SD=.88)	(M=2.57, SD=.97)

注：「政府首长在媒体上说的话是可以相信的」之题项在 2003 年测量时采用四点量表，为求数值统一以加权方式处理。

### 三、媒体可信度与政治信任关联分析

本研究运用阶层回归统计分析四个年度媒体可信度与政治信任的关联。第一阶层输入人口学变项，包括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第二阶层输入政党倾向。第三阶层则输入五种媒体的可信度。

表五显示在 2003 年时，第一阶层中能显著预测政治信任的人口学变项为教育程度 ( $\beta=-.10$ ,  $p < .001$ )，即教育程度越低，对政治信任也就越高。阶层二加入在政党倾向，可以发现年龄 ( $\beta=.07$ ,  $p < .05$ ) 和教育程度 ( $\beta=-.06$ ,  $p < .05$ ) 具有显著预测力，而政党倾向为泛蓝 ( $\beta=-.15$ ,  $p < .001$ ) 与泛绿 ( $\beta=.15$ ,

$p < .001$ ) 皆能对政治信任感产生显著的关联。政党倾向越偏向蓝者, 越不信任政治; 而在政党倾向偏向越倾向绿者, 越信任政治。第三阶层加入媒体可信度, 年龄 ( $\beta = .09, p < .01$ )、教育程度 ( $\beta = -.08, p < .01$ ) 以及泛蓝倾向 ( $\beta = -.17, p < .001$ ) 泛绿倾向 ( $\beta = .15, p < .001$ ) 依然可以显著预测政治信任。媒体可信度中只有电视可信度 ( $\beta = .07, p < .05$ ) 可以显著预测政治信任。民众对于电视的可信度越高, 就越相信政治。

在 2008 年时, 阶层一中人口学变项上能显著预测政治信任的变项为年龄 ( $\beta = .16, p < .001$ ), 即代表年龄越长, 对政治信任感的程度也就越高。阶层二加入政党倾向后, 年龄 ( $\beta = .12, p < .001$ ) 依然可以显著预测政治信任而在政党认同上, 泛蓝 ( $\beta = .19, p < .001$ ) 与泛绿 ( $\beta = -.08, p < .01$ ) 政党倾向皆能有效预测政治信任, 即越偏向泛蓝者对政治的信任程度越高, 而越倾向泛绿者, 对政治信任的程度越低。阶层三加入五种媒体可信度, 年龄 ( $\beta = .13, p < .001$ )、泛蓝倾向 ( $\beta = .15, p < .001$ ) 以及泛绿倾向 ( $\beta = -.09, p < .01$ ) 依然具有显著预测力。在五种媒体可信度中, 报纸可信度 ( $\beta = .14, p < .001$ ) 以及广播可信度 ( $\beta = .08, p < .05$ ) 显著地正向预测政治信任。民众越相信报纸以及广播两种媒体, 就越信任政治。

在 2015 年时, 阶层一中没有任何人口学变项可以显著预测政治信任。阶层二加入政党倾向时, 依然没有任何变项可以显著预测政治信任。阶层三加入五种媒体可信度, 电视可信度 ( $\beta = .24, p < .05$ ) 和网络可信度 ( $\beta = .16, p < .05$ ) 皆可以正向预测政治信任, 但是广播可信度 ( $\beta = -.24, p < .01$ ) 却是负向预测政治信任。这显示民众对于电视和网络的可信度越高, 政治信任感越高: 对于广播的可信度越高, 则政治信任感越低。

在 2018 年时, 阶层一中人口学变项中只有教育程度 ( $\beta = -.08, p < .05$ ) 能显著预测政治信任度, 意即教育程度越低, 政治信任度越高。阶层二加入党倾向后则没有任何变项可以显著预测政治信任。阶层三加入五种媒体可信度则仅有电视可信度 ( $\beta = -.18, p < .001$ ) 可以非常显著地预测政治信任。民众对于电视的可信度越高, 其政治信任度就越高。

综合上述, 在人口学变项中, 年龄在 2003 以及 2008 两个年度皆能正向显著预测政治信任, 因此年龄越长, 政治信任程度越高。而教育程度则仅在

2003 年负向预测政治信任，意即教育程度越低越信任政治。此一结果符合郑夙芬、陈陆辉、刘嘉薇（2008）之发现。可能的推论是教育程度较高者对于政治事务的认识较深。对政府的表现亦多持批评态度，呈现较不信任的态度（王中天，2010）。

至于在政党倾向方面，2003 年时由民进党执政，在政党倾向上就可以发现，泛蓝倾向者对政治不信任，而泛绿倾向者对政治较信任。但到了 2008 年，台湾社会经历第二次政党轮替，改由国民党执政，此时泛蓝倾向者转向对政治感到信任，而泛绿倾向者则在 2008 年持不信任的态度。因此当执政党与自己偏好的政党相符合时，政治信任感会越高，反之当执政党与自己偏好的政党不符合时，则越不信任政治。政党倾向在 2015 年与 2018 两个年度均不具有预测力。

综合四年的调查结果，可以发现报纸可信度仅有在 2008 年时具有显著预测力，且与政治信任呈正相关。在广播可信度方面，在 2008 年与 2015 年均能显著预测政治信任，在 2008 年时呈现正相关，但是在 2015 年却呈现负相关。电视可信度除了 2008 年以外皆能显著预测政治信任，且呈现正相关。

表五： 政治信任之回归分析

---

政治信任

---

年度	2003	2008	2015	2018
阶层一：人口				
学变项				
性别	.02	.06	.06	-.01
年龄	.09**	.13***	.12	-.01
教育程度	-.08**	.00	-.01	-.07
R <sup>2</sup>	.02	.02	.02	.01
阶层二：政党				
倾向				
泛蓝	-.17***	.15***	.10	-.05
泛绿	.15***	-.09**	-.00	-.01
Incremental	.06	.05	.01	.00
R <sup>2</sup>				
阶层三：媒体				
可信度				
报纸可信度	.07	.14**	.08	-.08
电视可信度	.07*	.07	.24***	.18***
杂志可信度	.04	.00	-.01	.03
广播可信度	-.01	.08*	-.24***	-.05
网络可信度	.01	.04	.16*	.07
Incremental	.02	.07	.13	.03
R <sup>2</sup>				
Total R <sup>2</sup>	.10	.14	.16	.04

注：表内数值为最后阶层标准化回归系数值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 伍、结论

本研究透过四次调查资料的分析，长期观察媒体可信度的变迁趋势。分析结果显示各媒体之可信度逐年下滑，而目前都在及格的边缘。显然台湾民众对于媒体的信任度有待加强，也代表台湾媒体正面临信任的危机。

而这样的结果也符合相关文献所显示，大多数台湾民众认为媒体新闻内容缺乏专业性、记者问的问题没深度，且大多皆以娱乐八卦与政治口水为主。不但从媒体无法获取实用信息，而观看新闻演变成是为了打发时间和娱乐消遣之用。新闻媒体已缺乏应有的功能性，并丧失扮演第四权的角色（林照真，2009；陈忆宁，2011）。

媒体可信度的低落反应台湾媒体生态的变迁情形。在报纸媒体方面，2001年之后「壹周刊」与「苹果日报」陆续成功来台发行，并以夸张的报导手法与吸睛的图片，吸引阅听人的目光，也直接影响台湾报纸新闻的报导方式，使得信息娱乐化，开始朝向感官主义的发展（王泰俐，2004）。自此之后在强调订阅读率的情况下，各报新闻标题耸动、错误报导与捏造新闻的情形也明显增加。除此之外，新闻集团逐渐被财团整并，如旺旺集团入主中时、中天与中视；宏达电入主 TVBS 电视台等，皆对新闻产制产生冲击，违反学者提到的媒体应与政治与财团脱钩，以维持新闻自主的原则。陈炳宏（2009）指出媒体集团化与产权集中化将会影响媒体呈现多元性的内容，且会避重就轻，隐瞒部分的事实。上述现象极可能直接影响民众对于媒体可信度的评价。

综观各媒体可以发现电视可信度长期以来均位居龙头的宝座。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媒体的可信度时有高低，却只有电视可信度一路下滑。自 1993 年起，台湾通过有线电视法后，电视台的出现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导致诸多电视台分食固定的广告量。为了能生存下去现今的电视媒体越来越趋近于商业化。此外，电视媒体为了满足用户对于娱乐的需求，因此会对于新闻报导夸张化或戏剧化来吸引眼球。根据国家通讯委员会申诉广电内容案件数统计，近几年最高的类型是电视新闻报导内容不实或不公。<sup>2</sup>

至于在网络可信度方面，数据显示网络可信度在 2003 之调查中敬陪末座，但随即于 2008 年调查中跃升为可信度第二名，仅次于电视可信度。到

---

<sup>2</sup>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媒體申訴案件統計資訊，參見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aspx?site\\_content\\_sn=1153&is\\_history=0](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aspx?site_content_sn=1153&is_history=0)

了 2018 年，网络可信度也超越广播与杂志两个媒体，排名第三。这显示网络虽然已成为民众相当依赖与使用频繁的媒体，但是透过网络所获的信息却令人难以相信。尤其是近年来假新闻在网络上极为泛滥，充斥在各大社群媒体，也影响了网络的可信度。

在台湾民众政治信任方面，数据显示民众对于政治信任的态度倾向于不信任。这与先前的研究结果相符合（林聪吉，2012；陈陆辉、陈映男，2012）。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政府首长 in 媒体上所说的话是可以相信的」自 2003 年到 2008 时下降幅度最大，显示出台湾政治领袖在人民心中是不被信任的。

在 2006 年时，第一家庭女婿赵建铭因涉嫌台湾土地开发公司内线交易案，导致台湾民众对第一家庭的印象大为反感，亦使得陈水扁的形象大受打击。不久之后，前总统陈水扁旋即爆发「国务机要费案」、「龙潭购地案」以及「101 买官案」，涉嫌贪污洗钱以及伪造文书与多项罪名，第一家庭的负面形象又再度浮上台面。2008 年林益世担任行政院秘书长期间，因协助中钢下游厂商续约为由，坦承向该公司索贿遭到起诉。同年，苏治芬因涉嫌收贿，遭检察官起诉。在短短的两年期间，爆发出一连串的弊案，导致台湾当时陷入政治黑暗期。

这些弊案与贪污的情形，皆影响民众对于政治人物形象的评价。当这些形象差的政治人物在媒体上公开发表时，民众也就不会愿意相信他们所说的话。

至于影响政治信任的因素方面，在 2003 年时，政党倾向越蓝者，越不信任政治，而政党倾向绿者，则越相信政治。主要因为当时是由民进党执政，因此政党倾向偏向泛蓝者较不信任民进党政府，反而是政党倾向偏向泛绿者较为信任。在 2008 年时，政党倾向为泛蓝者，越能有效预测政治信任的态度。2008 年台湾政治面临第二次政党轮替，历经民进党政府八年执政后，改由国民党执政，泛蓝支持者对于国民党的执政充满着期待，因此政党倾向越倾向泛蓝者对于政治信任的态度就会越高。另外，在深蓝支持者中，普遍年龄较长，因此年龄也成为显著能预测政治信任的变项。此结果符合陈陆辉（2003）提及政治信任除了是民众对于政府的评价之外，也包含人民对政府情感上的喜恶。若执政党是民众所支持的政党时，政治信任程度就会较高或



不明显。反之，执政党并非民众所支持的政党时，政治信任就会较低。不过受访民众之政党倾向在 2015 年以及 2018 年不再影响政治信任程度。这可能因为台湾已历经二次政党轮替成为常态，政党倾向不再对于政治信任产生影响。

在媒体可信度和政治信任之关联上，本研究发现在 2003 年时，仅有电视可信度能显著预测政治信任，即受访者越觉得电视可信度高，越觉得政治是值得被信任的。在 2008 年，报纸以及广播可信度能显著预测政治信任，表示当报纸或广播可信度越高，政治信任程度越高。在 2015 年时，广播和电视可信度成为政治信任的显著预测变项，但两个呈现相反的发展。电视可信度越高，越信任政治；但广播可信度越高，越不信任政治。最后在 2018 年时，则仅有电视可信度能显著预测政治信任。

综观四次调查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媒体信任与政治信任之间的正向关系与 Ariely (2015) 所做出的研究结果一致，也较为符合「良性循环说」的观点。唯一不同的是，广播的可信度在 2015 年时，与政治信任呈现负向关联。

这或许与台湾地下电台的现象有关。台湾在国民党长期执政时代，电子媒体掌握在党政军手中，未见频道开放。因而自 1990 年代起地下电台纷立，节目大多以批评时政为主。地下电台在各种选举期间，尤其是扮演政治竞选的工具（陈清河，2004）。譬如 2004 年三一九枪击案，地下电台不断宣称是大陆所为。而 2006 年黄俊英走路工事件，地下电台则运用选举语言催票（诸葛俊、黄于恬、汪明生，2012）。在 2015 年调查时，正值总统大选前一个月。当时地下电台普遍对执政之国民党不满，且持续发挥其针贬时事的功能，批判执政党的亲中、卖台，这可能使得阅听人在收听地下电台的广播之后，会降低对政府的信任感。此种现象较符合「媒介抑郁论」的观点。

综合而言，本研究之发现提供有关台湾媒体评价与民主政治发展的观察与深思。本研究呼应 Ariely (2015) 的研究，民主社会中的公民倾向对于政治较不信任，而且媒体信任和政治信任的关联不高。一个社会的新闻媒体越不受到政治和经济因素的限制，越能朝专业的方向尽其监督政府的角色与功能。台湾电视媒体长期以来与政治信任的关联较其他媒体密切，显示民众越

相信电视则政治信任程度越高。而电视也是所有媒体中可信用度最高者。因此，若是电视媒体能透过各种方式进行专业精进与改革，促使其成为民众获得精确与充分政治信息之管道，进而能对于政治体系进行理性评价，应该有助于台湾民主政治的健全发展。

最后，本研究限于二手数据库之跨年代分析，各项变量之测量方法受到限制。首先在媒体可信度的测量方面，本文为了跨年代之比较仅采取绝对可信度的测量而有所不足。此外政治信任包含的面向很多元，完整的政治信任测量指标还包括对于各种政治机构的信任度评量。然而本研究却仅能针对二个项目之加总作为测量，因为只有这四年的调查包含一致性的政治信任测量，因此难以掌握政治信任的全貌。建议未来研究能够针对两项概念进行更细致的测量与分析。

## 参考书目

- 〈台湾社会信任调查〉（无日期）。取自中华民国群我伦理促进会网站  
<http://www.humanrightwatch.cc/?p=24064#more-24064>
- 〈媒体申诉案件统计数据〉（无日期）。取自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网站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aspx?site\\_content\\_sn=1153&is\\_history=0](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aspx?site_content_sn=1153&is_history=0)
- 王中天（2010）。〈当社会信任遇见政治信任－对政治文化观点的整合与检验〉，《台湾民主季刊》，7(4):47-83。
- 王泰俐（2004）。〈电视新闻节目感官主义的初探研究〉，《新闻学研究》，81:1-42。
- 王业立编（2017）。《政治学》。台北：晶典文化。
- 林照真（2009）。《收视率新闻学：台湾电视新闻商品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 林聪吉（2012）。〈台湾民众的机构信任以媒体信任为分析焦点〉，《东吴政治学报》，30(1):43-79。
- 徐美苓（2015）。〈影响新闻可信度与新闻素养效能 因素之探讨〉。《中华传播学刊》，27:99-136。
- 盛治仁（2003）。〈台湾民众民主价值及政治信任感研究—政党轮替前后的比较〉，《选举研究》，10(1):115-169。
- 陈炳宏（2009）。〈媒体集团综效偏差之研究〉。《中华传播学刊》，16:77-213。
- 陈清河（2004）。〈还原媒体的时代形貌－台湾地下电台运动史流变的再论述〉。《台湾民主季刊》，1(3):165-201。

- 陈陆辉 (2003)。政治信任、施政表现与民众对台湾民主的展望。《台湾政治学刊》，7(2):149-188。
- 陈陆辉 (2006)。〈政治信任的政治后果—以 2004 年立法委员选举为例〉。《台湾民主季刊》，3(2):39-61。
- 陈陆辉、陈映男 (2012)。宁信地方，不信中央：政治信任的类型及其政治后果。《社会科学论丛》，6(1):15-57。
- 陈忆宁、罗文辉 (2006)。〈媒介使用与政治资本〉，《新闻学研究》，88:83-134。
- 陈忆宁 (2011)。〈探索政治议题感知的世代差异—一个媒介效果的观点〉。《台湾民主季刊》，8(2):39-181。
- 诸葛俊、黄于恬、汪明生 (2012)。〈地下电台传播行为对台湾高雄地区公民社会影响之研究〉。《传播与社会学刊》，20(1):15-150。
- 刘嘉薇、黄纪 (2010)。〈持续与变迁—政治信息对大学生政治信任感影响之定群追踪研究〉。《政治学报》，50:111-146。
- 郑夙芬、陈陆辉、刘嘉薇 (2008)。〈选举事件与政治信任：以 2004 年总统选举为例〉。《问题与研究》，47(3):29-50。
- 罗文辉、林文琪、牛隆光、蔡卓芬 (2003)。〈媒介依赖与媒介使用对选举新闻可信度的影响：五种媒介的比较〉。《新闻学研究》，74:19-44。
- Ariely, G. (2015). Trusting the pres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nditional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Elections, Public Opinion and Parties*, 25(3), 351-367.
- Cappella, J. N., & Jamieson, K. H. (1997). *Spiral of cynicism: The press and the public good*.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rter, R. F., & Greenberg, B. S. (1965). Newspapers or television: Which do You believe?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42(1), 29-34.
- Dunleavy, P., & O'Leary, B. (1987). *Theories of the State: The Politics of Liberal Democracy*. New York, NY: Macmillan.
- Easton, D. (1965). *A system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Feldman, S. (1983). The measurement and meaning of political trust. *Political Methodology*, 9(3), 341-354.
- Freeman, K. S., & Spyridakis, J. (2004). An examination of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credibility of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51(2), 239-263.
- Gaziano, C., & McGrath, K. (1986). Measuring the concept of credibility. *Journalism Quarterly*, 63,45-62.
- Greenberg, B. S., & Roloff, M. E. (1974, November). Mass media credibility: Research results and critical issues. *News Research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Newspaper Publishers Association*, 6, 1-48.
- Hetherington, M. J. (1998). 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political trus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2(4), 791-808.
- Hetherington, M. J. (2005). *Why trust matters: Declining political trust and the demise of American liberalism*. Princeton, N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ovland, C. I., & Weiss, W. (1951). The influence of source credibility on communication effectivenes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5(4), 635-650.
- Ladd, J. M. (2012). *Why Americans Hate the Media and How It Matter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i, R., & Suh, A. (2015). Factors influencing information credibility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Evidence from Facebook Pages. *Procedia Computer Science*, 72(Supplement C), 314-328.
- Mishler, W., & Rose, R. (1997). Trust, distrust and skepticism: Popular evaluations of civi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9(2), 418-451.
- Norris, P. (2000). *A virtuous circl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s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Cambridge, U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Brien, S. (2009, January). Political conflict, the media, and trust in govern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outher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New Orleans, USA.
- Parry, G. (1976). Trust, distrust and consensu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2), 129-142.
- Robinson, M. J. (1976). Public affairs television and the growth of political malaise: The case of "The Selling of the Pentag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0(2), 409-432.
- Rudolph, T. J., & Evans, J. (2005). Political trust, ideology, and public support for government spend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9(3), 660-671.
- Schweiger, W. (2000). Media credibility—experience or image? A survey on the credibility of the World Wide Web in Germany in comparison to other media.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5(1), 37-59.
- Tsfati, Y., & Cohen, J. (2005). Democratic consequences of hostile media perceptions: The case of Gaza Settlers. *The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0 (4): 28–51.

## **Media Credibility and Political Trust:**

### **A longitudinal Study**

Chiao-An Wang & Song-In Wang

#### **ABSTRACT**

Media trust and political trust are both very important to the stability of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s. However,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trust and political trust is rare. This study trie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credibility and political trust from 2003 to 2018 using a longitudinal approach. Media credibility was measured by asking respondents to score from 0 points (least credible) to 100 points (most credible) the overall news coverage from newspapers, magazines, radio stations, TV channels, and Internet sites. Political trust was measured by asking respondents to indicate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agreed with two statements using a 5-point Likert-type scale: “The government seeks to create maximum welfare for the people” and “What government officials say in the media is believable.” The two scores were then averaged to create the measure of political trust.

Analyzing survey data collected by the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and the “Taiwan Communication Survey,” we found that respondents evaluated low levels of both media credibility and political trust, with levels declining year by year. The results show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V credibility and political trust, a finding that fits the “virtuous circle theory.” Data also show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radio credibility and political trust, which fits the “media malaise theory.”

**Keywords:** media credibility, political trust, longitudinal study,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Taiwan Communication Survey

## 附录一：台湾历年政治大事纪

1996	首次总统直选	李登辉、连战当选
1997	民进党在县市长选举中，首度超越国民党	
2000	台湾首次政党轮替	陈水扁、吕秀莲当选正、副总统
2001	第五届立法委员选举	民进党成为国会最大党
2004	三一九枪击案	
2004	陈水扁、吕秀莲连任正、副总统	

\* Chiao-An Wang, MA gradu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elecommunication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Song-In W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 Graduate Institute of Telecommunication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email: telsiw@ccu.edu.tw

2005	废除国民大会	
2005	2005 三合一选举	国民党取得 14 个县市长 民进党取得 6 个城市
2006	总统亲家赵玉柱涉及台开股票内线交易	
2006	第一家庭女婿赵建铭违反证交法起诉	台开案终结
2006	百万人民反贪腐运动	
2006	基隆市长依贪污治罪条例判刑确定	
2006	国务机要费案终结, 陈水扁与吴淑珍涉嫌贪污及伪造文书	
2006	国民党立委何智辉, 以贪污、背信等罪, 判刑确定。	
2007	马英九涉及特别费案, 依贪污罪起诉	
2007	经济部常务次长因涉及工程弊案遭收押禁见	
2007	吕秀莲、游锡堃及陈唐山依贪污罪嫌起诉	吕秀莲为时任副总统 游锡堃为民进党党主席 陈唐山为国安会秘书长
2008	马英九、萧万长当选正、副总统	
2008	反黑心顾台湾大游行	表达对政府的两岸、经济与食安方面施政不满
2008	前总统陈水扁收押禁见	
2008	云林县长苏治芬依贪污治罪起诉	
2010	前总统陈水扁因龙潭购地弊案及 101 买官案, 遭判刑确定。	
2011	前第一夫人吴淑珍判刑确定	
2012	马英九、吴敦义当选正、副总统	国民党取得国会多数
2012	林益世坦承贪污索贿	
2013	马 (英九) 王 (金平) 政争	
2014	太阳花学运	要求逐条审查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
2015	台南市议会议长贿选案, 四人遭收押禁见	李全教、蔡启新、杨明达、林聪彬
2015	前新北市副市长许志坚涉嫌收贿遭收押禁见	
2016	蔡英文、陈建仁当选正、副总统	政党轮替 民进党取得国会多数
2017	同婚合法化	正反意见分歧
2018	九合一选举	

## 附录二：台湾历年媒体大事纪

年份	事件	备注
2003	三法整并及党政军退出媒体修正	党政军退出媒体部分完成三读
2005	脚尾饭事件	东森新闻 S 台被中华民国行政院新闻局撤销牌照。
2005	新闻局进行换照引发争议	七个频道未通过审核停播 台湾言论自由环境受到批评，也有人认为是媒体乱象的响应
2007	周政保影带事件	史镇康自导自演，TVBS 多名主管及总经理下台负责

2007	NCC 认定 TVBS 内部新闻 控管失灵，裁罚 TVBS 与 TVBS-N	
2010	放宽党政军进入媒体门坎 修正案	暂停推动立法
2012	旺中案	NCC 决议，有条件性通过
2013	反媒体垄断法修正案	遭国民党挡下，以议事程序封杀此案
2018	广电三法修正草案	建立公平上下架机制、分组付费机制、反媒体垄断等条例



信任媒體就信任政治？

## 档案与再档案之间\*

井迎瑞\*\*

### 本文引用格式

井迎瑞 (2021)。〈档案与再档案之间〉，《传播、文化与政治》，15:115-131。

---

投稿日期：2021 年 7 月 19 日；通过日期：2021 年 9 月 1 日。

\*本文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开始撰写，2021 年 7 月 18 日完稿，疫情之下完成了给自己的功课。

\*\*作者井迎瑞为国家电影资料馆前馆长、国立台南艺术大学荣誉教授、台湾电影文化资产保存协会理事长、电影搜藏家博物馆创办人、馆长；2014 年台北电影节「卓越贡献奖」；2021 年第一届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影视听遗产保存贡献奖」，e-mail: rayjiing@gmail.com

## 《摘要》

对于档案馆或博物馆而言，搜集收藏品、艺术品、文献并建立档案（或称数据库），是最基本的功课，此过程涉及方法、技术与施作程序，除了实务面的考虑之外，更涉及对于档案的美学与哲学性思考；本文要讨论的即是收藏品、艺术品、文物或电影，从被发现之后，离开原来所在的档案（数据库），被迁徙、转移、入藏进入另外的档案里面，或建立新的档案，这种现象有可能重复多次的发生，这样做法是今天档案馆（数据馆），博物馆运作的常态，这外观似乎平淡无奇，使用者也习以为常，管理者除了遵循档案化的工序之外，还可能会有那些人文思考？档案与再档案这个行为的本身代表何种意义？档案与再档案之间出现的裂缝能否乍现春光？能否让我们窥见博物馆背后所隐藏的秘密？本文以电影搜藏家博物馆的电影器材、戏服、文献等三个档案（数据库）为例，说明档案的发现、转移、入藏等再档案的过程，不是价值的逃逸路线，而是再脉络化的过程，藉此建立新的话语系统，激活想象扩大影响。

**关键词：**再档案、再脉络、迁徙

## 壹、前言

档案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是一个自我完成的话语系统与表述方式，这种话语系统是依靠着档案内部的对象与对象、藏品与藏品间，某种生动的内在连结得以建构完成，而当整个话语系统被建立之后，档案的边界就可被打破，就有了向档案之外扩延的力量，蓄势待发，这些内部的对象，藏品便有了跨界与档案之外的世界对话的可能，所以档案是从「所指」到「能指」的转变过程。

## 贰、音像纪录、影像维护与电影搜藏家博物馆

我 1996 年参与了国立台南艺术学院的筹设，创办了音像纪录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往后的几年里，随着纪录所的发展，使我看见设所时对于纪录片的理解与论述，需要跟着时代变化而有所更新，音像纪录研究所在 2009 年增加了「影像维护组」，所名也改为「音像纪录与影像维护研究所」这样做的原因是鉴于台湾媒体环境的改变，纪录的工具由机械改为电子，纪录的媒材由模拟改为数字，工具变得轻薄短小，媒材变得方便经济，拍摄纪录片的门坎因而大大降低，过去以呎计价，锱铢必较的拍摄行为，现在改成开了机就能长期跟拍的参与式观察，纪录者短时间内就累积大量素材，衍生出档案的储存，管理，再使用的问题，甚至档案本身也成了一种文本，兼具了叙事功能，因此纪录片的拍摄衍生出了档案管理的问题，显然作为一个研究所对于档案的理解，乃至纪录与档案关系的研究认识论上已经有所不足，都必须尽速地跟上；鉴于记录（拍摄）与档案（管理）是有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关系，一个原本主张纪录片作为方法的研究所，认识论不足之外，方法论上也必须增加「影像维护组」以为因应，音像纪录研究所于 2008 年经过教育部的核定增加影像维护组，2009 年招开始收第一届研究生，在 2011 年有了影像维护专业第一届的毕业生，这个以研究电影资料馆学 *archive studies* 为主的学科，在台湾甚至在两岸高教体系中都是首创。从 2009 至 2021 年也匆匆 11 个年头，这段时间以来除了对于先前设定的图像文件案维护的目标

之外，随着对于档案的型态，载体，与物质性的理解，而扩大到了对于所有电影文化资产的维护保存，其领域也涉及到了后端的展示问题，自然而然影像维护也和博物馆学有了交集。

2016年，我从国立台南艺术大学退休，获得了富邦文教基金会的支持，在台北松山文创园区设立了电影搜藏家博物馆；这是一个以收藏电影搜藏家和他们的搜藏品的博物馆；我希望让民众欣赏这些搜藏家的收藏品，并且透过这些搜藏品来理解电影史，所以2016年成立了电影搜·藏家博物馆，把我10年来的搜藏品在电影搜藏家博物馆设立展厅展出<sup>1</sup>；主要有三个展厅，陈列三个搜藏家的三个数据库，分别是：黄仁与他的藏经阁（文献）、陈成昕的敦煌宝库（器材）及李衍宏的戏服世界（戏服）。这三个数据库都是我近十年来经手所收藏，希望让世人透过这些对象去重新理解电影史<sup>2</sup>。

### 一、黄仁与他的藏经阁（文献）<sup>3</sup>

黄仁（1925-2020）本名黄定成，福建省连城县人，一生从事电影评论、电影史研究，持续累积史料与档案长达半世纪，为建构台湾本土电影史观打下基础，他的著作等身均以历史研究著称，他命名自己的资料室为「黄仁电影数据馆」，足以凸显他对于史料的重视，生前居住于台北市，九十高龄仍持续读书写作。2012年由我本人出面洽谈之下，黄仁先生将毕生五千余册的电影书籍与二百余个电影文件捐赠予国立台南艺术大学，并在我努力之下在校内设立「黄仁书房」，并授予荣誉博士学位以表彰他对于电影学术的贡献。2017年经黄仁先生授权，本馆获得「黄仁电影数据馆」全部复刻版档案夹，陈列台北文创大楼4楼电影搜藏家博物馆展厅，让这些档案永续为台湾电影研究发挥功能。

---

1 因為我自己也是個蒐藏家，有一種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趣味。

2 電影蒐藏家博物館官網，<http://www.fcm.tw/index.html>

3 同上。<http://www.fcm.tw/halls.html>。電影蒐藏家博物館官網文字均由本人親自撰寫。

## 二、陈成昕的敦煌宝库（器材）<sup>4</sup>

陈成昕（1925–2015）是大基影业和大基贸易行的创办人，该公司成立于1960年代中期，是日本IBIGAWA CARBON炭精棒的台湾总代理，60、70年代台湾电影业一片荣景，炭精棒放映机又是电影院放映主流，大基影业业务因此迅速成长，后来开始跨足其它电影器材业务，最具规模的是电影镜头，因为陈先生年事已高，且因健康因素，2000年初期已结束营业。2014年我率领了南艺大的研究团队，打开了位于在台北市信阳街大基影业旧址地下密室的铁门，里面搜藏了大量的电影镜头与摄影机，不但分类清楚且有恒温恒湿的控制，规模十分惊人，俨然发现一座电影镜头的敦煌宝库。经过登录与整理这些镜头陈列于台北文创大楼4楼本馆展示，并做推广电影教育之用，不但让这些镜头有了第二生命，也让陈成昕与大基影业的名字不会被遗忘。

## 三、李衍宏的戏服世界（戏服）<sup>5</sup>

李衍宏（1926–2017）本名李芥园，湖南邵阳人，从事电影戏剧服装工作超过五十年，经历台湾电影、电视各个不同时期发展，对台湾电影事业的发展贡献良多。李师傅从入行到退休，一路经历了古装武侠电影、抗战爱国电影、健康写实主义电影、台湾新电影，其所参与的电影与戏剧总数超过一百部，因此他从事电影服装的历史，就是一部台湾电影发展的历史。而李师傅金宏服装社中的大批电影戏服，更成为台湾电影史的另一种载体与数据库，李师傅于2013年退休后，金宏服装社所有10000件戏服，在我努力之下所幸没有分散，悉数由电影搜藏家博物馆搜藏，使李师傅所建构的戏服数据库得以创造永续价值，李师傅其人其事也不会被遗忘。

## 貳、原初档案（original archive）、再档案（re-archiving）

---

<sup>4</sup>同上。

<sup>5</sup>同上。

## 与再生档案 (regenerate, recreated archive)

档案、再档案，是指整个档案的迁徙过程，包括了档案之接收与搬迁，并且在不同的环境脉络中重新档案化，建立一个全新的档案，在档案化的过程代表了一种价值的转换，它不仅是地点的转变，也可能建立一个与原来目的、宗旨、甚至方向都可能迥异的档案，例如大基影业的器材、金宏服装社的戏服，原来档案的目的是为了产业，是为了营运，是为了租售，但是再档案之后，它的目的是为了教育推广和文创产业，价值取向也改变。

至于再生档案，是指档案之再生，在档案维护整理之后，因而产生了许多附属档案，或者次级档案、亚档案，例如大基影业的电影器材大批量的接收、典藏、搬迁，但在整理之后产生许多新的对象或者新的档案。例如大基影业档案类别与数量庞大，这些项目经过清点维护，甚至修复之后，会产生许多新的对象或者新的档案；黄仁先生的档案是有关电影资料史料与文献，这些文献经过了整理、扫描、复制成为两套，甚至多套复制品便于异地典藏以及推广之用，这些再制与派生的档案，这叫做档案之再生，或者叫做再生档案。

档案最初典藏的地方，也是档案原初被发现之处，是第一次档案，也是依照原来初始典藏者的需求与目的而建立的档案，首先我们针对这些原初档案的数量、类别、内容，进行测绘、登录，做基本了解，就有了原初的档案，在深入研究之前设法重建这些档案当初建立的脉络，从这些脉络中来对于档案进行了解，这就是做脉络化的研究。当脉络化之后对于档案本身新的理解，又增加了我们对于当时大环境与时代脉络的理解，于是这样脉络与档案，档案与脉络交互式的理解，就更能够增加对档案的理解，这就是辩证性的理解 (dialectical understanding)。

当原初档案被发现之后可能会被搜藏、转手、迁徙或是复制，这里就牵涉到了再档案，再重脉络化的做法，这做法甚至会不断发生下去，文物从原先墓穴的随葬品出土，成为文人墨客、皇亲国戚及富商大贾的收藏品，再几经转手成为博物馆的收藏品。这都是档案与再档案的过程，不仅是地理位置

的改变，它的意义和它的脉络，以及它们的观众也随之改变，从艺术品，收藏品本身而言，他们的接触面因而扩大了，他们原先的档案意义也改变了。

而所谓的迁徙 (migrate) 在本文中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指物理上的搬迁 (relocate)，另一个含义是指媒体变迁中，信息从一个媒材转移到另一个媒材的过程，另一种说法叫做「拷贝」(copy) 或「复制」(reproduce)。产生的新档案与它的新环境，新脉络之间出现新的扞格，然而在互动学习之后逐渐消除了这种障碍，而达到了和谐与辩证后的统一，这些档案将以新的面貌面对世人。

## 一、档案与再档案之间

指的是整个档案的迁徙、接收与搬迁，并且在不同的脉络中进行再档案化，也可称之为「二次档案化」，再档案化有时性质单纯，可能只是典藏地点的转变，同性质的搜藏者之间的买卖、出让或物权的转移，也可能是比较复杂的价值转换，例如代表电影搜藏家博物馆搜藏品的三个展厅，分别从原初典藏地点迁徙并重新建档而来，它们不仅是物理环境的改变，更因为牵涉到博物馆与搜藏者目标不同，而必须将档案重新整合，剪裁、更新、再档案化，使其服膺于新的搜藏者之价值取向。

至于再生档案，是指档案之再生，指的是在档案维护整理之后，因而产生了许多附属档案，或者次级档案、亚档案，例如大基影业的电影器材大批量的接收、典藏及搬迁，但在整理之后产生许多新的对象或者新的档案。例如附图显示大基影业的对象档案经过维护整理，甚至修复之后，会产生许多新的对象或者新的档案；黄仁先生的档案是一些电影资料与文献，这些文献经过了整理，扫描，复制成为两套，甚至多套复制品便于异地典藏以及推广之用，这些再制与派生的档案，这叫做档案之再生，或者叫做再生档案。

黄仁的信息档案：原来名称为「黄仁电影资料馆」，位于台北市大安区区仁爱路三段 x 巷 x 号 4 楼

大基的器材档案：原来名称为「大基贸易行」，位于台北市中正区信阳街 11 之 2 号



金宏的戏服档案：原来名称为「金宏泰服装社」，位于台北市万华区西宁南路 126 号 2 楼

三个原初电影文件分别位于台北市大安区，万华区，中正区，它们的位置相距不远，距离台湾电影事业之都的西门町也很近，如果把当时掌管台湾电影事业的行政院新闻局也置入这份文化地图的话，一个十分形象化描绘台湾电影产业的拓扑学轮廓就清晰浮现：

行政院新闻局电影事业处（政策）<sup>6</sup>：位于台北市中正区天津街 2 号（裁撤时地址）

大基距离新闻局 800 公尺，步行 11 分钟<sup>7</sup>

金宏距离新闻局 2.5 公里，车行 6 分钟

黄仁寓所距离新闻局 2.8 公里，车行 5 分钟

从四者的地理位置我们看见了一个台湾电影事业发展的产业地图，一叶知秋，从这份地图中看见了他们之间一种共生关系，其中除了黄仁先生资料的搜集是经过我和黄先生本人讨论了多年之后才执行的移交，其余大基、金宏的档案搜集都是突发事件，大基贸易行的陈成昕先生由于健康因素而结束营业多年，并在过世之后，我才协助家属把所收藏品、器材、机具等打包移交，属抢救性的搜集；金宏泰服装社的李衍宏师傅虽然是生前把所有戏服转交给我，然而当时他已经将近 90 岁高龄，并且双目失明，所以这样的转移也是属于抢救性的搜集；当我在电影搜藏家博物馆重新建文件，并建立诠释数据时，我惊觉这几个档案原来的地点竟然相距那么近，甚至于与主管电影事业的官署也紧密相连，台湾电影曾经辉煌从这份地图中可见端倪，这些公司行号与机构，他们地理位置看似巧合的背后，恰巧说明了一个电影产业链的存在，这些民间公司或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基于需要与方便，逐渐往

---

6 新聞局於 2012 年 5 月 20 日裁撤，改為在行政院本部內設置發言人辦公室，電影業務由「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取代。

7 使用 Google 地圖估算。

西门町集中，这是一个缓慢的型塑过程，我的抢救是偶然，但反证了电影产业共生的必然历史。

然而由于时代的变迁，传统电影产业的没落，导致与原初的档案必须转手，先是到了学界——台南艺术大学，建立了不同的脉络，最终来到了松烟文创园区的电影搜藏家博物馆：台北市信义区烟厂路 88 号 4 楼之 6，档案内的对象大体上没有改变，但是它的架构与脉络改变了，同样的对象、藏品，但是机构的宗旨改变了，他们不再是为了服务电影产业，而是进驻了松山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这些档案经过重新编码、整合、增删、分类等再档案化过程，它们不再是直接服务影视产业支持电影公司拍片的目的而存在，而是为了彰显文化园区发展文创产业的价值取向而定名为博物馆，档案的目的从租售而改变为展览，让参观者看见电影的发展历史，回顾电影纪录真实与再现真实的原理，用欣赏感恩的心再次看见电影的价值。也由于再档案的机遇，档案的边界也随之打开，与新的观众群互动，与整个创意社群（不仅是影视业界）跨领域的互动，希望各领域的创意人员，艺术家互相碰撞，把各领域的艺术元素成新组合，甚至相互融合，或许能产生什么新的艺术产品，甚至于新的艺术形式。

下个阶段电影搜藏家博物馆正在规划成立小区性的微型电影博物馆，预期将会进行再次的档案化与再次的脉络化，然而每次的变动，都预示着可能的发展与创新，再档案与再档案之间，会有新的挑战与新的机遇发生，档案与再档案之间，造就了对对象的流通性，也增加了能见度与影响力，扩大了接触的人群，打破了固定化的观众群与观看脉络。一次再档案化就是一次与原来脉络的断裂，也是一次意义的迸发与翻新，否则文物就会静静的留在原处，等待着历史的轮回，或是等待着千年以后再次的出土，我是积极而乐观的看待变动与再档案这件事。

松烟文创园区原来是一个制烟厂，一个制造香烟的地方，但是废弃多年之后改为了文创园区，从建筑群本身的翻修重划，就是一个再档案，再脉络化的过程，原来的意义不在了，原来制造香烟的意义和目的也消失了。不管是电影器材、电影戏服、电影文献等三个档案，都因为了创意产业而再生，建立了新的脉络，赋予了新的意义，今天进出文创园区的人不再是烟厂工人，

也不再是贸易商，接触整个园区的使用者也都变了，面向的是开放、多元、实验性的未来。

松山文创园区是黄仁、大基及金宏档案再档案化的发生地点，其位置与三个原初档案的位置也相距不远，电影搜藏家博物馆选择进驻松山文创园区从物理环境，到价值取向两个维度而言，都代表着承先启后，延续历史，创造未来的新使命。

大基距离松烟 6.8 公里，车行 11 分钟

金宏距离松烟 6.6 公里，车行 10 分钟

黄仁寓所距离松烟 2.4 公里，车行 7 分钟

## 二、档案的内与外

档案内部的对象及艺术品，他们之间的关系再现了某种的内在逻辑，换言之，这些对象是依据某种想象而安置在一起，从意义的动荡，历经了辩证的发展，而最终到达了一种和谐状态，「人不能踏在同一条河两次」<sup>8</sup>，一切万物皆流动，不断的变动才是世间不变的真理，所以和谐是要通过竞争才能达到，只有正反两极不断的辩证，才能达到统一与和谐。我也引用这个概念来论证档案也是一个竞争的场域（contest terrian），档案内部典藏品的选取与淘汰（inclusion/exclusion），档案内部与外部边际的消长与变化，都是属于话语权争夺的范畴，档案/再档案，脉络/再脉络，代表着话语权之变动，也代表着意义躁动之后的和谐，如河水般的变动发展，永无止修。

档案，不管是帝王的陵寝，或是帝王生前把玩的多宝阁，档案内部对象的排列都有它的逻辑，它代表了一种宇宙观，是理想中的极乐世界，一直到有一天，由于盗墓，或是考古发现<sup>9</sup>，这些对象进入了收藏家的手中，或是进

---

<sup>8</sup> 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 之名言。

<sup>9</sup> 盜墓，考古發現，對於墓主人而言都是擾動，不同的是盜墓是為著私利存在的偷盜行為，不是為了採集古代歷史與文化信息，反而因為盜墓，古代歷史與文化信息遭到破壞；考古發現是對於古代遺存的探勘組織化的研究行為，不是為了私人

入了博物馆的档案或数据库里面，慢慢的由于教育与研究的开展，也由于档案与世人之相处，逐渐被观众所理解接受，而形成了新的和谐关系，档案的内与外也形成了一种新的连结；对象和对象之间的关系叫做故事，对象与外界的关系叫做历史，关注档案内部对象的解读叫做微观，关注档案外部历史语境，以及在此语境下对于对象的解读叫做宏观，故事与历史也都是在变动中发展。

### 三、以书架为例

我举书架为例便于形象化思考，书架既是一个封闭，又开放的价值系统，但是必须先要有封闭，然后才能够开放，根据每个人的兴趣、偏好、理想及预算，精挑细选，滚动式发展，不断的扩充；一个书架代表一个世界观，书架的物质空间有限，书本必须精挑细选，所以空间是封闭的，但意义是开放的，从封闭作为起点，而走向无限；藏书有不同规格、版型、语言，每个人依照书籍的内容、主题、作者、出版社、丛书等因素挑选，并分门别类的放到一起，或是分别储存。书架内部也有自己的框架与空间，书本与书本之间，或紧紧密排列没有缝隙，或者稀疏松散，甚至不经意歪斜着，不论外观如何，都有着一种逻辑与内在含义，让它们在此相遇；他们此刻都是处于一种安定与和谐的状态，所以这个书架虽然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但是他都代表了一个鲜活的价值系统与世界观。

书本和书本之间，对象和对象之间，艺术品和艺术品之间的连接关系，具有叙事性 (narrative)，而这个书架世界又与外在的环境脉络发生了辩证的关系，环境脉络就是时间和空间的脉络，若要理解书架的意义，就必须把这个书架放在某一个特定的时空来理解，这个书架放在某一个特定的时空里，和放在另外一个时空里所产生的意义是不同的，换言之，如果把书架搬到另外一个地点，或者另外一个时空环境，它的故事与它的叙事意义会不同，生

---

利益而存在，為的是採集歷史與文化信息，增加對於古代社會生存方式與社會結構的了解。

产出来的价值也会不同，例如同一个书架放在某个时空里可能代表「前卫」，而放置在另一个时空里面则代表「怀旧」，所以书架必须从封闭走向开放，滚动式发展扩充典藏。书架和档案一样，需要不断地再档案，与日俱进，日久弥新，书本与书本，对象与对象之间有一种生动而活泼的逻辑把它们链接在一起，随着时间进程书架的意义会慢慢凸显，意义会逐渐滋长发酵，这些意义和外在的环境的碰撞，也会形成了一个新的脉络，话语也随之更新。

#### 四、档案的意义是浮动的

档案的意义会随着脉络改变而改变，档案的内/外关系讨论完之后，最后也要考虑人的因素，档案最后是要为人服务，因此不能排除「人」这个维度，也就是要为人服务的初衷，档案与再档案次数越多，表示活动程度越大，或者较中性的说，就是档案内部之间，外部之间的关系互动更为紧密，否则档案 archive 会是静止的，那么这些收藏品就会变成随葬品一样，一藏就是几百年，所以从档案的角度，从博物馆的角度，这样的迁徙与断裂是好的。例如，木乃伊，离开了金字塔埃及法老王的墓穴里面，敦煌莫高窟的大量文物与画卷被伯希和、斯坦因带到了欧洲的博物馆，都代表了一种脉络的断裂，在欧洲的博物馆中又产生了新的脉络，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这都是掠夺，是不好的。但是在这种再档案的过程中，反而让世界上有更多的人口看见了这个文物，这种档案与人类的关系变成更为活跃，而不再只是深埋地下，从这样的例子，我们看见了档案的价值。

大基位于信阳街，金宏位于西宁南路，都位于西门町的电影区或邻近地区，二者之间的距离不到 2 公里，他们的档案是为了服务电影的产业，距离松烟文创园区大约 7 公里，取用的人口，观赏的人口也改变了，反而是因为再档案的过程，让他们的接触人口扩大，边际被打开了。

#### 参、结语

档案的选取与淘汰，档案边际的消长与变化都是话语权的争夺，当档案和脉络的关系被确立之后，最后还要加上一层人的角度，建立档案要有人本的思想，要有以人为本的观念，要把人的角度，人的视野加入到这一个理解与再档案的行为中，这个人不是空洞的人，是要活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之下的一个人，不是抽象的人，人才是档案的主体，人有一种主观的觉知，是人要来使用这个档案，人来理解这个档案，来欣赏这个档案，所以人为主体的这个面向，在理解档案与再档案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脉络的三维度体现，产生出了立体化的脉络，有些是看得见的，有些是看不见的，展厅、场域、人，是看的见，史观是看不见的，但是存在的；本文概略说明了个人作为一个教育者，档案维护者的专业探索，也描绘了一个研究所的转变与发展经历，或许对于同侪有参考的价值，它既非主流的电影教育的逃逸路线，也非传统博物馆学的思考模型，它不可讳言的具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又具有不可多得的实验价值，松动了原先的电影教育与博物馆学的界限，而可能出现的一种新范式，这种灵活度或许也能够给此阶段的文化创意产业带来一些省思。

。

## **A Look at the Art of Archiving and Re-Archiving**

Ray Jiing\*

### **ABSTRACT**

For archives or museums, collecting objects, arts and crafts, documents,

and establishing databases, archives and repositories are the most basic tasks; this process involves methods, techniques, and professional procedures. Archiving is not only about practical means, but also related to the aesthetic and philosophical thinking behind the process itself. Objects, art works, cultural relics, or film, from their initial discovery, leave their original repository then migrate and transfer into another repository, a common practice that repeats itself many times through institutions and generations.

This essay tries to ask questions around humanistic thoughts that buttress the archival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What is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the act of archiving and re-archiving? Can the space between the archiving and the re-archiving shed light upon such philosophical, aesthetic or humanistic practices? Can we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have a glimpse of the secrets behind the museum? This paper takes the Taipei Film Collectors' Museum's three collections of apparatus, costumes, and documents as an example, to reveal and explain how the discovery, migration, acquisition, and other archival work, is not the lessening of value, but rather the process of re-contextualization and enrichment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new discourse, to activate the imagination, and to disseminate the influential work of an archive.

**Keywords:** migrate, re-archiving, re-contextualization

附图:

说明: 同一批搜藏品先后被不同的机构收藏而进入不同的档案

---

\*Ray Jiing, Honorary Professor, National Tainan University of the Arts,  
e-mail:rayjiing@gmail.com

图一: 大基贸易源文件



图二：南艺大媒体中心档案





图三：电影搜藏家博物馆档案



# 新闻自由还是专业伦理？ 中天新闻的书面鉴定与亲身体验

陈顺孝\*

## 本文引用格式

陈顺孝 (2021) 。〈新闻自由还是专业伦理？中天新闻的书面鉴定与亲身体验〉，《传播、文化与政治》，14:133-150。

---

投稿日期：2020 年 12 月 23 日；通过日期：2021 年 10 月 25 日。

\*陈顺孝为辅仁大学新闻传播系副教授， e-mail: chen328@gmail.com

## 《摘要》

我担任中天新闻台换照听证会鉴定人，阅读超过两千页资料，发现中天宣示的理念、自定义的法规、建立的品管机制都可圈可点，但它的实质表现，却天差地别。中天一再触犯「制播新闻违反事实查证原则，致损害公共利益」等法规，被裁罚的次数和金额，都是所有新闻台之最，连自家新闻都错报谎报。我因此认定，中天没有守住新闻专业伦理底线。

听证会后，NCC 决定不予中天换照；中天反弹，把我列为攻击对象之一。中天及其所属的旺中媒体集团，污蔑我的延迟直播建议是效法中共媒体、谎称我引用的无国界记者组织（RSF）声明已被总部收回，骂我「很瞎」、要我道歉；我没有想到在书面鉴定之后，还要以亲身体验，见证中天新闻的专业沦丧、内控失守。

**关键词：**新闻自由、新闻自主、新闻伦理、媒体自律、事实查证

## 壹、挑战

2020年9月下旬，接到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的邀约，请我担任中天新闻台换照听证会的鉴定人，我陷入长考，因为一旦接受邀请，我就会卷入今生最大的争议之中。

我国卫星广播电视法规定，电视执照有效期六年，届满前须向 NCC 申请换照，换照先由以外部委员为主的咨询会议初审，再由 NCC 委员会议复审。中天新闻台上次换照是 2014 年，当时因违规次数和罚款金额为所有新闻台之最，初审时，六票对五票，多数反对换照；复审时，NCC 同意换照，但附加四条件：办理员工训练、强化伦理委员会、补实编审人员、落实独立审查人制度，要求半年内达成（刘子维，2014 年 12 月 3 日）。

2020 年 12 月 11 日，中天新闻台执照又将到期，再次申请换照。中天这六年的违规次数和罚款金额仍是所有新闻台之最，而且上次换照要求半年内落实的独立审查人制度，它延宕到 2019 年才设置；八月初审会议，九票对三票，三分之二委员反对换照，NCC 委员会议预定 11 月复审做出决议。此案关系重大，NCC 决定召开成立以来第一次换照听证会，邀请中天代表、利害关系人、证人和鉴定人对话，作为复审会议决策参考（TNL 编辑，2020 年 10 月 20 日）。而我就是 NCC 邀请的鉴定人之一。

我第一时间婉拒。一来认为有多位学者比我更能胜任，二来听证议题有数项超出我的专长领域，三来是否换照要考虑的因素太多，我难以做判断。NCC 联络人告知，我认为更能胜任的学者有的担任初审委员、有的曾和中天所属的旺中集团有过冲突，都不适合当鉴定人；鉴定人只需鉴定自己专长的议题，不需响应所有问题，也不必对是否换照做出判断，NCC 委员自会参考鉴定报告和其他资料，做出是否准予换照的决策。

我还是犹豫。中天换照案，已经引爆两种信念的对立，一方认为新闻自由至高无上，无论新闻台表现如何，政府若不让它换照，就是打压新闻自由；另一方认为新闻自由不能无限上纲，新闻台是社会公器，有专业伦理底线，失格者应该退场，才能守住底线、遏止沉沦。两方针锋相对，谁也说服不了谁。我的观点倾向后者，是众多论者之一，但若出面当鉴定人，恐将成为箭靶。

我私心希望远离纷争、平静生活，但又觉得不能忧谗畏讥、临事退缩，在校园踱步长考，最后决定接受邀请、承接挑战。

## 贰、书面鉴定

NCC 很快寄来数据光盘，内容包括中天新闻台 2014 年换照计划书和审查意见、换照后半年执行报告、2020 年换照计划书和补正资料、前一次评鉴报告书及评审意见，以及中天营运不当监理纪录、NCC 历次委员会议纪录、中天历次到会陈述纪录，还有中天前次执照和本次执照期间，所有新闻台被裁罚的明细和比较、中天伦理委员会会议纪录；此外，还有王立强指控中天接受中国资助及中天说明、《金融时报》指称中共国台办对旺中媒体下达编采指示及中天说明、中国旺旺公司财报揭露与中天公司关系人交易案。内容庞杂，单单 2020 年换照计划书就超过一千页，全部资料超过两千页。

我逐页浏览、比对、评估。中天接受中共资助和指挥的指控非常严重，但没有直接证据；中国旺旺与中天关系人事务数据，我没有能力解析；换照计划书提到的股权结构、财务状况，也不是我的专长。我不断筛选、摸索，逐渐将鉴定焦点集中在一个简单而关键的问题：中天有没有守住新闻专业伦理底线？

### 一、事实查证

我细看中天提供的数据，它的频道理念说「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宣示要提供「正确、多元、客观、真相」的新闻节目；它订有新闻自主公约、专业伦理规范、涉己事务新闻制播规范、新闻性政论节目制播准则、新闻事实查证办法，法规堪称完备，而且内容可圈可点，例如政论节目制播准则明订：「针对所有消息来源，注意查证，宜避免单一来源或无根据臆测」；不仅如此，它还建立四层品管机制，分别由单位主管、编辑和助理总监、编审和副总监、独立审查人把关，程序堪称严谨。中天若能贯彻这样的理念、法规、机制，不仅可以守住伦理底线，更能发展成优质新闻台。

但檢視 NCC 的裁罰資料，中天的實質表現，却和上述理念、法規、機制存在嚴重落差。中天自 2014 年 12 月 12 日本次執照生效到 2020 年 10 月 20 日止，共計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等法規 23 次，受罰金額合計 1073 萬元。其中違反衛廣法第廿七條第四款「制播新聞違反事實查證原則，致損害公共利益」高達 12 件、罰款 720 萬元；違反第三款「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4 件、罰 180 萬元；違反第二款「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3 件、罰 120 萬元；違反第四十三條第二款「營運不當，有損害訂戶或視聽眾權益之情事」1 件，罰 50 萬元；另外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1 件，罰 3 萬元。中天被裁罰的次數和金額，均為所有新聞台之最。

這些裁罰公正嗎？我評估沒問題。首先，裁罰並非 NCC 獨斷：NCC 接獲民眾申訴後，會函請新聞台召開倫理委員會討論，再將倫委會報告提請「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詢會議」審議，這個會議由 51 位專家學者、公民團體代表、實務工作者組成，每次開會隨機邀請 19 人審議，審議結果再送請 NCC 委員會議裁決；其次，受罰的不只中天，截至 9 月 15 日的比較表顯示，最嚴重的中天違規 18 件、罰 913 萬，第二名三立違規 17 件、罰 380.3 萬，第三名 TVBS 7 件、罰 123 萬，第四名民視 5 件、罰 190 萬；第三，國民黨執政的 2008 年至 2014 年，中天受罰件數和金額，就是新聞台之冠，不是民進黨執政時期才如此。

實際檢視中天遭罰案件，宣稱 200 萬噸文旦被倒進水庫、菠蘿跌到 1 公斤 1 元，指稱我駐新加坡代表在韓國瑜記者會「盯場」、中央「卡救命錢養蚊滅韓」，都違背事實。最離譜的是，連自家新聞都錯報謊報：2019 年 3 月 27 日，NCC 因中天誣指駐星大使「盯場」、不當報導「異象？！三市長合體天空出現『鳳凰展翅』雲朵」合計裁罰 100 萬元，中天新聞台却報導成 NCC 「以中天電視因為播送韓國瑜新聞占比太大等理由」開罰，隔天持續播放「報韓國瑜新聞太多」、「NCC 重罰中天百萬」標題，還子虛烏有地自稱「對於關西機場搜救報導，也被裁罰 40 萬元」。

## 二、自律內控

這些數據和實例，顯示中天宣示的「真實是新聞的生命」理念、事實查

证办法等法规都形同具文，四层品管机制也形同虚设。不仅如此，中天为了「落实媒体自律机制」而设置的伦理委员会，对 NCC 裁罚案件——特别是新闻性政论节目遭罚案件——的讨论决议，也与法律、内规存在重大落差。

例如：2020 年第一次伦理委员会议，讨论「大政治大爆卦」节目播出「批评韩国瑜者，由邻里长发一个月 5000 元」，以及「新闻龙卷风」节目播出「昧着良心批评韩国瑜，但每位成员到 12 月底至少可获得 10 万元，最高到 100 万元薪资」等 NCC 认为违反事实查证原则的案件，伦理委员会的决议是：「这是谈话性节目，属于来宾个人意见表达，本台并没有违反事实查证」，可是宣称批评韩国瑜可月领 5000、薪资 100 万明明是指涉「事实」而非「意见」，伦理委员会的认知显然有问题。

此外，伦理委员会在 2019 年 5 月通过的新闻性政论节目自律机制，对直播节目「争议言论」的处理方式为：先以标题或侧标提醒尚待查证，事后再进行查证和平衡。我分析「争议言论」是指民众爆料、涉及事实的指控，因为纯粹言论是个人意见表达，并不需要查证；然而，既然涉及事实，就应该先查证再播出，怎可先播出再查证？我因此认为，中天若不能确保政论节目内容的真实性，应该考虑减少或暂停直播，或者建立类似美国扣应节目的延迟直播机制，延迟七秒或三十秒播出，万一民众讲出没根据的指控，可以及时停删，以免散播谣言、再受裁罚。

### 三、专业底线

除了上述事实查证问题，中天的涉己报导也是失实失当，它的选举新闻更严重违反公平原则，报导单一政治人物（韩国瑜）的比例曾超过 88%。我因此认定中天没有守住专业伦理底线，对听证议题的第二题和第三题<sup>1</sup>提出以

---

<sup>1</sup> 聽證議題共有八題：(一)中天新聞台是否已履行前次換照之附款與行政指導，及評鑑命改善事項？(二)中天新聞台過去是否有營運不善之情事？違規裁罰案件是否過多？自律內控機制是否失能？(三)中天新聞台之內控機制是否足以確保下列事項：1.落實節目製作流程自律；2.避免外界不當干預新聞製播；3.自律倫理委員會有效運作；4.獨立審查人有效運作；5.改善過去違規情事，並提升新聞專業自主。(四)中天新聞台之人事組織及執行能力是否足以落實營運計畫？財務結構與財務狀況



下鉴定意见：

第二题：中天新闻台违规受罚次数为所有新闻台最多、违规受罚金额为所有新闻台最高、被申诉的次数也是所有新闻台之冠，违规裁罚案件显然过多、自律内控机制显然失能、营运显有不善之情事。

第三题：中天新闻台之内控机制显然不足以确保下列事项：(1) 落实节目制作流程自律；(2) 自律伦理委员会有效运作；(3) 独立审查人有效运作；(4) 改善过去违规情事，并提升新闻专业自主。至于能否「避免外界不当干预新闻制播」，鉴定人从现有资料中难作论断。

## 参、毀誉由人

10月26日，我和另外六位鉴定人乘车穿过示威人群，进入听证会场，在网络直播镜头前，宣读鉴定意见；其他鉴定人分别是：公民参与媒体改造联盟代表林月琴、台湾人权促进会副会长沈伯洋、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研究员廖福特、东吴大学会计系副教授柯琼凤、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系副教授陈慧蓉、台北大学经济系教授郭文忠。

### 一、听证回响

听证议程长达 8.5 小时，鉴定人宣读意见外，NCC 委员也和中天代表对话。对话中证实旺中集团董事长蔡衍明旗下大将邱佳瑜虽非中天人员，却介入中天新闻制播；廿八日，前立委黄国昌和网络媒体《沃草》揭露蔡衍明和旺中主管的微信群组对话，例如：蔡衍明说「可大批 NCC：一、无格沦为民进党打手」，邱佳瑜答复「今晚报和新闻龙卷风都会朝此方向执行」；蔡说「李永萍不支持韩国瑜，暂时不要上节目」，邱答「已交代下去暂不找李永

---

是否健全？其股權結構與負責人是否對新聞獨立製播有不利影響？(五)中天新聞台節目規劃是否落實視聽多元及弱勢保障？(六)中天新聞台員工之勞動權益是否受到確實保障？(七)中天新聞台換照案對國家安全、產業整體發展、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有何利或不利之影響？(八)中天新聞台換照案就閱聽眾權益、新聞專業自主、節目品質及勞動權益有何利或不利之影響？

萍」，更显示中天已经沦为蔡衍明个人传声工具。我从资料中难作论断的，至此趋于明朗：中天无法避免外界不当干预新闻制播（郭怜妤，2020 年 10 月 28 日；国会无双，2020 年 10 月 28 日）。

听证过程中，我收到多则私讯，回到家里，更收到四方涌来的褒贬。有人称赞我的鉴定报告「写得真好」，有人肯定我的论证有凭有据；但也有人骂我「绿打手」、「扼杀新闻言论自由」、「东厂厂公」。辱骂我的留言从电子邮件、脸书私讯传来，也出现在家人、朋友标注我的照片上，更传进学校网站，还有抗议电话打进学校办公室；我无法响应没有论述的谩骂，决定不予理会，家人、朋友支持我，学校也决定不作响应、不转电话。几家媒体要访问我，我也一概婉拒。就这样，我一直保持沉默，尽量不受毁誉影响，照常工作生活。

## 二、开铡争论

11 月 18 日，NCC 委员会议以七票对〇票，对中天新闻台做出「不予换照」处分，理由有四：一是屡次违规及遭民众申诉，未能落实新闻专业；二是内控与自律机制失灵；三是新闻制播遭受蔡衍明、邱佳瑜直接间接干预，违反自定义的新闻自主公约；四是未能具体说明改善可能性（NCC，2020 年 11 月 18 日）。决议一发布，我的手机随即响起，有的媒体要我表示意见，有的媒体邀我上谈话性节目评论，但我觉得自己想讲的，都已经写在鉴定报告中，且在听证会宣读过，因此全都婉拒。

我仔细阅读各方反应，特别是反对意见。有人认为不续照是民进党整肃异己，但如前所述，早在国民党执政的 2014 年，中天违规纪录就是所有新闻台之冠，当年初审六比五反对其换照，NCC 最后也仅有条件同意换照，显示无论蓝绿执政，中天的专业表现都禁不起检验；有人认为中天的问题，其他新闻台也有，只铡中天不公平，但同样如前所述，所有新闻台违规都受裁罚，只是中天最为严重，今年又轮到换照，其他新闻台将来换照时，同样要接受检验；还有人认为科技进步，卫星广播电视不再是稀有资源，政府不该再管，应该交由市场决定，但这是重大制度变革，利弊得失有待评估，即使

要变，也要修法通过才能变。

在各方评论中，我最佩服的是长期在国际捍卫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组织（RSF）」的四点声明：（一）新闻自由并非毫无管制，新闻自由——如同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所述——是指公众有接受正确信息的权利，并不是指媒体所有者能散播符合自己利益内容的权利；（二）NCC 审查中天执照符合正当性，由独立机关对电视台进行定期换照审查，是民主政体的标准作业流程，并未侵害新闻自由；（三）不予换照是极端手段，NCC 应该提供公众完整数据，证明其合理性，相同标准也要适用于未来不同政治色彩的媒体执照审查；（四）为了满足公众接受正确信息的权利，各政党与政府应该致力落实新闻伦理和编辑自主<sup>2</sup>。

RSF 的声明用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来诠释新闻自由，第十九条说：「人人有.....寻求、接收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无论是寻求消息和思想的采访自由、接受消息和思想的知之权利、传递消息和思想的出版自由，都是人人拥有的；然而，很少人有足够的时间、技能、财力来采访和出版，公众因此委托新闻媒体，赋予它们采访和出版自由，换取它们提供正确信息来满足知的权利。换言之，公众才是新闻自由的主人和主体，媒体及其老板只是受委托者，老板不能操控媒体造假谋私，喧宾夺主地侵夺公众新闻自由。

我觉得 RSF 对新闻自由意涵的厘清、对换照标准一致性的要求、对新闻伦理和编辑自主的强调，都切中要害，因此在脸书转贴全文，贴文很快得到 725 人按赞、35 人按怒、16 人按其他表情，还有 348 次分享、83 则留言。

留言中，有人贴图按「Good」，有人「无法苟同您的发言内容」；有人主张「民主国家媒体的存废应交由市场机制去决定，而非动用国家机器审判霸凌」，有人反问「当时为什么要成立 NCC，为什么要给他停发权力啊」；有人要求「请用同样标准检视三立、民视」，有人响应「其他新闻台只是还没轮到而已」；有人质疑「赞同中天是因为他立场跟你不一样」，有人反击「2014 年中天就被过半数评分不及格了，是不是也是当时的执政党介入呢」；意见

---

<sup>2</sup> 本段為摘要，全文詳見〈RSF statement 無國界記者組織官方聲明〉，網址：  
[https://rsf.org/sites/default/files/2020-11-18\\_rsf\\_cti\\_statement\\_wu\\_guo\\_jie\\_ji\\_zhe\\_zu\\_zhong\\_tian\\_zhi\\_guan\\_fang\\_sheng\\_ming\\_.pdf](https://rsf.org/sites/default/files/2020-11-18_rsf_cti_statement_wu_guo_jie_ji_zhe_zu_zhong_tian_zhi_guan_fang_sheng_ming_.pdf)

虽有不同，大致都能理性对话。不过，有人只留一句「这样新闻学真的教得下去吗？」，有人直接开骂「根本不配当老师」、「言论自由刽子手」，但也有人喊「老师加油！」。

### 三、怪奇留言

我浏览每一则留言，尊重批评，忍受辱骂。但有两类留言让我不解，一类质疑我在鉴定报告提到的延迟直播：「延迟直播另一个意涵形同言论审查，这是很骇人的法西斯思维！」、「延迟直播怎么做不到，大陆央视都在做啊，他用共产党的思维放在台湾，多好笑啊」；一类质疑 RSF 声明的真实性：有人转贴旺中集团网媒 CTWANT 题为「『NCC 并未涉及侵害新闻自由』 无国界记者组织总部未认可」的报导，质疑道：「所以是谁胡说八道咧？RSF 台湾分会等于全部？或是教大传的老师查证不足呢？」。

可是延迟直播是美国媒体常见做法，怎会扯上法西斯、共产党思维？RSF 11 月 18 日在台湾分部 Twitter 发表中文声明、20 日在总部官网发表中英文声明和新闻稿，一上网就看得见，怎会是胡说八道？我决定追查这两类留言起源为何、如何扩散，了解谁在造谣抹黑。

### 肆、亲身体验

#### 一、直播倒退？

我上网搜寻，很快找到质疑延迟直播的源头。

10 月 26 日听证会当天，中时新闻网就发新闻质疑「延迟还叫直播」；同日，网络出现眼图说「NCC 认定的民主自由是：学中共的延迟直播？」。27 日，中天新闻访问一位资深媒体人，质疑我的建议是新闻自由的大倒退；同日，中天新闻粉丝专页剪辑我的发言，打上「事前审查？？新闻自由倒退三十年」标题；也是同日，《中国时报》新闻说延迟直播做法「目前大陆媒体多有采用」，说我的建议引来网民嘘声。28 日，中天「新闻深喉咙」粉专用

图文嘲讽我是「天兵鉴定人」、「效法陆媒?! 难道他比较想看央视...?!」、「脱节脱到火星」。此后，中天多次在新闻和节目中嘲讽我提出「很瞎」的建议（李培睿，2020年10月26日；中天新闻，2020年10月27日a；中天新闻，2020年10月27日b；朱真楷，2020年10月27日）。

我无法理解中天和旺中媒体为何如此扭曲。我的鉴定报告说得很清楚，中天若不能确保政论节目内容真实性，应该考虑减少或暂停直播，或建立类似美国的延迟直播机制，延迟直播是美国电视的常见做法，连奥斯卡奖、葛莱美奖颁奖典礼都如此（Matt Carey, 2004, February 5; CNN, 2004, February 4）；公共电视研发部早在2000年发表「Call-in节目的法律问题」一文中详加讨论（胡心平，2000年12月26日），上网检索 Broadcast delay、Seven Second Delay、Delay-live 7 seconds，更可找到数以万计的数据，包括延迟直播的用法、演进和技术；而且，就在11月5日，美国ABC、CBS、NBC三大电视网才因川普没证据的指控美国总统大选舞弊，而中断川普的直播，显示专业电视台严格把关、不对谣言放水的坚持（胡梦玮，2020年11月6日）。

延迟直播是否适宜引进台湾，当然可以讨论；但要讨论，就应该先讲清楚延迟直播是什么。民众对此可能不了解，中天作为电视台，应该不会不知道；就算不知道，记者上网检索一下，就能了解。中天为何不走正道，硬要欺瞒观众丑化我？

## 二、声明回收？

我也很快就搜寻到质疑RSF声明真实性的相关报导和节目。

11月20日，中天「头条开讲」节目，一位新北市议员说我自己不写文章，却转贴RSF声明，代表心虚；他还宣称，在我转贴后，RSF台北分部发表正式声明，说RSF从来没有讲过这件事，这代表RSF已经认证NCC侵害新闻自由，他讲话时，电视标题写着「陈顺孝教授引用无国界组织文章...制造假新闻??」；主持人随后秀出我的脸书贴文，说RSF声明已经被打脸，我「是不是应该好好的解释，或甚至是道歉也可以呀」（中天新闻，2020年11月20日）。可是他们只要点进我的脸书贴文，就可以超链接到RSF总部

官网发布的中英文声明<sup>3</sup>，RSF 从未收回或否认四点声明，中天再一次散播不实谣言。

隔天，中天新闻台播出题为「瞎挺 NCC! 无国界记者组织台湾分会挨轰 监守自盗」的新闻，又宣称 RSF 的声明已被总部回收；主播还说，从 RSF 「2019 年举办的『第一届台湾新闻界国际会议』来看，参与讨论的人就包括廖福特和陈顺孝，这么巧就是中天听证会的鉴定人」，接着访问前政府官员，批评我和廖福特出席 RSF 会议又担任鉴定人是「监守自盗」（中天新闻，2020 年 11 月 22 日）。可是 RSF 的声明，明明还高挂在官网上，并未回收；我和廖福特只是 RSF 这个国际会议众多参与者之一，这个会议也只是我近年参加的数十场会议之一，我在这次会议之外与 RSF 并无往来，担任鉴定人也与 RSF 无关，凭什么骂我们「监守自盗」？

上网检索延迟直播、Broadcast delay，会很困难吗？点到 RSF 官网确认声明还在不在，会增加多少工作量？这些举手之劳，中天记者都不做，就胡乱指控、恣意抹黑；我没有想到在书面鉴定之后，还要以亲身体验，见证中天新闻的专业沦丧、内控失守。

我不禁为那些误信中天报导，而来攻击我、嘲讽我的民众感到悲哀。他们支持中天老板操控的新闻自由，中天却用虚假报导来欺骗他们，剥夺他们「接受正确信息」的新闻自由。

### 三、教不下去？

此外，《中国时报》还在 11 月 20 日发布题为「校友谴责，陈慧蓉沦为负面教材；网友质疑，陈顺孝教得下去吗」的报导，攻击我和同为鉴定人的文大新闻系陈慧蓉副教授。内容先引述一位文大校友质疑陈慧蓉「行为、立场... 都是非常负面的教材」，再说我在脸书贴出 RSF 声明后，被网友质疑「这样新闻学真的教得下去吗」（李侑珊，2020 年 11 月 20 日）。全文只引述符合旺

---

<sup>3</sup> RSF 中英文聲明詳見：

<https://rsf.org/en/news/taiwan-non-renewal-cti-news-channels-licence-does-not-go-aga-inst-press-freedom?fbclid=IwAR1c90DEU0t04pQIKL8LudSZXUXxdJlbIa1gQchm9M8SyftrksIROH0mzds>

中立场人士的片面说法和情绪用语，没有呈现另一方观点，纯然是打击异己的报导。

这则报导激起传播学者公愤，中华传播学会为此在 11 月 23 日发表声明，强调：「媒体为社会公器，不应以政治立场党同伐异，报导涉己事务尤需避免对持异见者进行舆论霸凌。传播学者以其专业对传播事务进行分析评论、及提供社会大众专业见解之建议，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所在。本学会基于维护传播学界担负社会责任之应有空间与尊严，吁请媒体与社会各界，尊重学术专业，重回理性讨论」（中华传播学会，2020 年 11 月 23 日）。

但旺中媒体并未停止攻讦。12 月 15 日，中时新闻网又发布题为「关台引发老翁轻生等争议，林丽云、陈顺孝噤声不回」的报导，说中天不续照「引发一连串争议，其中包含七句老翁轻生」，NCC 委员林丽云和我却不回复旺中记者提问，「无视因其所引起的一切动荡纷扰」（李侑珊，2020 年 12 月 15 日），将中天不续照、老翁轻生的原因和责任，全部推给林丽云和我，没有分清 NCC 委员和听证会鉴定人的权责，更没有反省中天违法违规、造假造谣的罪咎。

## 伍、展望

2020 年 12 月 11 日午夜过后，中天新闻台从有线电视平台下架；随即无缝接轨，转型为 YouTube 频道，继续在无法可管的网络平台播报新闻。中天下架前，曾向法院声请假处分，台北高等行政法院（2020 年 12 月 7 日）以「新闻媒体属于全体国民之公共资源即社会公器，其使用及发展应受国家政策与主管机关依法监督」等理由予以驳回；中天不服提抗告，最高行政法院（2020 年 12 月 11 日）再以「对换照申请是否准许，为主管机关裁量处分，并非原则应予许可」等理由驳回抗告。中天终于为它的专业沦丧、自律失控付出代价。

经过换照风暴后，中天会虚心检讨、改进缺失，还是变成脱缰野马、更趋极端？其他新闻台会知所警惕、提升专业，还是事不关己、依然故我？更重要的，NCC 这次换照审查树立的四大判准：专业守法、自律内控、新闻自主、改正违规，能不能成为所有新闻台组织运作的标准，能不能在未来不同

政治色彩新闻台换照时一体适用，都还有待观察、监督。

作为鉴定人，我卷入今生最大争议，在褒贬毁誉间，努力维持内心平静，继续工作生活。我生在戒严时代，解严后进报社工作，经历黑金政治，于是用十年时间撰写《新闻控制与反控制》一书，探讨在政治、老板、黑道干预下，如何找到报导真相的空间；2003 年接触部落格，发现人人可以上网办报，不必再钻传统媒体的缝隙，于是转向参与公民新闻、独立媒体、新闻创业；2016 年担任公视董事，看到专业自主的优质新闻，收视率却不高，因此推动数字转型、内部创业，希望让好新闻被更多人看见。

一路走来，我所认知和追求的新闻自由始终是专业记者的自由、不是豪强巨贾的自由，是报导真相的自由、不是造假造谣的自由，是满足公众知权利的自由、不是满足老板私人利益的自由。我因此认为，中天换照案，不是新闻自由问题，而是专业伦理问题，也因此选择以「中天有没有守住新闻专业伦理底线？」作为听证会鉴定重点，更因此认为，NCC 否准中天换照，不是侵害新闻自由，而是遏止专业沉沦。

2021 年 3 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公布世界各国人权报告，提到中天换照案，认为台湾独立媒体活跃，言论自由不受限制，也无可靠报告指台湾当局箝制新闻自由（张文馨，2021 年 4 月 1 日）；同月，自由之家发表全球自由度调查，台湾比前一年进步一分，以 94 分名列自由国家，排名亚洲第二（中央社，2021 年 3 月 3 日）；四月，RSF 发布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台湾排名和前一年一样是世界第四十三名、亚洲第二名，RSF 认为台湾是区域新闻自由榜样，媒体很少受到政治干预，但记者身陷两极分化的媒体环境，炒作耸动和逐利的报导，政府很少采取具体措施来提高记者的编采独立性、提升媒体的公共辩论质量（简恒宇，2021 年 4 月 20 日；RSF, 2021, April 20）。

这些人权和新闻自由的年度评比显示，从全球的标准来看，不予中天换照，并未侵害新闻自由，台湾媒体问题不在新闻自由被打压，而在专业伦理、编采自主未落实。

1987 年解严前夕，新新闻周刊创刊，我当时是大三学生，读到它的发刊词「自由报业宣言」，深受启发，信奉至今：



新闻自由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相。新闻自由不止是报业经营者的自由，也是新闻专业工作者的自由，更是社会全民的自由。全民有知道真相的权利，全民有免于被蒙蔽真相的权利，全民有不被歪曲形象的权利，全民有免于恐惧、畅所欲言的权利。自由报业接受公共信托，必须全力以赴，追求真相。自由报业以公是公非为依归，要永远站在人民的立场讲话。自由报业必须接受社会力量的监督。

这才是真正的新闻自由，这样的新闻自由才能落实专业伦理、编采自主、确保公众获得正确的信息。

## 参考书目

- NCC (2020 年 11 月 18 日)。〈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决议予以驳回「中天新闻台」卫产事业执照换发申请〉，《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取自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8&sn\\_f=45332](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8&sn_f=45332)
- TNL 编辑 (2020 年 10 月 20 日)。〈中天新闻台换照案，会如上次「惊险」过关吗？通过门坎是什么？〉，《The News Lens 关键评论》。取自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2097>
- 中天新闻 (2020 年 10 月 27 日 a)。《鉴定人提议「延迟直播」！民众：非 live 怎信真实性？》。【Youtube 影片】。上网日期：2021 年 10 月 10 日，取自 <https://youtu.be/Cwx3FpJTFyo>
- 中天新闻 (2020 年 10 月 27 日 b)。《这款鉴定人？台湾新闻自由倒退 30 年？》。【Facebook 影片】。上网日期：2021 年 10 月 11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751986115382714>
- 中天新闻 (2020 年 11 月 20 日)。《中天遭撤照 民众高喊退订第四台？危及系统业者 政府该负责！》。【Youtube 影片】。上网日期：2021 年 11 月 10 日，取自 <https://youtu.be/PU7Vo9SVpL0>
- 中天新闻 (2020 年 11 月 22 日)。《瞎挺 NCC！无国界记者组织台湾分会挨轰 监守自盗》。【Youtube 影片】。上网日期：2021 年 10 月 10 日，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6h-ud\\_uyDE](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6h-ud_uyDE)
- 中央社 (2021 年 3 月 3 日)。〈自由之家 2021 全球报告 台湾自由度 94 分排亚洲第 2〉，《中央社》。取自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03030332.aspx>

- 中华传播学会 (2020 年 11 月 23 日)。〈吁请媒体停止人身攻击 尊重学术专业与回归理性讨论〉,《中华传播学会》。取自  
[http://ccstaiwan.org/newdetail.asp?WN\\_ID=1466](http://ccstaiwan.org/newdetail.asp?WN_ID=1466)
- 朱真楷 (2020 年 10 月 27 日)。〈鉴定团绿油油 观点还惹网友嘘声〉,《中时新闻网》。取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01027000422-260118?chdtv>
- 李侑珊 (2020 年 11 月 20 日)。〈校友谴责 陈慧蓉沦负面教材 网友质疑 陈顺孝教得下去吗〉,《中时新闻网》。取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01120000504-260102?chdtv>
- 李侑珊 (2020 年 12 月 15 日)。〈关台引发老翁轻生等争议 林丽云、陈顺孝 噤声不回〉,《中时新闻网》。取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1215003071-260407?chdtv>
- 李培睿 (2020 年 10 月 26 日)。〈中天听证会 鉴定人冒出这句 网友全吓呆〉,《中时新闻网》。取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1026005277-260407?chdtv>
- 胡心平 (2000 年 12 月 26 日)。〈Call-in 节目的法律问题〉,《公共电视》。取自  
<http://web.pts.org.tw/~rnd/p1/010105.htm>
- 胡梦玮 (2020 年 11 月 6 日)。〈别再说了! 川普白宫谈话 惨遭美国三大媒体 中断直播〉,《联合新闻网》。取自  
<https://udn.com/news/story/121687/4993566>
- 国会无双 (2020 年 10 月 28 日)。〈蔡衍明公然说谎! 旺中微信群组唯旺董 是从: 证实蔡衍明介入中天、中视、中时新闻制播〉,《沃草》。取自  
<https://musou.watchout.tw/read/J4EnldXrHEb0HPI3Re3V>
- 张文馨 (2021 年 4 月 1 日)。〈美人权报告: 大陆意图影响台媒〉,《联合新闻网》。取自  
<https://udn.com/news/story/6809/5358127>
- 郭怜妤 (2020 年 10 月 28 日)。〈「蔡衍明说谎!」黄国昌爆中天高层对话, 揭蔡「直接下令干预新闻」〉,《风传媒》。取自  
<https://www.storm.mg/article/3153870>
- 最高行政法院 (2020 年 12 月 11 日)。〈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裁字第 2220 号抗告人中天电视股份有限公司与相对人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间声请假处分事件新闻稿〉,《最高行政法院》。取自  
<https://tpa.judicial.gov.tw/tw/cp-1689-67091-9def5-021.html>
-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2020 年 12 月 7 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9 年度全字第 43 号声请人中天电视股份有限公司与相对人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间声请假处分事件新闻稿〉,《司法院》。取自  
<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888-335305-216cd-1.html>
- 刘子维 (2014 年 12 月 3 日)。〈台湾中天新闻台申请换照惊险过关〉,《BBC NEWS 中文》。取自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4/12/141203\\_taiwan\\_ctitv](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4/12/141203_taiwan_ctitv)
- 简恒宇 (2021 年 4 月 20 日)。〈2021 新闻自由指数 台湾维持亚洲第 2 名 独裁政权趁疫情加大压迫媒体〉,《风传媒》。取自  
<https://www.storm.mg/article/3621085?mode=whole>
- CNN(2004, February 4). CBS to use 'enhanced' tape-delay for Grammys. *CNN*.

Retrieved from

<http://us.cnn.com/2004/SHOWBIZ/TV/02/03/grammys.tape.delay/index.html>

Carey, M. (2004, February 5). ABC to impose delay on Oscar telecast. *CNN*.

Retrieved from

<http://us.cnn.com/2004/SHOWBIZ/Movies/02/05/sprj.aa04.abc.oscar.delay/>

RSF (2021, April 20). 2021 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 *RSF*. Retrieved from

<https://rsf.org/en/ranking/2021>

## **Is this a Matter of Press Freedom or Journalism Ethics?**

### **How did I evaluate CTi News and how CTi News attacked me**

Shun-Hsiao Chen\*

#### **ABSTRACT**

I read more than two thousand pages of information and found that the operating standards and procedures as well as quality management mechanisms of CTi News are adequate, but their actual implementation is very poor. CTi News does not do a good job of fact checking, so it often

breaks the law. More penalties have been imposed by NCC on CTi News both in terms of frequency and amount, than on all the other TV stations. CTi News even erred in their own news reports. I conclude therefore, that CTi News does not uphold the minimum standard of professional ethics required in journalism.

NCC decided not to allow CTi News to renew its license. CTi News retaliated by targeting me for attack. It slander my suggestion is to imitate the CCP media, falsely claiming that the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RSF) statement I quoted has been recalled by the headquarters, calling me "very blind" and asking me to apologize. I did not expect to experience personally such unprofessional and undisciplined conduct on behalf of CTi News.

**Keywords:** fact-checking, journalistic autonomy, journalism ethics,  
journalism self-discipline, press freedom

---

\* Shun-Hsiao 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tudies,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wan, e-mail: chen328@gmail.com

## 评析《俄罗斯战略传播：公共关系与广告》

胡逢瑛\*

書 名：*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in Russia—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主 編：Katerina Tsetsura & Dean Kruckeberg

出版日期：2021 年

出 版 社：Routledge

### 本文引用格式

胡逢瑛（2021）。〈评析《俄罗斯战略传播：公共关系与广告》〉。《传播、文化与政治》，14:151-170。

### 壹、绪论：如何理解俄罗斯战略传播

---

投稿日期：2021 年 10 月 6 日；通过日期：2021 年 11 月 10 日。

\*作者胡逢瑛為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助理教授，自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大學(MGIMO)取得國際新聞學碩士和政治學博士學位。囿於自身能力有限，在豐富的俄羅斯戰略傳播文獻中蜻蜓點水，敬請廣大讀者見諒。最後，筆者要特別感謝匿名評審惠賜的寶貴意見以及編輯部同仁的辛勞。E-mail: fengyunhu@saturn.yzu.edu.tw

本书宗旨是要在浩瀚的俄罗斯传播知识领域中为读者打开一扇理解之窗，因此，两位主编蔡宰拉与克鲁克博格组织这本书，是要抛砖引玉。毋庸讳言，铺设这条羊肠小道是引领读者探索俄罗斯的重要路径。本书并非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也非通往俄罗斯战略核心的康庄大道，而是尝试透过集结俄罗斯本地学者以及从事俄罗斯研究的知识社群，以此模式来认识当代俄罗斯战略传播的主流思维与在地特点。因此，本书所汇聚的 21 位作者之研究成果，在此意义上具有俄罗斯在地的贴近性与就地观察的亲近优势。如此一来，这些作者群已然做出他们在传播领域的贡献。不但为广大读者搭建了知识传递的桥梁与减少了沟通鸿沟，而且提供了非俄语操持研究者与时俱进的观点，进而达到可以设定寻求俄罗斯合作的合理战略以及依据事实基础做出相应的理性判断之妙用。同样地，俄罗斯学者也经由英语世界的国际学术环境，推广地道俄罗斯文化价值和思想特征，这样的国际交流本身就是饶富意涵且是具有参考价值的传播本体。

在开篇「什么是在俄罗斯的战略传播？」(Kruckeberg, 2021, pp.3-11) 的一文当中，主编克鲁克博格开宗明义地指出了社会科学普世性研究的困境。诚然，人类文明在既相似又相异的历史进程中发展，人们在不同时空背景与环境条件之下所构成的具体生活是多姿多彩的，其丰富和奥秘的多元样貌是透过可遵循的社会规范得以延续保存下来。西方主导的学科范式提供了思想上的纯粹性和普遍性追求，但倘若撇开文化、历史与思想模式的文化多维向度之特殊性，则往往适得其反而增加了文化间相互理解与沟通的困难，甚至导致紧张和冲突。克鲁克博格显然是一位长年熟悉俄罗斯研究事务的美国学者，他以一种全球性的包容思维和多元视角说明了文化间存在了文化本位的种族主义芥蒂，跨域文化理解的可能性在高筑藩篱的墙垣阻隔中，使得墙外人仍然需要透过在地人来传递他们存有的文化潜质，方能一窥究竟。克鲁克博格认为俄罗斯人的国家认同在概念上是既统一又分歧，其组成和性格是那么极端和不同，甚至自身都有超过 180 个族群以及领土范围涵盖 11 个时区的 85 个行政区域主体，以至于探究「俄罗斯的战略传播必定是要立足于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之上」。

克鲁克博格认为，非俄语言说者往往难于正确理解俄罗斯，一方面由于

在许多国家的俄罗斯研究属于冷门学科；另一方面，以西方盎格鲁萨克逊、特别是美国文化为传播标竿的阅听众对俄罗斯的印象则深受西方媒体的新闻报导与政治宣传的影响。在美苏两极对峙的时代，由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剑拔弩张使然，西方政治传播者把俄罗斯视为威胁所营造的「俄罗斯恐惧症」已经深深烙印在世人心中。2014年，西方认为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并且武力占领乌克兰东部，因此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再加上俄罗斯对叙利亚境内的出兵干涉以及美国深信俄罗斯黑客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的介入操控，这些都使得全球公众舆论特别关切俄罗斯地缘政治扩张的野心。与此同时，俄罗斯也是营销国家品牌的传播大国，鼓励外国人到俄罗斯进行投资和旅游；致力于向友好国家输出影音产品；同时也积极劝说广大阅听众尊重俄罗斯在全球场域中的政治利益。俄罗斯近年来更擅用「公共外交」的「软实力」来扭转对其企图恢复前苏联帝国主义版图以及遗留前共产铁幕警察国家中缺乏公民权利和言论自由的诸多指控。俄罗斯近年来积极举办各类大型国际赛事与国际性会议，不但向全世界展示团结崭新的俄罗斯，并且呈现多元文明中的公民自豪感在减缓族群间紧张关系的具体成果。例如，举办2014索契冬奥委会就是一个自我营销的案例，显示俄罗斯运用「关系管理理论」与致力于「营销国家品牌」的公共外交战略。

诚然，笔者也认为俄罗斯战略传播学的学术研究并非刻意要为赋新词强说愁，主要仍在于彰显俄罗斯族裔探索自我存在的价值体现与重新诠释，将外来学科融入到自身的文化语境和社会变迁当中以为所用。当代西方传播学传入俄罗斯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关于这个学科的建立与专业教育自然有其草创发展和建立学说理论的原始过程。俄罗斯传播学在苏联时期主要体现在对外关系方面，注重在与西方进行攻坚心理战和信息宣传战的外交作用上。其次，俄语的传播与教育在文化外交中扮演友谊的桥梁角色，例如：俄罗斯世界和平基金会（Foundation Russkiy Mir）。俄语以及俄罗斯本国文化传统成为俄罗斯软实力的核心支柱。这些传统并没有在苏联解体之后消失，反而随着国家体制转型时期的结束与多极时代的来临，以国家战略的面貌又再度重新回到俄罗斯战略传播的关键位置。苏联解体之后，传播学融入在既有的新闻学和社会学的专业教育当中，以公共关系与广告作为整合两者之间的共同领

域，以因应市场经济之所需。而俄语的修辞在传播学当中突出了转型国家发展出的外来文化、流行文化与政治文化的新特征。「传播」这个外来字有别于本身字义作为中介工具和运输交通的意思，在学科当中被重新赋予新生的专业意涵，具有以大众为导向的市场概念与民主取向。俄语中的「交流」这个字所代表的传播意义则有历史共性，作为语言相通和相互理解的共识基础，投射在民族融合的统一整体概念中。根据俄罗斯世界和平基金会成立宗旨，认为在俄文「米尔」的概念中含有俄罗斯公共社群、俄语世界与终极和平的根本意涵。

关于以俄罗斯文化传统作为建立俄罗斯思想之相关论述，在俄罗斯著名的思想家当中有鲜明的表达。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拉伯治热夫在「俄罗斯民族思想：介于过去与未来之间」一文中提到，民族思想有助于民族自信、自尊和历史乐观主义的出现，使人们能够论述和确认国家的发展目标。他认为俄罗斯思想的提出可以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我文化认同，若干思想家在这方面具有卓越贡献。索洛维夫在「俄罗斯思想」一文中提到：「思想，假如它不是空想，不可能有其他，正如是被赋予东西的完美实现。」别尔加耶夫：「19 世纪俄罗斯意识具有普世性、全人类性，并且普世性就是俄罗斯的传统。」杜思妥也夫斯基：「俄罗斯民族思想是，归根结底，只是全世界全人类的统一整体。」(Работяжев, 2018)。托尔斯泰关于认识爱的名言之一：「人因爱而活；爱自己 - 死亡的开始，爱上帝和人类 - 生命的开始。」(Толстой, 1928)。俄罗斯的思想家为俄罗斯在当前国际社会中坚定立场以探索自我发展方向道路提供了自信基础。普京总统就曾经在俄罗斯第四届全国地区暨地方独立媒体论坛「真相与公正」中，向与会者说明俄罗斯网络限制的思想概念，普京引用了 19 世纪的俄罗斯外交官诗人丘特切夫的经典诗句：「用世智聪明无法理解俄罗斯」，强调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道路，立基于自身传统与历史文化，不会照搬他国模式到俄罗斯来 (Путин, 2017)。

笔者最后在绪论中简短概括作者群目标：本书的两位主编蔡宰拉与克鲁克博格鼓励非俄语使用的传播研究者能够搁置先入为主的成见，从美国传播优势与放诸四海皆标准的框架中跳脱出来，才能领略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各异



其趣，这也是进行国别研究和跨文化传播研究所需要的开阔眼界。诚如该书主编所言，俄罗斯战略传播作为学术探索、专业教育和应用实践是很重要的领域，这不但对于俄罗斯学者专家、教育工作者、学生与传播从业者深具意义，对世界亦然。

## 貳、「舆论战」下的俄罗斯战略传播之特点

战略传播的过程基本上都是为了形塑民意以达到既定之效果。在「俄罗斯战略传播于全球舞台之上」一文当中，洛玛-阿霍、蔡宰拉和库加比这三位作者在导言中认为，尽管战略传播多数发生在西方以外的地方，但战略传播研究文献主要基本上根植于西方民主的情境（Luoma-Aho, Tsetsura, & Kugappi, 2021, p.12）。他们认为，西方文献倾向是以负面态度来定位俄罗斯的传播行为，并以此区隔西方与俄罗斯之间战略传播的差异，包括认定俄罗斯的传播是操控、信息误导和宣传。然而，洛玛-阿霍、蔡宰拉和库加比三位作者认为，俄罗斯的战略传播侧重在信息管理，广泛运应在「公共外交」和「公共关系」当中。俄罗斯文献主要将俄罗斯的战略传播定位在是一个达到政治、地缘政治和经济目标的好工具上面。政权运用各种技巧和管道提升国家形象并且达到影响其针对之受众所设定之目标，因此，俄罗斯的战略传播在政治领域中会关注受众的理解程度，也往往具有单向传播之政治性质（ibid, pp.13-17）。

洛玛-阿霍、蔡宰拉和库加比认为，俄罗斯的战略传播需要从深度去理解和分析，不太容易从字面上看懂。他们认为，俄罗斯的战略传播不总是清楚陈述其目的，「战略模糊」是战略传播的一种形式，透明度不是标准，而是测试阅听众态度的手段。不同的讯息往往在重要的时段进行讨论，其目的是在政策形成之前掌握受众的需求，以达政令成功宣达之效应。为了使讯息能够混淆阅听众，缺乏透明度也是传播者掌握消息来源的价值。洛玛-阿霍、蔡宰拉和库加比从几个方面来归结俄罗斯与西方的差异性（ibid, pp.19-22），如下陈述：

- 第一，逻辑面：俄罗斯的战略传播涵盖面较西方宽广，讯息需要同时兼顾传播者与接收者之心理需求，其目的在于建立各阶层彼此之间所需要的信心与信任，以达稳定政党政权、安抚民心对未来之不确定感以及度过经济危机之需求。
- 第二，顺序面：俄罗斯战略传播较具有隐晦性，不似西方传播将重要讯息置首，重要讯息可能藏匿于逗号之后或是字里行间当中，读者往往需要在讯息当中去探索关键讯息之所在。
- 第三，共鸣面：俄罗斯战略传播者注重讯息对于不同阅听众之间所产生的共鸣性，讯息不像西方重视特殊受众，俄罗斯讯息需跨越受众以达在内部舆论所引发的共鸣效应。
- 第四，内化性：俄罗斯传播者首先考虑的是讯息在内部所产生的公众效应，消息来源首先寻求内部的理解，对外讯息也是考虑其内化效应，将本国舆论置于战略传播的核心位置。
- 第五，消息源：俄罗斯首先考虑的是消息源，如果是普京总统的谈话就具有权威性，倘若任何其他讯息若是与其发生争议，则不会被放置于高度关注的位置。

自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假新闻成为全球当红词汇，主要是川普打击主流媒体以达稳固政权之目的。然而，美国主流媒体与川普政敌的结合，加速了美国内部社会意见的分裂与民粹主义的兴盛，这反映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以及国会暴动事件当中。随着川普的落选，假新闻再度回到舆论战的宣传框架下，以负面攻击对手以形塑民众仇恨情绪的认知战同样出现在我国的传播领域当中。英国著名的战争新闻研究学者罗宾森认为，政府以各种方式形塑和影响民意，在高层的外交决策的形成过程中（特别是对外宣战，指的是发动地面部队），媒体能够影响政府甚微，而是加深与反映政府决策的本身，成为政府「制造共识」的宣传一部份（Robinson, 2013）。

台湾著名的传播学者冯建三教授认为，川普当选总统之后说道：「一切不利他的报导都是假新闻」之后，亚洲也有了川普的假新闻效应。而执政者防堵假新闻的负面冲击太消极，应思考扩大公共媒体，使新闻从业者了解其责任与职掌，提升新闻事业的素质和新闻标准，以达媒体为公众利益而行公共服务之实。他认为：「假新闻的出现，若是记者伦理或素质的问题、工作条件的不合理，或是特定人或团体的政治算计所造成，就得另作因应。但无论是起源于哪一种原因，减少假新闻或冲淡其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就是扩大

公共服务媒体的规模：阅听人愈是能够更大规模地使用公信力较高的公共媒体，假新闻的呼吸空间自然就会减少。」（冯建三，2017）。

此外，台湾传播研究学者郑宇君教授认为，假新闻是近几年政治圈、新闻界与学术界最热门的关键词，用「假讯息」一词更能精确描述当前政治传播的重要问题。从早期的战争宣传研究即可见到假新闻或假讯息的踪迹，当前以社交媒体为核心的去中心化媒介生态使得假讯息扩散的情况更胜以往，特别是社交网络技术的能供性成为讯息操弄者的攻击目标（郑宇君，2021，页 4-5）。回顾假新闻词汇的兴起与川普总统喜欢使用社群媒体-推特有关，他与传统主流大媒体经常在公开场合中针锋相对，他也推文点名几家美国主流媒体是假新闻媒体。不过，美国的内部政争才是决定媒体属性骤然丕变的关键因素。社群媒体在中东的颜色革命中是推翻独裁者专制体制的民主浪潮推手，俨然是正义的化身；到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竞选期间和川普任内，却变成了建制精英口中的假新闻的平台，川普则反控主流媒体才是假新闻媒体。

美国前总统川普意外上任之后，就陷入了与俄罗斯勾结的「通俄门」司法调查以及和怒骂主流媒体如 CNN 等为「假新闻媒体」的唇枪舌战的困境中。Lawfare 刊登的关于川普推文的内容涉及了俄罗斯和假新闻言论。川普在2017年2月17日的推文写道：「假新闻媒体（失败的@nytimes、@NBCNews、@ABC、@CBS、@CNN）不是我的敌人，而是美国人民的敌人！」川普在2017年6月27日的推文写道：「所以对假新闻 CNN 感冒了，但 NBC、CBS 和 ABC 呢？失败的@nytimes 和@washingtonpost 怎么样？都是假新闻！」此外，川普讽刺民主党与俄罗斯对抗是愚蠢的人。他在2017年1月7日的推文写道：「与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是好事，不是坏事。只有「愚蠢」的人，或者傻瓜才会认为它是坏的！」

当前，俄罗斯战略传播被广泛于用政治和经济领域当中，特别是在国际关系领域和公共舆论当中。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战略则相当重视国际信息的流通、辨认与平衡能力，战略传播对于国内阅听众的影响足以危害国家安全。特是在俄罗斯认为国际安全环境恶化来自于西方试图挑起国家间冲突以及其破坏现存安全体系（胡逢瑛，2021）。各种「舆论战」（黑客攻击、假新闻、

信息误导) 大体可反映在科技和心理两个层面: 前者是透过科技的方式破坏敌方的网络系统并且窃取或是窜改数据; 后者, 则是以不实或负面「宣传」的方式对全球舆论和敌方国内舆论进行影响以制造恐慌和对政权的不信任氛围, 构成所谓的「心理战」或是「认知战」。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进行各种抗衡所导致的国际安全环境恶化的情况之下, 「舆论战」在数字科技和心理认知结合运用之下成为国家政府进行敌我舆论攻坚的战略传播前沿地带。

自冷战以降, 美俄之间的霸权角逐并没有因为苏联解体而停歇过。因此, 笔者认为, 俄罗斯战略传播以内部舆论为主, 是为了有效因应西方舆论战的重要手段。西方媒体对于俄罗斯的报导往往是固定的模式, 就是先制造俄罗斯威胁论, 以此为理由进行内部军事扩编和外部结盟围堵的安全战略。以美国总统川普进行总统参选为例, 美国建制精英与主流媒体坚信一定是俄罗斯干涉美国选举, 才导致川普胜选。然而, 当川普寻求连任失败之后, 则变成是证明美国团结捍卫民主自由价值的成功体现。美国建制派宣传「通俄门」的目的也是一种战略传播的手段, 使美国能够重返国际领导地位, 并且趁势发展网络系统与团结媒体。「网络安全」和「公平贸易」被美国政府喊得震天价响, 则顺势用来针对中国, 进行美国对中国的舆论战宣传。美国舆论战这种自导自演以满足自身政治需求的双重标准手法, 则经常运用在对俄罗斯进行战略围堵和经济制裁上面制造理由。俄罗斯永远是敌人才能证明美国文化作为唯一标准的普世性价值, 也就是: 在理想主义的国际建制中以人权为要求指责竞争对手; 在现实主义中寻求整军建武和市场经济之政治经济权力之扩张, 施以强权之军事干涉和经济制裁。如此一来, 西方才能维系其建立国际游戏规则之霸主地位。对于中美俄地缘竞争, 各有其战略传播的表达语境, 构成了不同脉络下的陈述特色, 也提供了战略传播丰富的素材。

### 参、俄罗斯战略传播在专业教育与学术研究的发展与运用

苏联解体之后, 重视传播应用之战略的公共关系与广告就成为新闻系所专业教育中的新兴方向。当前俄罗斯把公共关系当作一个联系国内外各领域以达世界整体安全的专业教育, 其目的在于建构一个整体空间以完成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之整合目标。这个概念后来结合俄罗斯传统文化作为

软实力的资源在公共外交中确认下来，胡逢瑛和吴非在《俄罗斯公共外交与地缘政治——乌克兰危机之下普京时代的再造》一书中有所论述。当前俄罗斯又进入了后疫情的传播变革时代，全球新冠肺炎传染方兴未艾而疫苗却仍然短缺；全球气候变迁产生的温室效应，零碳排放成为各国政府需要纳入绿色政策的目标；美国结束长达二十年的反恐战争，撤军所引发的地缘政治板块变动，在各国地缘政治角力过程中，导致的中亚暨中东地区恐怖活动猖獗且蔓延；贫富差距扩大引起了民族主义的兴起并反扑全球化，加深了文明冲突成为地缘政治扩张的鸿沟；网络黑客和不公平贸易导致的数字化科技竞争，中美试图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防止核不扩散的军备竞赛、解决边境争议的睦邻友好政策、以及诉诸航行自由的海权争霸，凡此诸多新兴议题都构成了在当前国际关系中大国竞逐全球领导地位以谋合作解决的核心议题。

布尔林诺娃、查金娜和伊凡臣科三位作者在俄罗斯智库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中的支持与发展社会倡议「创新外交」中心所撰写的年度报告《俄罗斯在 COVID-19 时代的公共外交：俄罗斯 2020 年公共外交的基本趋势与事件年度总结》中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俄罗斯公共外交需要被广泛理解，并且以作为各种机制整合的系统，其足以是建构与设定涵盖各类项目之框架范畴。俄罗斯在数字化时代更重视对外讯息在外交政策中的角色，因此，信息技术与基础设施的与时俱进对于国际政治的影响不言而喻的重要。互联网中的宣传效应成为外交前线，俄罗斯媒体在网络空间中与西方媒体并驾齐驱，以谋求在西方媒体的全球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式微过程当中站稳脚步。而布尔林诺娃、查金娜和伊凡臣科三位作者认为：公共外交结合文化、以及人道救援成为新危机时代俄罗斯战略传播的重点方向（Бурлинова Н., Чагина М., & Иванченко В., 2021）。

俄罗斯公共关系作为大学专业学科出现在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第一个将公共关系作为专业教育养成的大学是俄罗斯外交部所属的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大学（MGIMO-University; Bachurina, 2021:49）。巴楚琳娜认为，苏后的俄罗斯公共关系学有几个发展阶段：黑暗阶段（1990-1995），侧重商业传播与图像制作；前机制化时代（1995-1999），

波切普佐夫介绍欧洲公共关系学到俄国；机制化时代（2000-2001），莫斯科形象联络公关公司的翻译著作提供了丰富的学术研究材料；次级机制化时代（2002-2003），公共关系的应用普及化与再次通俗化。此外，俄罗斯的教育改革、参与欧洲波隆纳教育进程以及国外学术对俄罗斯的影响都会冲击俄罗斯公共关系阶段性的发展特征（ibid, p.48）。巴楚琳娜认为，俄罗斯学者过去从事公共关系领域研究在国际上鲜为人知，其主因是受限于英文能力不足以及对于国际规范的不熟悉。所幸，透过俄罗斯传播学会（The Russian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的官方期刊《俄罗斯传播期刊》（The Rus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由 Routledge-Taylor & Francis 国际出版集团出版推广，俄罗斯公共关系学研究才逐渐广为国际学术社群所认识（ibid, p.55）。

卡什尔斯基与兹维列夫在「俄罗斯今日传播作为一个领域、一门学科和一种社会机制之形式与塑造：传播发展作为一项社会现代化的结果」一文中提及，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政府和企业都越来越重视名誉的需求，媒体作为社会的机制，成为公众讨论与形塑意见最为集中的领域。公共关系作为学术主题和专业科目成为大学传播教育的趋势之一。从专业科目到专业学位的承认，俄罗斯教育部于 2007 年与 2010 年分别通过了公共关系学士与硕士学位的认定。大量学习有成的公共关系专业人才进入到企业和政府机构当中。因传播具有社会机制之功能，故有助于政府、社会和市场三者之间在公共领域当中进行互动并且达成共同目标（Kashirskikh & Zverev, 2021, p.31）。然而，卡什尔斯基与兹维列夫认为，俄罗斯的公民社会是从属于国家的附属品。因缺乏政治竞争和公开批评，以及行为者参与公众意见的不平等，都使得公共领域萎缩。解决冲突过程是垂直分层结构的：在俄罗斯传播的理论和实践中，工具方法占主导地位；以结果为导向，而不是相互的理解。因此，作为一门学科的传播学无法获得教育的自主性。卡什尔斯基与兹维列夫认为，唯有强化处于弱势者的横向联系，使公民社会越有机会参与影响政治和经济议程的形成，战略传播才能在国家、市场和公众之间作为建立关系的平台而得以确立（ibid, p.42）。

葛芙拉、布柯娃、多尔斯基和卡维琳四位作者介绍了俄罗斯广告营销市场的动态发展研究和研究机构。关于俄罗斯广告市场的结构与动态之研究分

析信息，俄罗斯传播通讯社协会提供相关信息。俄罗斯专业门户网站（[sostav.ru](http://sostav.ru) / [www.sostav.ru](http://www.sostav.ru)）则提供广告市场的核心玩家之活动与监测广告市场的动态发展。媒体镜（Mediascope/ <https://mediascope.net>）则是营销市场和媒体研究的领先研究公司，也是欧洲媒体研究组织、欧洲民意暨市场研究协会和俄罗斯市场暨舆论研究协会的成员。媒体镜的客户是大多数媒体和广告市场参与者，包括：广告公司和团体、出版社、电视频道、广播电台、互联网站等，负责提供战略营销与促销解决方案。ESPAR 研究公司（[www.espar.ru](http://www.espar.ru)）提供户外广告观测；新服务公司（NSC）（<http://nsc.media>）分析与观测俄罗斯电视营销。俄罗斯国内广告公司与国内外的客户关系良好，提供中型企业成功的广告营销，占据俄罗斯广告营销市场的主要份额（Gavra, Bykova, Dorskii, & Kaverina, 2021, pp.109-110）。俄罗斯传播通讯社协会则进行广告活动的自律管理，基于国内外实践的专业经验，广告在经济危机中仍保持成长。俄罗斯的数字科技提供广告市场无穷潜力，并使其处于全球领先的传播态势（*ibid*, p.116）。

苏后的俄罗斯媒体发展大体可以分为混乱、整顿和自律三个阶段。普京2000年上任初期，打击金融媒体寡头和夺回国家能源企业作为其施展政权的起手式，这部分笔者在《苏俄新闻传播史论》一书中论述了这段历史过程（胡逢瑛、吴非，2006）。俄罗斯经历了苏后十年的政治经济转型期，利伯维尔场成为各种领域发展的背景特征。不过，显然压制媒体不适用普京强权下的俄罗斯，媒体相当于政府运行的社会机制分支，所谓社会机制也不能脱离政府预算和管理。总统是社会运行顺畅的最高领导人，而非站在社会组织的对立面。普京重视国家媒体作为政府政策的协作角色，认为强力的政府绝对不是使用暴力镇压，而是能够公正行使人民赋予权力的效能政府。普京也并非独裁者，他是在欧洲选举观察组织参与选举投票与开票过程中产生的民选总统。许多西方媒体已经惯用贪腐和舞弊的刻板角度报导俄罗斯任何的政治活动，并在各种民间抗议示威活动中寻找蛛丝马迹并加以渲染和刻意扭曲；俄罗斯的反对派也熟悉此种模式，经常自编自导而无视法律的约束，成为牢中常客。

笔者认为普京是积极和社会各界、民众直接对话的领导人，只不过他是

寻求政策被理解的强人型领导人，也努力把执政理念落实到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上面。在俄罗斯为了减少官僚体系在分层领导过程中无法充分完成指定的联邦任务，「和普京总统直接联机」成为每年民众直接反应意见给国家领导人的最盛大且最鲜明之形式平台。一方面巩固了总统的权威，另一方面也敦促地方政府实时完成交付任务。普京总统长期以来获得超过半数民意支持度，主要来自于多数民众认可普京危机处理的能力。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战略研究与预测中心研究员、俄罗斯社会议会成员达纽克接受 RT 记者采访时认为，在与普京总统联机三到四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中，民众不羞于表达各种具体的问题，普京总统也开诚布公直接响应各类棘手问题，这样的互动能有效帮助地方政府无法实时解决的问题当场获得总统交付解决的承诺 (Румянцева, 2021)。

美国著名的民主理论家戴蒙德在美国期刊《外交事务》发表〈没有美国民主的世界？美国民主倒退的全球性后果〉撰文认为，今天美国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反民主运动，不仅来自边缘极端分子组织，也来自大量公职人员。而这场运动正在挑战选举民主的基础，如果趋势持续成功，美国或将可能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失败的先进工业民主国家。也就是说，其不再满足政治科学家和其他民主学者定义的自由和公平选举的最低标准。戴蒙德认为美国前总统川普敌视媒体与鼓动暴民冲进国会而首先难辞其咎，因川普不断咒骂媒体是假新闻和绝对人渣，川普的行径破坏了民主国家三个支柱（人民主权、自由民主和法律规范），川普对媒体的诅咒等于助涨了强人对媒体的攻击和独裁者的气焰 (Diamond, 2021)。此外，美国波士顿大学全球中国研究中心的博士后沃尔纳以拜登对中国关系为例，强调了经济发展能包容两国共存共荣。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后，认为美国正处在专制对抗民主的转折点上，而美国必须用民主作为典范的力量，寻求领导世界的地位，以捍卫民主价值。沃尔纳认为，在外交政策上，拜登总统须证明民主不仅是强化与富裕国家的联盟，并非针对加深与专制国家之间的冲突鸿沟，而是改善贫穷国家的生存条件，以拔除那些不平等、排除异己和怨声载道所赋予强化专制力量的根源。那么，中美之间的紧张竞争关系无须进入零和游戏当中，而是以全球强大的经济成长力量作为容纳两国共存成功的宽广空间。这样一来，全球经济成长



才能作为民主化浪潮再兴的条件 (Werner, 2021)。

台湾传播学者罗世宏教授认为，在新冠疫情肆虐下，中国因实施严厉的网络监控与防疫管制措施，使得对网络的监控措施也在防疫的名义下更加极权化；另一是以苹果 (Apple)、谷歌 (Google)、脸书 (Facebook) 和亚马逊 (Amazon) 为首的科技公司，快速积累了更为丰厚的利润和资本，全球财富分配不均的情况也因此更加恶化 (罗世宏, 2020, 页 230)。确实是，在防疫期间使得民众更加依赖政府措施和网络平台，因此，科技公司更是加速发展虚拟世界的应用功能，促进了数字科技产业升级成为庞大商机无限的金矿。然而，谈到俄罗斯的战略传播发展，普京总统则因为反恐需求与打击反对派网络攻击早已进行媒体控管。但这不意味着是西方媒体所指控的那样的视角，其主要基于美俄之间传统上的战略竞争关系所建构的媒体论述方法。因为俄罗斯不是中国，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是以西方民主体制作为转型的蓝图。俄罗斯经历了十年西化的过程，政党政治和媒体互动经验非常丰富。在十年转型期的俄罗斯是资本秃鹰的天下，处在利伯维尔场逻辑思考下的俄罗斯人无法适应从稳定陷入混乱的社会秩序。苏联和美国是冷战的两极，拥有社会福利机制的俄国人民根本无法在突然进入到震撼疗法下的利伯维尔场经济的掠夺中自力更生，更遑论国家资产外流以及外部势力伴随恐怖主义介入领土分裂的内战当中。倘若没有一个有威信政府，则俄罗斯无法快速从政府失能和国家内战的泥潭当中摆脱，国家分裂又如何能够保护人民的最基本生存安全和存在的尊严价值？

笔者也观察，俄罗斯媒体在扮演协助政府了解民意、反应舆情且传达政令方面的角色是非常前沿和公开的。换言之，其影响是利弊互见：一方面，媒体有效抵挡了公众舆论对普京总统个人与政府决策过程中的批评力道，专业媒体也满足受众知情与表达的权利；另一方面，激烈的争辩也会引起民众对于政治议题的极化反应现象。这样一来，民众在数字化时代更加寻求虚拟世界的互动娱乐，在政治抉择上就把信任普京当作最简单有效的选择。俄罗斯的公众舆论市场比较属于政府政策暨政治议程导向型的引导与讨论场域，其目的在于透过激烈的公开辩论以期了解不同意见的陈述动机和目的，有助于了解不同意见的整体论述背景。与此同时，藉由民众的反馈，政府可以了

解受众对于政府政策推出前后的反应和具体政策实施的效能，这样非常有助于政府完善决策并且以解决具体问题为目标导向。由于普京执政时代下的国家媒体主要是政府与俄罗斯国营企业天然气工业集团掌控多数股份，也因此，俄罗斯政府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自然形成是合作关系。媒体作为稳定社会秩序与了解社会需求的工具，而非进行不同意见争论而导致政府失能的斗争场域。这样的垂直传播结构也自然导致了整体社会在政府不关心的领域中反映出公众意见参与的冷感。然而，这显示出民众会很敏锐知道政府重视什么议题，久而久之便擅于揣摩上意。也因此俄罗斯以国家媒体作为主流媒体所建构的传播体系，权力者就把媒体当作凝聚社会共识并且强化政府权威的公共场域。当然，这样的传播结构对于俄罗斯稳定社会关系并且进行公平分配起到治理效能的结果。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局势转变以及新冠肺炎全球跨境传染的危机当中。公共关系重视形象和品牌，而政府在国家安全领域中重视讯息控制以达施政威信。因此，在后疫情时代暨强权国家科技竞争的数字化时代背景下，「科技战」、「舆论战」、「认知战」、「心理战」、「宣传战」、「混合战」……各种名词的旧瓶新装，都显示了战略传播在国防军事、外交政治、数字科技等诸多要素交迭整合出的整体作战领域中的角色日趋重要。各国政府都出现了面对虚拟世界中的网络攻击和假新闻威胁本国安全的危机挑战，因而政府强化各类传播的控管已经俨然是进入数字化时代因应全球变局之必然途径。也因此，全世界都相当关注美国如何捍卫民主和自由的发展及其对于全球战略传播方向的影响。

## 肆、网络时代的俄罗斯战略传播

2021 年 10 月 5 日，美国律师吹哨人豪根指控脸书危害儿童身心健康并且制造分歧，要求祖克博格到国会听证。在参议院商务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豪根呼吁脸书要透明化其如何吸引用户持续滚动而使其成为广告商接触他们以提供创造充足的机会。担任听证会小组主席、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德·布鲁门撒尔表示，脸书知道其产品会让人上瘾。他表示：科技现在面临着重大烟瘾而令人瞠目结舌的真相时刻（Shepardson & Bartz, 2021）。对于调查

脸书营利模式的呼声，显示拜登政府非常重视科技对于教育和人权损害的冲击，致使美国科技产业龙头之一的脸书首当其冲，社群媒体被要求须要负起社会责任。换言之，拜登上任之后，美国民主与新闻自由首先的交锋场域就在脸书爆发，这基本上延续脸书被指控疏于管理，使俄国利用脸书制造假账号，引导用户投票取向以干涉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而最终导致了川普当选总统事件的通俄门模式。从网络自由对国家安全到社会教育的冲击，不可否认，儿童与青少年对于社群媒体的沉溺使用已经构成全球政府管理网络的攸关议题，料想天下的父母都为小孩使用手机而导致亲子关系疏离甚至是紧张而感到苦恼不已。美国已经从自由媒体再度进入社会责任制的周期，这与美国在二战之后防止苏联宣传而进入麦卡锡主义的恐慌当中相似。不同的是，现在美国社群媒体已经挑战了传统主流媒体对于舆论导向的权威地位，其内容伤害受众心理意识的层面更为广泛。网络管理已然成为观察美国民主发展动向以及解读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要素，美国政策的转变将对其盟邦产生深远的影响。

诚然，社群媒体已经对于国际关系和各国国内社会产生巨大冲击和影响。萨文与索罗夫耶娃撰文「社群媒体与俄罗斯社会」一文指出，俄罗斯网域于 1994 年开始产生，1997 年 Yandex 成为俄罗斯最大的门户网站和新闻聚集的枢纽。2000 年以后，俄罗斯网络媒体发生的巨大转变，超过八成以上的俄罗斯民众都是网络用户，媒体环境的转变对于政治议程和社会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俄罗斯网域社群化的新时代始于 2006 年的 VKontakte (VKontakte.com) 和 Odnoklassniki.ru (OK.ru) 推出。VKontakte 最初旨在作为 Facebook 的俄罗斯替代品。VKontakte 是大学校友和学生的网络平台，为用户提供机会连接、发送消息、点赞和分享。另一个社群网络 Odnoklassniki 推出以连接同学，但在成年人中迅速普及。尔后的十多年来，这两个社群媒体已成为苏后俄罗斯暨前苏联地区使用最广泛的联系平台 (Savin & Solovyeva, 2021, pp. 167-169)。

萨文与索罗夫耶娃指出，根据全俄罗斯舆论调查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因特网的快速流通渗透而导致 2011-2012 年间抗议运动以及公民行动主义的兴起。社群媒体成为城市人进行政治讯息传播的重要来源。2011 年阿拉伯

之春后，社群媒体作为抗议专制政权行为的工具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2011 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的特点被认为是选举舞弊而广泛受到关注，随之而来的是要求民主化的大规模抗议。抗议者积极利用社群媒体传播选举舞弊讯息并且协调抗议活动。VKontakte 和 Odnoklassniki 并没有像推特和脸书那样形成政治化风潮，其原因有可能至少有三：（一）VKontakte 和 Odnoklassniki 主要服务俄罗斯国内；（二）俄罗斯反对派主要使用西方社群媒体作为提升其政治要求的管道；（三）VKontakte 和 Odnoklassniki 主要在于娱乐性质，使他们对于使用者之间传递的政治议程缺少关注。总结来说，俄罗斯社群媒体具有习惯模式的忠诚度，构成其共同政治议程和相似认知模式的特征。俄罗斯抗议活动后的两年，俄罗斯通过联邦 398 号法案，被视为政治箝制法案，开始对网络侵权问题以及以打击极端主义为名进行网络限制，用以针对违法的示威抗议活动和反对派领袖所制定出来的法律设限。尽管俄罗斯政府成功控制网络媒体，但是对于网络媒体实际在俄罗斯政治议程中的作用仍存在知识空白 (ibid, pp.171-173)。

## 伍、总结： 俄罗斯战略传播的未来走向

瓦特曼和蔡宰拉在「俄罗斯战略传播之未来：一个基于效果为导向的路径」一文中认为，以基于效果为导向的传播模式可作为大战略层级的模式，用以建构和解构不同背景下的战略传播。此方法也可能适用于各种组织、政府和所有行为者，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俄罗斯战略传播的实践经验。全球讯息环境中的参与者，包括非国家和国家行为者，从激进组织、恐怖组织、再到主要国家，比如美国、中国和俄罗斯。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利益相关者所需要的直接接触之便利性，那些能够适应新的参与速度以及可以利用时机的参与者，显然比那些不能或不想使用讯息权力的人，随时能够在讯息环境中获得明显的优势。优势者以硬实力或软实力为主要接触方式，软硬实力的结合用以支持和执行其权力的角色。俄罗斯一直是许多西方战略传播者的研究焦点，更具体地说，是指关注其虚假信息和宣传活动。许多西方外交、军事和学术资源都试图确定俄罗斯对未来的愿望和意图，不乏众多解释或推

測，用以了解俄羅斯欲建構自身在世界秩序中地位的心態，與其使用傳播以達到其戰略目的之策略。西方關注普京的戰略目標，包括：其重拾蘇聯的勢力範圍，俄羅斯再度被視為國際體系中的強權國家，塑造自身是一位可信賴的領導者、地區的破冰者和協調者，並對世界各國具有經濟、軍事和政治的影響力，以重新定義現行支配掌管世界秩序中自由主義者所建構的權力規則與規範（Waterman & Tsetsura, 2021, pp.221-222）。瓦特曼和蔡宰拉認為使用基於效果為導向的傳播路徑，有助於西方企業和政府了解西方暨非西方傳播模式在俄羅斯同時存在的戰略傳播意圖和目標，這是認識俄羅斯戰略傳播的關鍵點（ibid, p.232）。

蔡宰拉在總結「什麼是俄羅斯的戰略傳播」一文中援引了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大學（MGIMO）的定義，在 MGIMO 執行的新媒體與戰略傳播計劃中，定義戰略傳播是用以建立組織（政府、政治、公共、商業）與社會之間的長期關係。戰略傳播在於形塑組織和個人的形象和聲譽，提高其競爭力和獲利能力，並確保其在政治、社會和經濟層面取得成功。最後，戰略傳播作為「軟實力」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旨在解決現代國家外交政策所需信息支持的問題（ibid,p.241）。根植於檢視專家們的討論之後，大體將俄羅斯戰略傳播歸納在三個脈絡下探討：商業脈絡、社會脈絡以及全球信息環境暨安全脈絡。然而在俄羅斯論述中所缺乏的公民參與之公共關係就會被一些學者和專家認為是另類宣傳的花俏詞匯。蔡宰拉認為，無論如何，在全球化社會中，俄羅斯學者、教育者、學生與專家均渴望參與到全球性的適用理論、教育範式和專家實踐基準的探求進程中，而本書展現了作者們盡力為全球討論、對話和合作做出的巨大貢獻。而未來在俄羅斯乃至於全世界戰略傳播的建構仍需要透過這些不斷的探索追求，如此方是正確的方向（ibid,pp.243-244）。

## 參考書目

- 胡逢瑛、吳非（2006）。《蘇俄新聞傳播史論》。台北：秀威信息。  
胡逢瑛、吳非（2016）。《俄羅斯公共外交與地緣政治——烏克蘭危機之下普京時代的再造》。台北：獨立作家。

- 胡逢瑛 (2021年9月10日)。〈俄美地缘竞逐下的战略羁绊与围堵困境—俄罗斯面对阿富汗变局的因应之道〉, 台北论坛基金会。取自 [https://www.taifeiforum.org.tw/article\\_d.php?lang=tw&tb=3&cid=18&id=6328](https://www.taifeiforum.org.tw/article_d.php?lang=tw&tb=3&cid=18&id=6328)
- 冯建三 (2017年4月8日)。〈冯建三观点: 说说「假新闻」〉, 台湾媒体教育观察基金会。取自 <https://www.mediawatch.org.tw/work/9275>
- 冯建三 (2018)。〈公共服务媒体、共和民主论与「假新闻」〉, 《全球传媒学刊》, 3(15): 1-51。
- 郑宇君 (2021)。〈社交媒体假讯息的操作模式初探: 以两个台湾政治传播个案为例〉, 《中华传播学刊》, 39: 4-5。
- 罗世宏 (2020)。〈免于政治极权监控和企业巨头垄断的网络新世界, 还有可能吗?〉, 《传播文化与政治》, 12: 230。
- About Foundation Russkiy Mir. *Foundation Russkiy Mir*. Retrieved from <https://russkiymir.ru/en/fund/index.php>
- Bachurina, N. (2021).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relations as an institutionalized field and as a discipline in the post- Soviet spac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in Russia: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Abingdon, Ox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 Diamond, L. (2021). A world without American democracy? The global consequ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democratic backsliding. *Foreign Affairs*. July 2, 2021. Retrieved from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mericas/2021-07-02/world-without-american-democracy>
- Donald Trump's statements on Putin/Russia/fake news media. *Lawfar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lawfareblog.com/donald-trumps-statements-putinrussiafake-news-media>
- Gavra, D., Bykova, E., Dorskii, A., and Kaverina E. (2021). Modern Russian legislation and regulation in advertising and advertising trends.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in Russia: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Abingdon, Ox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 Kashirskikh O., and Zverev S. (2021). The forms and shapes of today's communication as a field, as a discipline, and as a social institution in Russia: 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as a result of society's modernization.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in Russia: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Abingdon, Ox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 Kruckeberg, D. (2021). In Tsetsura, K. & Kruckeberg, D.(Eds.). What is (ar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in Russia?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in Russia: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Abingdon, Ox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 Luoma-Aho, V., Tsetsura, K., and Kugappi, A. (2021). In Tsetsura, K. & Kruckeberg, D.(Eds.). Russian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on the global stag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in Russia: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 Abingdon, Ox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 Robinson, P. (2013). Media as a Driving Forc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CNN Effect and Related Debates.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ir.info/2013/09/17/media-as-a-driving-force-in-international-politics-the-cnn-effect-and-related-debates/>
- Savin, N. and Solovyeva, O. (2021). Social media and Russian society.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in Russia: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Abingdon, Ox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 Shepardson, D. and Bartz, D. (2021). Facebook 'operating in the shadows' says whistleblower, lawmakers demand probes. *Reuter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facebook-whistleblower-say-former-employer-an-urgent-threat-us-2021-10-05/>
- Tsetsura, K. (2021). What is next for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in Russia?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in Russia: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Abingdon, Ox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 Waterman, D. and Tsetsura, K. (2021). The future of Russia's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An effects- based approach.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in Russia: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Abingdon, Ox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 Werner, J. (2021). Does America really support democracy—or just other rich democracies? Washington's fight against autocracy will fail if it leaves out the poor. *Foreign Affair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7-09/does-america-really-support-democracy-or-just-other-rich>
- Бурлинова Н., Чагина М., & Иванченко В. (2021). Публичн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России в эпоху COVID-19. Ежегодный обзор основных трендов и событий публичн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России в 2020 г.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инициатива – «Креативн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Полученное из <https://russiancouncil.ru/papers/RussianPublicDiplomacyCOVID-Report71-Rus.pdf> О вере. *Лев Толстой*. Полученное из <http://tolstoy.ru/creativity/quotations/>
- Путин ответил цитатой из Тютчева на вопрос об ограничениях в интернете. *РИА Новости*. Полученное и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dRZD1o-ikA>
- Работяжев Н. (29 октября 2018). 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я: между прошлым и будущим: Необходимы ответы на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е вопросы обосновах бытия России.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Полученное из [https://www.ng.ru/ideas/2018-10-29/7\\_7342\\_ideas.html](https://www.ng.ru/ideas/2018-10-29/7_7342_ideas.html)
- Румянцева, А. (30 июня 2021).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палате заявили о важности прямой линии с Путиным. *RT*, Полученное из <https://russian.rt.com/russia/news/880276-obschestvennaya-palata-putin-ryumantseva-liniya>
- Соловьев, В. (23 мая 1888).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история, источник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лученное из <https://philhist.spbu.ru/11-biblioteka/istochniki/151-solovev-v-s-russkaya-i>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四期  
2021 年 12 月

deya.html



## 订 阅

零售：每期新台币 500 元

个人订阅：国内一年两期 1000 元

海外一年两期 1500 元(或 50 美元)

机构订阅：国内一年两期 2000 元

海外一年两期 3000 元(或 100 美元)

以上均含挂号邮资

邮政划拨户名 社团法人媒体改造学社

邮政划拨账号 50313103

# Communication, Culture, & Politics

Journal published by CMR, Taipei, Taiwan

December 2021 Issue 14

2 issues a year, in June and December

## Sponsor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CMR

## Editorial Advisory Committee

Jin Cao	Fudan University
Chin-hwa Cha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Yu-liang Chang	Nanhua University
Wei-Xing Chen	China Media University
Yong Hu	Peking University
Guang-shiash Hu	Shih Hsin University
Yu Hua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Yng-ruey Jiing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iangwen Kuo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Chin-Chuan Le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Jing-Ling Li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ung-Tai Li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Yuan-huei Li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ailong Liu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Xinyu Lu	Fudan University
Yen-Yuan Ni	Ming Chuan University
Linchuan Qiu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Bo Shan	Wuhan University, China
Ping Shaw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bin Shi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Chunquan Wang	Northwest University, China
Song-In Wang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Yu-Li Wang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Bu Wei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ina
Shieu-Chi Weng	Shih Hsin University
Yu-min Wu	Shenzhen University
Yuezhi Zhao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Jiang Zha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Guo-Liang Zha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Zhian Zha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China

## Editorial Committee

Editor-in-Chief  
Shih-Hung Lo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 Editorial Board

Kuan-hsing Chen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Chien-san Fe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Fu-Mei Lin	Shih Hsin University
Chen-ling Hu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Editorial Assistants

Chung-Po Liu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Publisher

Publisher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CMR

Address 3F-3., No. 102, Sec. 2,  
Zhongshan N. Rd., Zhongshan  
Dist., Taipei, Taiwan (R.O.C.)

Phone +8862-2522-1499

Fax +8862-2522-4970

E-mail: editor.2015ccp@gmail.com

Website: <http://ccp.twmedia.org/>

ISSN: 2411-4006

Calligraphy: Yun-Chi Huang

Cover Design: Yiche Feng

## Subscription

Personal:

NT1000/per year

(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NT1500/per year(or US\$ 50/per year)

(inter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Institutional:

NT2000/per year

(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NT\$3000/per year(or US\$100/per

year )

(inter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Postal Giro Account

50313103,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Some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under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clauses.



# 傳播文化與政治

no. 14/December 2021

## **Research Articles in general**

- *Exploring the Cases of "Speech Crime" under Authoritarian Rule in Taiwan, 1949-1992:  
A study of government archives*
- *Consumption Practices of Taiwan Civic Crowdfunding 2012-2019*
- *Media Credibility and Political Trust: A longitudinal Study*

## **Research Notes**

- *A Look at the Art of archiving and re-archiving*

## **Past and Present**

- *Is this a Matter of Press Freedom or Journalism Ethics?  
How did I evaluate CTi News and how CTi News attacked me*

## **Book Review**

- *The review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in Russia—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